XIAN DAI JIAO YU LUN CONG

现代教育论丛

MODERN EDUCATION REVIEW

《质性研究中的视觉资料》推介



书 名: 质性研究中的视觉资料 著 者: [英] 马库斯·班克斯 出版单位: 格致出版社

《质性研究中的视觉资料》是"格致方法·质性研究方法译丛"中的一种。作者是牛津大学视觉人类学教授马库斯·班克斯;翻译由著名质性研究教育家、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林小英副教授操刀。

全书第1章"导论"解释了,对图像的使用和研究,为什么可以作为社会研究各种方法论中的一种。第2章"视觉资料在社会研究中的地位:一个简史",介绍了各种社会学科中视觉方法的历史,并指出其中一些关键时刻。第3章"研究视觉的方法"提醒读者,即使在研究之前并未有意识地选择任何形式的分析视角,研究者仍然应该清醒认识到自己的立场。第4章"视觉方法和田野研究"概述了一些适用于田野研究的视觉方法,涵盖的主题包括:如何利用已发现或预先存在的图像;社会研究者创作他们自己的图像时可能会出现的方法论问题;田野研究中的各种协作策略;以及视觉研究中的伦理问题。第5章"呈现视觉研究",从田野回到学院,探讨视觉研究的受众和呈现方式。第6章"结论:图像和社会研究"指出视觉方法的价值在于,可以打开以前未考虑过的研究新线索。

现代教育论丛

MODERN EDUCATION REVIEW

编辑委员会

主任委员

副主任委员

委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李盛兵

邬志辉

杜时忠

胡中锋

扈中平

卫

鹏

张

陈

胡劲松 董 标(常务)

马凤岐 王 红

王 红石中英刘云杉刘铁芳吴开俊别敦荣

张学波

范国睿

刘铁芳 朱德全 别敦荣 何先友 张斌贤 张新平 周 峰 郑希付

胡钦太 段 锐 曾文婕 靳玉乐

钱扬义 阚 阅

卢晓中

名誉主编

主编

执行主编

副主编

董标

葛新斌

王建平

方 征

现代教育论丛(双月刊)

2022 年第 2 期 (总第 244 期)

No.2,2022 General, No.244

■特稿

教育行为与有限理性:基于行为经济学的思考 丁 钢(5)
■前沿 后数字时代的人与教育(专题笔谈)
栏目主持人语 董 标 佩塔尔·扬德里克(15)
后数字科学与教育 佩塔尔·扬德里克 杰里米·诺克斯 蒂娜·贝斯利
托马斯·吕贝里 尤哈·苏兰塔 萨拉·海耶斯(16)
转码现实的后数字进路:对《后数字科学与教育》的回应
"后"之丰饶性与人际关系的腐蚀:对《后数字科学和教育》的回应 艾莉森·麦肯齐(23)
后数字声音教育学:回应《后数字科学与教育》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 AMI 综合评价 A 刊扩展期刊《中国核心期刊(遴选)数据库》收录期刊《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统计源期刊中国学术期刊网全文收录期刊

■基础教育

"双减"政策下的私人家教:无序风险与规范向度 余 晖	胡劲松(29)
学生参与影子教育存在邻里效应吗	
——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分析 徐丹诚	薛海平(37)
我国课后服务政策工具选择及其优化	
——基于27份省级政策文本的计量分析 邓 亮	张一帆(46)
小学家长作业参与:方式、行为与改进 康乃馨 徐文琪	方 征(56)
高中生乡村"三同"劳动教育课程的育人价值 姚训琪 表颢菁	肖朝云(66)
■高等教育	
保研内卷生态及其非预期后果	
——双一流高校大学生保研历程的个案研究 海子奕	程 猛(75)
——双一流高校大学生保研历程的个案研究 ······ 海子奕 高等教育财政投入及高校竞争力:空间特征与驱动力识别 ····· 刘晓凤	` ,
	` ,
高等教育财政投入及高校竞争力:空间特征与驱动力识别 刘晓凤	` ,

CONTENTS

Educational Behavior and Bounded Rationality: Reflections on the Behavioral Economics Perspective
Editorial: Men and education in Postdigital era DONG Biao & [Croatia] Petar Jandrić (15)
Postdigital Science and Education
[Croatia] Petar Jandrić & Jeremy Knox & Tina Besley & Thomas Ryberg & Juha Suoranta & Sarah Hayes(16)
Postdigital Approaches to Transcoding Reality: Response to Postdigital Science and Education
[USA] Peter McLaren(20)
The Fecundity and Fertility of The Post and The Corrosion of Human Relations: Response to Postdigital
Science and Educatio
Postdigital Sonic Pedagogy: Response to Postdigital Science and Education · · · · [USA] Derek R. Ford(26)
Private Tutoring under the "Double Reduction" Policy: Risks of Disorder and Approaches of Regulation
Is There A Neighborhood Effect in Participating in Shadow Education? Evidences from the 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
Problems and Optimization Strategies in the Selection of Policy Instruments for After-school Services in China
——An Econometric Analysis Based on 27 Provincial Policy Texts · · · · Deng Liang & Zhang Yifan(46)
Primary School Parents' Homework Participation: Ways, Behavior and Improvement
KANG Naixin & XU Wenqi, & FANG Zheng(56)
Educational Value Of "Three Togethers" Rural Labor Education Curriculum to High School Students
······ YAO Xunqi & YUAN Haojing & XIAO Zhaoyun(66)
The Ecology and the Unexpected Consequence in Baoyan Involution: A Study of Students 'Experiences of
Baoyan in an Elite University
Higher Education Fiscal Spending and Universities Competitiveness: Spatial Features and Driving Forces
Recognition LIU Xiao-feng & LI Yan(87)
Study on the Phenomenon of 'History of Chinese Education' by Chen Qing-zhi in Educational Publishing
ZHANFG Liyong(101)

现代教育论丛

JOURNAL OF MODERN EDUCATION

No.2, 2022 General, No.244

教育行为与有限理性:基于行为经济学的思考

丁钢

(华东师范大学 教育高等研究院、上海 200062)

摘 要:对于教育而言,从行为经济学理论的视角,理解与讨论相关教育行为与教育关系,同时通过对理性人与社会人进行辨析,以及教学案例的分析,需要强调克服理性人为前提,以及明晰平均化、标准化系统对教育及其行为的影响,进而引出一种新的教育研究视角,关注教育行为人的有限理性,重申尊重个体差异,以及强调个性化教学的教育教学本质,使的教育行为和教育政策能够更加符合实际的需求,更加具有合理性。

关键词:教育行为;理性经济人;有限理性;行为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 G40-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6762(2022)02-0005-10

从教育现实层面来说,"只要努力学习,一定能取得回报"的基本信念不仅根植于孩子与家长的内心,也成为教师教育行为的基本信仰,"只要教得好,每个孩子都能学好"成为了教育行为的思维方式,导致"没有学不好的学生,只有教不好的教师"成为了教育行为的基本逻辑。这样的基本信念、思维方式和基本逻辑具有不证自明的合理性吗?

上述这些理念是如何形成的?或说,来自于我们的传统思想:孔子提出因材施教的教学思想,但现实中许多做法又往往是与此相违的;或又说,来自于我们的传统,"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往往只是一种美好愿景。一个愿望在今天成为了一个判断,教育的问题很多时候就出自这样的观念。如果对这些观点不加以认真的思考,改变几乎无从谈起。

这与传统经济学中的理性经济人的假设如出一辙,教育行为是否存在有限理性的问题,其背后的根本问题则是如何将正确对待学习个体的差异性作为教育行为的前提,以及如何看待教育行为的有限理性。

一、理性人与社会人

理性经济人,是被称为主流的传统经济学中最基本的理论假设。几乎所有人都认为亚当·斯密 (Adam Smiti)的《国富论》里那双"看不见的手"是理论源头[1]327。当然,亚当·斯密并没有明确说过这样的话,这只是他在书中谈及的。比如说人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用盈亏来计算得失,这点跟"理性经济人"的假设是非常吻合的。

很多学者认为西尼尔(Nassau William Senior)定量地确立了个人经济利益最大化公理,约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在此基础上总结出"经济人假设",最后帕累托(Vilfredo Pareto)将"经济人"这个专有名词引入经济学。传统经济学以经济人为前提,实际上,依如此假设来研究社会中的各种经济活动,以及发展的逻辑规律,成为了研究经济学最为重要的基石。它主要由两个内涵构成,其一,人都是追求自身利益的。其二,人都是有理性地在进行精密计算,对自己的行为有明确认知。"经济人"会计算,使自身利益最大化,这是进行一切经济分析的基础。从这样的表述中可以发现,"经济人"具有所谓"理性人"的含义,甚至可以称之为"理性经济人"。换言之,理性经济人将自身利益最大化,是效用最大化的追求者。每个人从事经济活动都具有完全的理性,可以做出对自己利益最大化的选择。如果行为人的选择没有实现利益最大化或者最优化,那么他的行动就是非理性的。这也对教育产生了巨大影响,使得教育无时不刻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和最优化,"最优的方案"甚至成为了教育者的口头禅。

这种观点受到了 1978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赫伯特·西蒙(Herbert·A·Simon)的质疑。西蒙在他的《管理行为:管理组织决策过程的研究》中说道:

经济学家们给经济人赋以一种全智全能的荒谬理性。这种经济人有一个完整而内在一致的偏好体系,使其总是能够在他所面临的备选方案当中做出抉择;他总是完全了解有哪些备选的替代方案;他为择善而从所进行的计算,不受任何复杂性的限制;对他来说,概率计算既不可畏,也不神秘。在我们上一代人的年月里,这种理论由于向竞争性对策及不确定性条件下的决策等领域的扩展,逐渐达到了一种托马斯主义的精巧水平。它具有很大的智慧和美学魅力;但同具有血肉之躯的人的真实行为(或可能的行为),看不出有多大关系。[2]18

西蒙认为,第一,根据理性的要求,行为主体应该具备用于预见每种决策后果的完备知识。但是,事实上人对于后果的预见总是零碎的。第二,由于后果产生于未来,在给它们赋以价值时,就必须凭想象来弥补当下所缺少的体验。因此,对价值的预见不可能是完整的。第三,按照理性的要求,行为主体要在全部备选方案当中进行选择。就正常行为而言,人们怎么能得出所有可行的方案呢?能得到的只有很少的几个。^{[2]79}因为不可能得到所有的可能性,行为主体也不可能与一切事物打交道,所以全知全能的人是不存在的。

因此,人的行为是有意识的理性,但因为知识不完备、预见困难和可能行为受限三方面因素,这种理性是有限的,受到意识的控制。

由此, 西蒙给出一个著名论断:

经济人寻求最优——从可为他所用的一切备选方案当中,择其报优者。虽然所有备选方案是不可能的,但理论上说可能。经济人的堂弟——管理人,则寻求满意——寻求一个令人满意和"足够好的"行动程序。判断满意程度的指标,包括"市场占有率""适量利润"和"公平价格"等等……经济人同"真实世界"的一切复杂事物打交道。而管理人则认为,他自己头脑所感知世界,是对纷繁噪乱的真实世界做过重大的简化处理后所得到的一个模型。[2]20-21

西蒙用有限理性和满意原则这两个命题去纠正传统理性选择理论的偏激——即完全理性人的假设暗示着在经济活动中的"决策个体"或"决策群体"具有经济行为的"同质性",但忽略了不同条件下的"差异性"。西蒙的理论拉近了理性选择的预设条件与现实生活的距离。因为无论在哲学还是社会学中,对于经济学提出的理性经济人假设几乎都是肯定的,所有学科都被经济学的理性所笼罩。因为所有学科都认为传统经济学提出的规范性理论完美且具有智慧,所以所有学科都在理性的笼罩下开展研究。

因此当西蒙提出他的理论时,可谓石破天惊。

西蒙为得出有限理性与行为经济学具有密切关系奠定了重要基础。2002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卡尼曼(Daniel Kahneman)与201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理查德·泰勒(Richard Thaler)的理论着重研究人们如何在不确定的情况下进行判断。

理查德·泰勒认为,完全理性的经济人不可能存在,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的各种经济行为必然会受到各种"非理性"的影响,人并不是"经济人",而是社会人、普通人。很多从传统经济学角度看来是"错误"的行为经常被忽视,导致了那些"看起来很美"的决策最终失效乃至酿成恶果。他还指出:

虚拟的"经济人"代替了真实的普通人。与完全理性的经济人相比,我们人类有很多非理性的行为,所以利用经济学模型做出的很多预测都不准确……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曲解人类行为的模型反而让经济学成为社会科学中最强大的学科之一。它的强大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毋唐置疑的,即在所有社会科学家当中,经济学家对公共政策的影响力最大。实际上,他们在为政策建言献策上几乎占据着垄断地位……第二个方面是,就知识性而言,经济学也被视为最强有力的社会科学之一,这是因为经济学拥有统一的核心理论,其他一切理论几乎都遵循这一理论……然而,一个关键问题在于,经济学理论的前提是有缺陷的。首先,当普通人碰到最优化问题时,往往无法解决它们,甚至离找到解决方案还差得很远。[3]5-6

行为经济学旨在校正传统经济学中关于理性人,人性自私自利与最优解的假设。行为经济学希望通过各种各样的可描述性去针对种种非理性行为,它不能依据完全正确的假设来进行推断,而这一结果必然是心理学与经济学的融合。

理查德·泰勒在《"错误"的行为》中引用维尔费雷多·帕累托的话: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或者从更广义的层面来说,每门社会科学的基础显然都是心理学。有朝一日,我们肯定能从心理学原理推导出社会科学的规律^{[3] 庫页}。当然这也仅仅是一种预测。但经济学的发展似乎证明了这一点:面对复杂的未来,当我们以现状为参考点时,必须引入心理学去处理这种复杂行为的后果。反观教育,还有什么比培养人更为复杂呢?美国斯宾塞(美国 Spencer 基金会是由美国知名教育出版协会科学研究协会 SRA 的创始人 Lyle M. Spencer(莱尔·斯宾塞)创建,基金会旨在对教育界各种优秀研究提供资金支持)基金用高额的奖学金吸引教育学博士后,但条件是有其他学科基础的候选人优先,这些学科包括心理学、哲学、历史学、社会学等。这恰恰体现了其关于教育学科本身的综合考量。

那么行为经济学打破传统经济学至此,它又意图建立什么呢?艾瑞里在《怪诞行为学》中认为,行为经济学家相信人们容易受到来自周围环境(我们称之为情境效应)中无关的情绪、短视以及其他形式的非理性因素的影响。认识到这一切会带来什么好消息呢?好消息就是,这些错误同时提供了改进的机会。如果我们在决策中总是出现有规律的错误,那么为什么不发展新策略、新工具、新方法来优化我们的决策过程,改善我们全体的福祉呢?这正是从行为经济学角度赋予我们"免费午餐"的意义——这一观念就是,我们可以借助工具方法和政策,改善我们的决策过程,减少决策失误,以使我们心想事成。[4]247

原先经济学假定人在可承受的经济范围内做出的选择是最好、最优化的选择,因为其中一定存在 理性预期,人不会过度自信,人的理性预期能使人在所有的备选方案中做出最优化的选择。其实这依 然是个想象,但这个想象的力量强大无比。它在完全理性的基础上最优化且均衡,这样的等式做出来 之后,其它社会科学无法匹敌,因为无法想象有什么比得上最优且均衡。关键的问题在于,传统经济 学的前提是有缺陷的,"人们做选择时并不是没有偏见的。经济学家的词典里可能没有'过度自信'一词,但它却是人们与生俱来的性格特点。心理学家还发现了人们固有的许多其他偏见"[3]6。

如果比较完全理性与有限理性,可以看出选择从确定到不确定的重要变化。决策的前提是确定还 是不确定的,会产生同质性与异质性的不同。在设想中,完全理性对应着同质化,但事实上实际生活 中充满了不确定性。

这对教育而言也很重要,我们要意识到个体具有差异性。譬如高考改革,这一改革的前提是否会抹煞差异性?其中文理不分科的变革,一方面,是基于现实的考量;但另一方面,其背后违背了人的差异性——这一点有明确的心理学实验作为依据。教育学事实上应当是在心理学的基础上认识学习个体差异并处理差异个体之间的关系。因为心理学能够甄别个体差异——在上世纪 40 年代已经提出了场心理学,分为场依存性与场独立性,即人的性格的内向与外向,分别对应文科与理科,遗憾的是教育学始终未能予以重视。这也导致了高考改革试点推向其他地区时,在论证过程中出现了极为有趣的现象,就是文理科出现了 3+1 的模式,理科无一例外是在理化生,文科依然在政史地中做出选择——事实上这就回到了原点,而这一点实际上被动地承认了差异倾向。

二、从行为经济学看教育

这里,我们将基于行为经济学来讨论相关的教育行为。

首先是前景理论(prospect theory)。1738 年,伯努利(Daniel Bernoulli)提出了"风险厌恶"(risk aversion),认为人们的幸福感或者经济学家所说的"效用"会随着财富的增加而提高,但提高的速度是递减的,这一原理被称为"敏感性递减"(diminishing sensitivity)。自他之后经济模型一直基于一种简单的假设,即人们的行为符合财富的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对于富人来说财富的增加只不过是个数字问题,幸福感的提高速度是递减的。然而前景理论改造了它,认为不能只看到递减,应关注财富的变化而非财富的等级(见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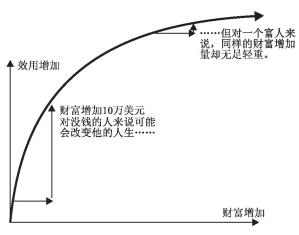


图 1 财富的边际效用递减(泰勒, 2016: 33)

前面递减是等级概念,很小的变化也会带来重大转变。人感受变化,变化改变生活。对损失和收益的敏感性都符合递减规律,但损失的痛苦大于等量的收益带来的快乐。[3]39 卡尼曼在《思考,快与慢》中表明了盈与亏的心理学价值,盈与亏是前景理论当中的价值"载体"。[5]256 前景理论强调了不确定性下

的决策问题,能够很好地预测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的实际选择,是一个有关人类行为的理论。人们决策时不仅考虑最终结果,还考虑现状——现状就是考虑损益的参照点,实质就是考虑经济活动的背景,并以现状为参照点来决定是赢还是输。

人都具有"损失厌恶"心理,赢多了或输多了带来的边际额外的快乐和痛苦都下降。前面说增长是下降递减的,其实损失也是递减的,只不过损失的曲线递减更快(见图 2)。如果买东西,即便在南京路头上就找到性价比高的产品,但不走完整条南京路也绝不会买,要在反复比较之后再决策。这就是典型的"损失厌恶"心理。损失厌恶在商业中也比比皆是,商家最常用的策略就是给产品标价 399 元,让消费者感觉定价还是 300 元范畴内,实际价格只比 400 元差 1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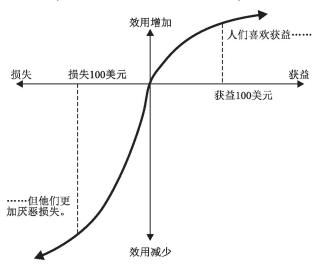


图 2 价值函数曲线(泰勒, 2016; 36)

而与行为经济学相关的教育行为,可以基于前景理论的学业减负行为选择问题进行讨论,

问题 A: 推迟上学时间、提早放学时间,34%会影响学业成绩,66%什么也不影响。

问题 B: 推迟上学时间、提早放学时间, 20%会影响学业成绩, 80%什么也不影响。

你几乎瞬间就能决定选择 B, 因为改变的影响都是增加的, 因此更多考虑如何回避损失, 与其增加还不如不改。

让我们把问题换一下:

问题 A:推迟上学时间、提早放学时间,33%会影响学习成绩,67%不会影响。

问题 B: 推迟上学时间、提早放学时间,34%会影响学习成绩,66%不会影响。

此时,你会觉得改了也无所谓。问题本身没有很大变化,但你却做出了不同选择。难道这种选择 是理性经济人完全可以预测的吗?

现状的改变完全可以改变人的行为态度与行为选择。这就是以现状为参照点的损失厌恶,其问题方式是通过改变现状,让你做出选择。

第二是"心理账户"(Mental Accounting)。这是由理查德·塞勒(Richard H. Thaler)提出的,它揭示了人们为了简化经济决策,会在脑海中创建不同的"账户"。心理账户指人们用来管理、描述和追踪自己各项经济活动开支的一个系统。它用来解释无法解释的人的反常活动(Anomalies)。心理账户也是伴有它的损益情况,但它不仅考虑获得效益的情况,还要加上交易质量,也就是交易效用(Transaction

Utility) o

交易效用是指实际支付的价钱与参考价格之间的差。比如,说,买东西不仅要看这个东西的好坏,价格平贵,还要看买东西过程中的个人体验。塞勒举过"罗塞特的葡萄酒"的例子。罗塞特是他的同事,一个教授,当时喜欢在家里藏酒。罗塞特教授当初买的那些葡萄酒是 10 美元,后面涨到了 100 美元,便有收购商想用 100 美元收购。他不肯卖,宁可自己喝,因为他享受的是从 10 元涨到 100 元的过程,他宁可自己喝也不愿意拿 100 元去买同样的酒,因为再用 100 元去买同样的酒就是损失。[3]18

结合塞勒的框架效应(Framing Effect),即由于不一样表达导致不一样结果的现象,其有四个原则是关于如何合并和单列心理账户的,合并让人们在经历损失时好受很多,单列使得人们即使处于在不增加真实经济好处的情况下也会感到愉快。

我们将其比照现实中的教育行为,比如:

其一,如果存在多个效果好的教育活动,尽可能单列它。比如,我们 PISA 测试得了第一、TALIS 测试得了第一,这背后是教师专业发展、课程改革等方面的政策措施原因等,如此一个又一个的事例能够促进中国基础教育国际影响的提升。

其二,如果存在多个实践效果不好的教育活动,要尽量合并。比如学业负担,我们的教育问题有很多,学业负担问题却是喊的最久、最响的,学业负担成了众矢之的。反过来问,学业负担是谁造成的?除了家长部分原因以外,是否也需要反思学校教育本身?如果学校能够注重个体发展,为不同差异的学生制定不同的教学策略,让学生充分地享有和理解共同的知识,这些问题也许自然而然就会消失。

其三,如果某个活动实践效果不佳,则需要找个有显著效果的活动,并且其效果超过前述效果不好的活动,将它们合并。比如将公开课和校本科研活动合并。尽管我们仍处于应试背景下,但是我们的校本科研发展得很好,比如年级组、教研组开展的一系列校本研究。

其四,如果有某个效果很差的实践,而同时某个活动又减少了一点不好的效果,那就要把该实践活动单列出来。比如,一个课程监测就可以回避很多讨论:我们的课程标准是没有问题的,出现问题主要是因为老师没按课程标准执行。这样的课程监测,现在很多的教育学者热衷于其中。

再者是沉没成本(Sunk-cost Effect)。^{[3]75-85}沉没成本指不能挽回任何本钱的东西,比如钱和时间。从传统经济学的角度来说,沉没成本不影响决策,因为大部分人都觉得自己是理性的,已经选择了最优化的方案,比如投资大的项目,当觉得投资失误,出现了损失,你可能反而会追加投资,结果成本不断增加,可能到最后无计可施时才选择撤回资本。再者我们如何看待投资留学教育会获得更好的回报这一说法?也和沉没成本有关。现在工薪阶层认为投资留学教育会有很好的回报,因为孩子可以接受更好的教育、扩展知识面,等等,然而却很少会考虑回本的问题。这其中确实含有许多非理性成分。

那么,如何看待中产阶级的教育焦虑?这要与禀赋效应(Endowment Effect)相联系。禀赋效应,也叫原赋效应,行为经济学认为你拥有的东西属于你的一部分禀赋,即"与你即将拥有的那些东西相比,你更看重自己已经拥有的东西"[3]20。电视台的鉴宝节目中,人们都拼命地去鉴宝,其实是满怀希望自己手里拿的是个宝物。反过来,它也是损失厌恶:我已经拥有的东西肯定拥有更高的价值。

中产阶级所产生的教育焦虑源自于希望我的孩子受到更好的教育,起码应该跟我们一样,所以他/ 她将来应该挣得比我多、活得比我好。相较于中产阶级,我更倾向于用"中间阶层"这个词。大部分教 师可以算作中间阶层,因为其工作、收入比较稳定。由于中间阶层处于一个相对稳定和体面的工作环 境中, 所以他们对孩子的态度就会有所不同。

而这也是一种现状偏好(Satus quo bias)行为。现状偏差即"个体在决策时,倾向于不作为、维持当前或者以前决策的一种现象"[6]。而现状偏好既是一种损失规避,也是一种现状偏见,即倾向于事物保持不变,或者说如果必须改变的话,尽可能少改变,不付出额外的成本,维持现状的平衡。比如一家民营银行提供了比其它国有银行更高的利率,你还会把钱存在国有银行吗?但现实情况是就算民营银行抬高利率你也不一定敢去,因为你惧怕风险,总会想着国有银行肯定不会倒闭,但是民营银行情况难定,可能哪天钱就回不来了,而且思考时间越久,越会产生现状偏好。

从教育来看,比如,你愿意付出更高的成本给孩子换一个更好的钢琴老师吗?除非是想让孩子当音乐家,否则如果只是普通的学习,当真要付出高成本时许多家长是不情愿的。真实的目的在这种经济行为当中一下显露出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如果真要把孩子培养成一位钢琴家的话,家长从孩子一开始学钢琴就会找最好最正规的老师。

最后是助推理论(Nudge Theory)。此理论的核心在于引导人们做出正确的决定以达到预期目标,尤其是公共政策可以提出更具吸引力的诱因。助推是什么意思呢?直译的话,就是一个胳膊肘轻轻地点你一下、推你一下。助推毕竟是外力而不是内力,这种外力对于一个坚持自由主义的人,并不是强推或者强制的,而是站在自由主义的立场上,轻轻地推你一下,是正向的、好意的。助推理论在公共政策领域发挥很大的作用。

助推理论对于公共政策,可提出更具吸引力的诱因,协助人们自觉或采取其他决定。比如英国政府在卡梅伦时期,成立政府的行为洞察力小组。而后美国在奥巴马期间建立了"白宫社会和行为科学小组",在小组成立后的第一年内,白宫和行为科学小组就将12个与行为相关的随机对照实验融入了联邦政策。其他国家也加入了这场运动,英国国家经济和社会研究委员会2014年发布的报告显示,全球共有136个国家将行为科学融入其公共政策,有51个国家"制定的中央政策受到了行为科学的影响"[3]380-381。

教育也是如此,哈佛大学罗兰·G·弗莱尔教授等通过激发教师的损失厌恶心理,促进教师更加努力地工作。他们提前向教师支付奖励工资,如果学生考试成绩没有得到明显提高,那么教师必须退还一部分奖励工资。这种做法改变了以往根据学生表现奖励教师年终奖的做法。结果发现,如果将教师绩效设定为"不努力则损失",而不是"努力则有收益",那么教师将会更加努力地工作,从而提高学生的成绩。[7]

三、一个教学案例的分析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个教学案例——"MTE"(Mathematics Teacher Exchange,即中英数学教师交换)项目。从2014年至2019年初,中英双方互派教师人数达719余人。在英国聆听上海教师授课,参加上海教师组织的教研活动和相关培训的英国教师超过40,000多人次。英国政府先后投资数千万英镑用于双方数学交流项目,预计到2023年,英国将实现总计11,000所中小学校教师的数学学习。谢菲尔德哈勒姆大学作为第三方跟踪评估,一直到2019年1月连续发布了四份评估报告,对中英数学教学差异进行了总结。

首先, 涉及掌握教学与分层教学的比较。

在 2016 年 7 月发布的《中英数学教师交流项目纵向评估——中期研究报告》(Longitudinal Evaluation of the Mathematics Teacher Exchange: China-England. Interim research report)中,英国 Mark Boylan 等人将上海的这种数学教学模式定义为上海"掌握教学模式"(Shanghai Mastery Model for Teaching and Learning),认为这一教学模式的理论基础源于 1968 年由美国著名的心理学家和教育家布鲁姆(Benjamin Bloom)首次提出的"掌握学习"(Mastery Learning)理论。评估报告做了一些分析,例如中英在数学教学方面的差异比较,包括课程设计和学校设计两个方面。上海的教学是互动式的、涵盖多个小步子的快节奏教学,英国是个人小组学习的慢节奏;中国是确保整个班级一起前进,英国是确保各层次的目标分层教学。学校实践当中,中国是练习作业、编班地,英国是混合设置、分组和整体教学相结合的。

从分层教学看,布鲁姆的掌握教学法是个别教学法。但是掌握教学模式(Mastery Model for Teaching and Learning)不是个别教学法,而是班级整体进步,理念是只要教得好,每个孩子都能学好,这是英国人概括的。英国人以为我们的文化就是这样的,事实上并非如此,这是应试教育背景下造出来的口号。从分层教学的角度上来说,教育最基本的任务是考虑学生的个体差异,因为从布鲁姆的掌握学习来看,它是建立在差异基础上的。

其次,对待平均化与标准化的问题。

以上看来,不仅仅在教学,在理念和设置上,除了考虑经济学理论上的问题,还要考虑如何对待平均化、标准化的问题。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就是要避免在理性经济人的前提下,追求它的同质性的问题。众所周知,教育当中每个学生是有差异的,异质性是教学的前提。与这个理念相关的是托德·罗斯 2017 年出版的《平均的终结——如何在崇尚标准化的世界中胜出》一书。教育学科的人基本不会关注,但是这本书其实很重要,因为我们一对照教育就会发觉我们追求的与此相关。

据托德·罗斯的考证,"平均人"有两派思想: 凯特勒的"平均人"和高尔顿的"一般人"。

- 一是以凯特勒为代表的"平均人"概念。如"平均人"是最标准的人,包括身高、体重等,用一群人的平均值来代表一个人,说明什么是正常,并作为公共政策的依据。其影响工业生产的则是泰勒的"标准人",这导致工业生产的标准化,以及影响学校教育的标准化。学校教育一直在讲标准,我们各方面也是讲标准。现在教育做过很多标准,以前叫教学大纲,现在叫课程标准。所以在这一点,其实我们也是做过"平均人"的。
- 二是高尔顿提出的"一般人"。什么叫一般人?按照智商和能力给人排序和分类。我们经常会这样排序。然后,根据智商与能力的正相关,确定了以"标准人"为标准的人在工作业绩或学习成绩上的排名,将不同类型的人输送到不同的社会岗位上。听起来很有道理,但实际上背后隐藏的东西是一杆尺,很不合理。在这里,平均标准掩盖了个体的概念,而且,个体在个性、认知、想法和情感上的差异,都被掩盖了。所以,托德·罗斯用大量的事实证明,所谓"标准",其实只是一种人为的想象,根本没有科学依据。[8]10-19

从教育方式上来说,英国人在报告上认为,以美国为代表的"掌握"教学主要集中在学习和学习机会上;而以新加坡、中国为代表的东亚,"掌握"教学是期望每个人都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完成数学学习,然后用频繁的形成性评估用来检查学生的理解程度,并在必要时指导教学。这种方法侧重于使用精心设计的课程、模型、问题和实践材料。[9]

按照罗斯指出的,布鲁姆的"掌握"教学的真正意义在于,发现许多学生在学校学习吃力的原因与其学习能力无关,而与教育过程中制定的限制因素大有关系。比如说罪魁祸首是固定速度的群体教

学——课程设计者决定了全班学生应该以什么样的速度来学习知识。布鲁姆用实验证明了将学习速度与学习能力等同的观点毫无疑问是错误的。英国人总结,上海的教学恰恰就是用速度来决定学习,但学生以固定速度学习会人为地削弱许多学生学习或取得成功的能力。从逻辑上讲,这是很明显的。

报告认为这种"掌握"教学以所有学生都能成为教学学习者的信念为前提,采取慢慢走、慢慢教,小步前进的策略,涵盖多个小步骤的方式,帮助每个孩子掌握课堂的教学内容。他们认为这既是对布鲁姆的深化,又与布鲁姆的"掌握"不同。事实上,不同之处在于布鲁姆在个别差异的基础上,容许学生调整自己的节奏。布鲁姆等人认为,"教育最基本的任务是考虑学生的个别差异,提供策略,使每个学生达到可能达到的最大成长"[10]53。布鲁姆所批评的是,学习速度不能与学习能力等同。他认为去掉这些限制因素,学生的表现才能改善。[11][12]

从种种材料来看,我们并不能过高地估计英国人对我们的赞美。大家取长补短、相互交流,可能都往同一个目的地走,在某一个交点相遇、融合,但是绝对不会走到谁的家里,这是在交流时我们脑海中需要清楚认识到的。有人认为我们做得好,英国人赞美我们,英国就中国化了,这当然不可能。我们要理性看待英国人的判断。梳理这些,在于保持头脑清醒,这很重要。

而从教学理念上来说,传统主流经济学从经济理性选择的假设:即完全理性人的假设暗示着经济活动中的"决策个体"或者"决策群体"具有经济行为的"同质性",而忽略了在真实世界中事物普遍存在的"差异特征"以及不同条件下认识的"差异性",并将经济活动中的"异质性"排除在外。与这种理念相关的,是托德·罗斯在《平均的终结:如何在崇尚标准化的世界中胜出》一书中所批判的"平均标准误导了人们的认知观念,事实上它掩盖了个体这个最重要的概念"[8]XXI。

正如英国人所认识到的,中国家庭普遍重视孩子的教育,对孩子在学习方面提出了高要求,同时也将"只要努力学习,一定能取得回报"的信仰根植于孩子的内心。很多孩子不仅仅在学校学习知识,还利用课余时间补充知识,这对学业成绩的提升有直接影响。在中国的基础教育中,"只要努力学习,一定能取得回报"、"只要教得好,每个孩子都能学好"、"没有学不好的学生,只有教不好的老师"等,这些教学行为的基本信念、思维方式和基本逻辑,由于缺乏对学习个体差异的尊重,或者说并不是以学习个体的"异质性"为教学行为的前提,而是类似于在"完全理性"人,以及平均化和标准化基础上的行为人可以实现效用最大化或最优的目标,期望效用最大化来指导教学行为。显而易见,它们并不具备不证自明的合理性。

四、结语

最后,我想引用理查德・泰勒在《赢者的诅咒:经济生活中的悖论与反常现象》一书中的一段话:

新的经济理论应该是什么样的呢? 我最想看到的是对规范性理论(normative theories)和描述性理论(descriptive theories)的区分。利润最大化、预期效用最大化、博弈论等等,都是描述最优行为的理论……但是基于两个原因,要做出一个较好的不完全理性行为模型是很困难的。其一,没有收集数据就能建立一个好的描述性模型一般来说是不可能的,很多理论家都声称对数据有过敏反应。其二,具有精准预测性的理论模型一般既简单又明确,而行为模型往往复杂且棘手,做出的预测也很模糊。但是不妨换个角度来看,你是倾向于选择更加精确但完全错误的理论呢,还是宁愿选择有点儿杂乱模糊但却还是正确的理论呢? [13]179-180

联系到教育,正如规范性理论是关于"应该"——也就是从"应然"的角度判断,追求必然性,由此推论教育是规范性的理论,教育实践是规范性实践。其实,在教育实践的行为领域,实践及其规则是人们有意识选择的结果,因为教育实践并不是按照确定逻辑的必然性来决定的。事实往往告诉我们,并非因为没有规范性理论证实的规范体系,就无法进行教育实践。而是我们没有尊重人人相别的个体心理感受与应有权力的描述性理论的学理根基,才造成"应然"与"实然"的偏差,使得规范性的教育理论疏离了真实的带有不确定性的教育实践。

参考文献:

- [1] 亚当·斯密. 国富论[M]. 唐日松等, 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5.
- [2] 赫伯特·西蒙. 管理行为: 管理组织决策过程的研究[M]. 杨砾、韩春立、徐立、译、北京: 北京经济出版社、1988.
- [3] 理查德·泰勒."错误"的行为: 行为经济学关于世界的思考,从个人到商业和社会[M].王晋,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
- [4] 丹·艾瑞里,怪诞行为学[M]. 赵德亮、夏蓓洁,译. 北京:中信出版社,2008.
- [5] 丹尼尔·卡尼曼著. 思考, 快与慢[M]. 胡晓姣、李爱民、何梦莹, 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2.
- [6] William Samuelson & Richard Zeckhauser. Status quo bias in decision making [J]. Journal of Risk and Uncertainty, 1988, volume 1, 7-59.
- [7] Fryer, R. G., Jr., Levitt, S. D., List, J., Sadoff, S. &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Enhancing the Efficacy of Teacher Incentives through Loss Aversion; A Field Experiment [R].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2012;. No. 18237.
- [8] 托德·罗斯. 平均的终结: 如何在崇尚标准化的世界中胜出[M]. 梁本彬, 张秘, 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7.
- [9] Boylan, M., Wolstenholme, C., Maxwell, B., Jay, T., Stevens, A., & Demack, S. (2016). Longitudinal evaluation of the Mathematics Teacher Exchange; China-England. Interim research report [EB/OL]. https://assets.publishing.service.gov.uk/government/uploads/system/uploads/attachment_data/file/536003/Mathematics_Teacher_Exchange_Interim_Report_FINAL_040716.pdf.
- [10] Bloom, Madaus & Hastings. Evaluation to Improve Learning M. New York; McGraw-Hill, 1981.
- [11] Benjamin S. Bloom. "Time and Learning" [M]. American Psychologist, 1974, 29(9): 682-688.
- [12] Benjamin S. Bloom. Human Characteristics and School Learning M. New York: McGraw-Hill, 1976.
- [13] 理查德·泰勒. 赢者的诅咒: 经济生活中的悖论与反常现象[M]. 陈宇峰、曲亮、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
- [14] 理査徳・泰勒, 卡斯・桑斯坦. 助推: 事关健康、财富与快乐的最佳选择[M]. 刘宁, 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09.
- [15] 乔治·阿克洛夫, 罗伯特·席勒著. 钓愚: 操纵与欺骗的经济学[M]. 张军, 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6.

(责任编辑 于小艳)

No. 2, 2022 General. No. 244

后数字时代的人与教育(专题笔谈)

栏目主持人语

中图分类号: G40-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6762(2022)02-0015-14

六十年前,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说,技术派生出的未经审视的观点,影响并导致了决定论在人类生活中"最大程度的非必要发展。"远离这类陷阱,"正是所有教育的目的。""难道我们不能摆脱我们自有技术的潜意识活动吗?难道教育的本质不是防护媒介的污染吗?""在任何文化中,尚未有人尝试去回答这些问题。"在数字技术如同空气和水一样,成为越来越的人的生存必需品的今天,麦氏的断言和诘问,值得讨论和追问。教育理论家与教育史家,似比过往重视"技术与教育",但深入讨论和无穷追问,至今不常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在1956年主持制定《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简称"十二年科技规划"),形成"以任务带学科"的规划科技模式,产生了深远影响。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新科技革命与教育"大讨论,极大地推进了"三个面向"(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的教育转型。对二者,理论家与史家情墨如金。

现在,我们迎来后数字时代。"后数字"混乱莫测,很难定义。它是数字的,也是模拟的;是技术的,也是非技术的;是生物的,也是信息的。后数字,既与我们的现有理论割裂,又是它们的延续。相应的"后数字思维",是关系性的,也总是在流变中,总处于(再)创造中。

后数字研究方法,意味着对教育和教育研究的后决定论和后工具主义的理解,将带来传统科学领域和学科之间更紧密的合作,与眼前的(后)疫情状况尤其相关。人是神话和信仰的生物。所有人类个体的生存,都处于生物、信息和社会的交汇之处。通过扩展对"他者"的眼界,我们相信,可以学到很多关乎我们自身的东西。所以,后数字理论不只是关乎学术研究。

《后数字科学与教育》一文,已有英文和西班牙文版。今译成汉语,再征集一些回应发表。这是一个非比寻常的对话机会。每篇回应,都有不同的内容和思想。德里克·福特(Derek Ford)将声音和嗓音与人的本质联系起来;艾莉森·麦肯齐(Alison Mac Kenzie)讨论了人类和算法之间的关系;彼得·麦克拉伦(Peter McLaren)关注"研究者和他或她的对象之间所存在的任何原始事件的转码或重新编码(过程)"。

可以说,与许多定位于单一文化框架的学术对话不同,这一专题,构成融汇古今东西的观念、知识和方法的后数字对话的一种方式,是一次真正的后数字聚会。我们选择的方法,是苏格拉底式的对话传统。它表明,在如今被称为"后数字"的奇异空间里,我们有可能走到一起,欣赏彼此之间的所有差异。

我们认识了新朋友,发现了新社群。这一群体,对形成新的后数字相聚方式与培养我们的文化和个人差异感兴趣。我们对专题的所有作者、译者和支持者,深表谢意。最重要的是,我们深信,这只是更大范围的后数字聚会和对话的一个起点。在"人类世"(Anthropocene),这样的聚会和对话,对人类的生存与福祉至关重要。我们期待,更多学者和其他人士,热情参与"后数字时代的人与教育"对话。

(栏目主持人简介:董标,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现代教育论丛》名誉主编;佩塔尔·扬德里克,克罗地亚萨格勒布应用科学大学教授。)

后数字科学与教育

佩塔尔・扬德里克 杰里米・诺克斯 蒂娜・贝斯利 托马斯・吕贝里 尤哈・苏兰塔 萨拉・海耶斯

我们已不再生活于这样的世界中:数字技术和媒体是分离的和虚拟的,是"自然的"人类和社会生活的"他者"。新世界催生一个新概念——"后数字"—— 在广泛的学科领域,这一概念正稳健地引起人们的关注,包括但不限于艺术、音乐、建筑、人文学科、(社会)科学,以及这些学科之间的许多跨学科、超学科(trans-)和后学科。经由林林总总的学科研究,"后数字"这一术语逐渐成为学术话语。英国爱丁堡大学的"数字教育研究中心"正考虑用"后数字"重新命名;英国考文垂大学近期成立"后数字文化中心";本文的诸位作者也担任了即将出版的《后数字科学与教育》期刊的编辑①。

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Nicholas Negroponte)大胆宣称:"面对现实吧,数字革命已经结束。"他的这篇题为《超越数字》的文章,发表在颇具影响力的《连线》杂志上,成为越来越多的后数字研究者的主要灵感来源。这当然不意味着,数字不再重要。尼葛洛庞帝继续说:"它的现实形式,即技术,已开始被视为理所当然,而其内在涵义将成为未来蕴育新思想的商业和文化养料。就像空气和饮用水一样,数字存在只会因其缺席而非因其在场而被察觉。"同样,弗洛里安·克拉默(Florian Cramer)写道:"'后数字'描述这样一种对待数字媒体的方式:它不再寻求技术的创新或提升,却主张数字化是俨然已发生的事。因此,需要更深远的重构。"2013年,柏林新媒体艺术节的一群研究者,经充分的同行讨论,形成一个较为普遍接受的、适用的"后数字"定义:

后数字,曾被理解为一种对"数字"美学之非物质主义的批判性反思。当下,则描述数字技术革命之后艺术和媒体混乱且矛盾的境况。"后数字"既不承认"旧"、"新"媒体的区别,也不在此、彼者中作意识形态择决。它融合"旧"与"新",经常将网络文化实验运用于模拟技术中,进行再研究、再运用。它倾向关注经验的而非概念的。它超越极权主义的创新意识形态,寻求自主能动性;也寻求脱离大数据资本主义的社会网络联结。与此同时,它已经商业化。

罗伯特·佩珀尔(Robert Pepperell)和迈克尔·庞特(Michael Punt)的《后数字之膜:想象、技术和欲望》(2000),是最早明确论述后数字的著作之一。他们在书中提出一个极具价值的定义:"后数字一词旨在认可技术的当下境况,同时拒绝接受'数字革命'一词中隐含的概念转变"——这种转变显然与如今充斥我们日常生活中机器的"开/关""零/一"逻辑一样突兀。这一定义,关注生物存在之连续的本性与数字技术之离散("开/关")的本性之间的差异。通过这种方式,它与以下概念紧密相连:唐娜·哈拉韦(Donna Haraway)之赛博女性主义(cyberfeminism)的后人本主义、凯瑟琳·海尔斯(Katherine Hayles)的"自由人本主义主体的解构",以及它们的赛博朋克(cyberpunk)根源,如威廉·吉布森(William Gibson)的《神经漫游者》。应对后数字挑战的这种方法,在在线教育、网络学习等领域、(身体的)认

① 该杂志(Postdigital Science and Education)首刊发于2019年初,斯普林格(Springer)出版社发行。——汉译者注。

同、(人类和组织的)创造力以及(数字的)技术与个人能动性之间的关系等问题上,尤为显著。

佩珀尔和庞特对后数字的定义,捕捉到我们所处历史时刻的某些方面:百年以来占据首要地位的物理学,在数字时代已经达到巅峰,现在正让位于生物学。戴森说:

20世纪是物理学的世纪,而21世纪将是生物学的天下。这已成为一种共识。关于即将到来的世纪,几乎所有人都同意以下两个事实:一是,无论从预算和从业人员的规模,还是从重大发现的产出来衡量,当下的生物学都比物理学更为庞大;二是,在整个21世纪,生物学很可能仍将是科学的最大组成部分。从造成的经济后果、伦理意涵或对人类福祉的影响来看,生物学也比物理学更为重要。

这听上去貌似合理,但生物技术学家克雷格・文特(Craig Venter)指出,问题不在于物理/数字和生物/模拟之间的争斗:

实际上,我们正从一个新的起点出发:我们一直把生物学数字化,此刻正试图通过设计和合成生命,从数字代码进入生物学的新阶段。所以,我们一直尝试提出宏大的问题。许多生物学家一直尝试,在不同层次上理解"生命是什么"的问题。我们试验了多种方法,将这一问题解析至最小构成。我们已经把它数字化将近20年了。当我们对人类基因组测序时,这一问题正从生物学的模拟世界进入计算机的数字世界。现在试问:能否从这个数字世界中再生生命或创造新的生命?

数字化生物学的挑战是技术的和科学的。随着新出现的伦理问题,如是否应允许基因组的版权保护?随着科学研究结构的新变化,包括但不限于大数据和算法的涉入;后数字的挑战,在深层次上也包含经济和政治方面。因此,迈克尔·彼得斯(Michael Peters)发展了"生物信息资本主义"概念,视之为"继商业资本主义、工业资本主义和知识资本主义之后的、基于新生物产业的投资与回报的第四代或第五代资本主义的新兴形式"。它"以一种自我组织和自我复制的代码为依据,利用信息革命和新生物革命的成果,将它们组成一个彼此促进和加强或强化的强大同盟"。生物信息资本主义,是物理的(数字),同时也是生物的(非数字)。由于产生了深刻的认知和伦理问题,如数字永生①。因此,它是后数字的。

即使从不完整的文献综述出发,也能发现,后数字的概念似乎很好地捕捉到了当代人类的生存境况(关于后数字的各种观点的详细概述,参见 Taffel, 2016)。然而,人们如今对各种"后"概念已有些厌倦——这是有充分理由的。在以丰沛的消费品充斥为特征的后工业社会,"无论如何都从未远离工厂生产的烟囱时代"。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著名的《历史的终结》,就被认定为是一种旨在使资本主义获得永生的意识形态建构:不管后现代主义早期有何允诺,它都没能实现超越现代主义的诺言。类似的批评,可以轻易地应用于后数字。既然它不能明确脱离现有理论,为什么要发明一个新的术语?在回应考克斯(Cox)的批评时,克莱默(Cramer)断言,对"后数字"中的"后",应有不同理解。他指出:

"后数字",可在流行文化和通俗的参照框架内得到更实用和更有意义的定义。这适用于"数字"概念,也适用于作为前缀的"后"。"后"这个前缀,不应被理解为与后现代主义和后历史主义相同的含义。应采取与下列概念类似的理解方式对待它:后朋克(朋克文化的延续,在某种程度上依

① 数字永生(digital immortality),指将人的个性以数据的形式存储到各种媒介(如电脑)中,并使它未来继续与他人交流。这一数据档案就像是个人的网络化身,可以与他人互动,并像人一样思考。个体生命逝去之后,这一网络化身或静止不变,或自动继续学习和发展,在数字的世界获得永生。——汉译者注。

然是朋克的、但也超越了朋克)、后共产主义(正如东欧前共产国家此刻经历的社会政治现实)、后女权主义(作为女权主义经过批判性修正的延续,与"传统的"和无前缀的女权主义之间界限模糊)、后殖民主义……以及,在更低程度上的后世界末日主义(一个大灾变还未结束的世界,但已从一个离散的断裂点发展到一种持续状态——即海德格尔所指的"自在发生到存在"①(Ereignis to Being)——且具有由1980年代的电影《疯狂的麦克斯》所开创的当代流行图示)。

因此,克莱默在一个经常被引用的章节"什么是'后数字'"中,通俗地将"后数字"描述为"一个糟糕但有用的术语"。

回到前面讨论的"后人本主义"理论,理解前缀"后"的关键维度。尼尔·巴明顿(Neil Badmington)对这些"后",同样持谨慎态度。他将"后人本主义"描述为"一种便捷的速记,用以刻画'我们'无可奈何、不得不称之为'人本主义'的一种普遍危机"。就像人本主义可被认为是一种灾难,也能把"数字"看作正在经历的一个类似困境。当今,强大的、避税的互联网公司四处横行,算法修补"个人的"媒体流,数据存储和处理造成恶劣生态环境影响。在此大背景下,早期网络所特有的自由的、开放的和共识性的社区乌托邦愿景,显得相当遥远。在"后真相"时代(又一个"后"!)(参见 Peters, Rider, Hyvonen, & Besley, 2018),似曾象征日常所理解的数字的效率、生产力和客观性的光辉,已被揭露出来的偏见、歧视和不平等所玷污。

硅谷为广泛的社会问题提供了灵活便捷的解决方案,但这并不是一个好的开端,因为它对一些社会问题或许过于简化。同时,大数据和算法所允诺的"革命",往往倾向于再现其自身预设的偏见。人们愈发关注数字之实际的、具体的、社会的和物质的影响,这与将其看作"虚拟、虚无缥缈且毫无'真实'效果"的倾向,形成鲜明对比。2018 年,关注社会—技术体系的伦理道德维度、以"公平、问责和透明"为主题的一次学术大会,②反映了这一点。因此,我们可以给后数字的"后"附加一个新的、有价值的含义:一个"负责任"的数字,寻求超越工具效率的允诺。在这些技术日益渗透到社会生活中时,对其现实影响建立批判性理解。不吁求其终结。

后数字很难定义。它混乱莫测,是数字的也是模拟的,是技术的也是非技术的,是生物的也是信息的。"后数字",既与我们的现有理论割裂,又是它们的延续。这种混乱,似乎内在于现今人类境况中。比如,当前的(学术)出版危机,正是对知识产权的前数字理解与创建和传播其内容的数字方式之间的混乱关系的结果。教育商品化所面临的挑战,并不源于数字科技,但其主要方面(包括但不限于自动评价),不能被认为与数字技术毫无干系。后数字挑战提出重要的认知问题——这些问题在大数据和算法研究领域以及网络学习的相关前景中,尤为显眼。在这些领域,人们刚开始评估人类和非人类活动的聚合所带来的个体性和社会性后果,刚开始提出清晰辨别两种后果的能力问题。

过去,网络学习领域的典型特点,是对网络技术所带来的"数字"和"虚拟"方面特别感兴趣,通常侧重于"在线课程",即各个人坐在家中通过台式电脑与"虚拟会议室"中的其他学习者连接。当今,网络学习显然正变得愈发多样化。

互联网接入的普及(在世界某些地方)和移动技术(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和智能手机)拥有量的剧增,正在改变进行网络学习的空间和方式。从主要由"远程教育"所使用的虚拟学习环境到成

① 对"Ereignis"一词的翻译,参考《也谈海德格尔"Ereignis"的中文翻译和理解》(王庆节, 2003)一文。——汉译者注

② 参考网址: https://fatconference.org/. ——汉译者注

为所有高等教育学生的标准配备;从信息通信技术(ICT)和作为实验室中一项深奥活动的学习,到成为校园和课堂活动中的普遍存在(无论是否有意识或无意识地代表教师);从主要在家工作到人们在火车上或咖啡厅的移动状态中进行网上活动,及学生们在分布式工作和校园会议之间切换进行。

这反映在对网络学习的社会物质性、社会一物质实践及网络学习的在地化空间观念持续增长的兴趣上,比如,对探索学生小组工作的兴趣。此外,里伯格(Ryberg)、戴维森(Davidsen)和霍奇森(Hodgson),对过分关注"数字科技"提出警告,认为这会忽视当代学生的技术实践,是物理和数字的技术、空间、活动与时间之间的复杂纠葛。网络学习的研究者,时刻处在探索后数字挑战的前沿。他们认定,"数字"这一术语存在问题。

密集数据处理的出现,逐渐将数字卷入教育假定的"人性"之中,对视技术为一种外部"提升"的普遍看法提出了挑战,还质疑关于学习过程本身的惯常假设。后数字挑战,同样适用于对劳动的研究。社会加速和普遍的技术性失业的前景(或威胁),在很大程度上,能打破人类通过工作构建自身的传统观念,能打破长久以来在教育技术政策中将人类学术劳动边缘化的言语的假设。这种言语的假设,蕴含如此神话:技术本身具有与生俱来的力量,能对人的学习方式产生积极的、市场驱动性的改变。摆在我们面前的道路,是抵制在教育中以消费者为中心的去人性化要素,重新构思一种与人本身融合而非排斥的课程[体系或模式]。

的确,"后数字"与物理学和生物学存在复杂关系,与"生物信息资本主义"概念(2012)紧密相关。后数字挑战,超越了技术决定论,探求别样的未来,如激进的教育平等和网络共产主义,寻觅批判教育学的新契机。宛如后数字过度决定了社会政治格局,它未经任何人"许可",进入学生和教师的衣袋里的课堂(通过他们的移动设备),浸入教学过程中,打破正式和非正式的教与学的界限:非反思的确定性,变成了反思的不确定性。因此,"'由后数字'产生的断裂,既不是绝对的,也不是同步的,而是异步运行,以不同的速度、在不同的时期发生。在各个受其影响的环境中,具有文化多样性"。

后数字挑战就在我们身边。在公共话语中,它不幸未能以美名善终,带上了早期"后概念"的一些沉重包袱。因而,"后数字"术语可能易招致一些挑剔的批评。从好的方面看,它能提供历史的延续性,帮我们从早期的理论中学习,甚至能帮我们避免一个怪异的概念陷阱。从超越专门术语来看,"后数字"术语的当代用法,确实描绘了此时此刻我们作为个人和集体所经历的与技术的关系。它表明,我们逐渐认识到,在物理学和生物学、旧媒体和新媒体、人本主义和后人本主义、知识资本主义和生物信息资本主义之间,存在模糊且混乱的关系。我们或许更愿意冠以新名号前进,但我们的确认识到,后数字境况,是当今科学、教育、艺术以及人类旨趣的其它各个领域的巨大挑战之一。总之,后数字概念有不少缺陷,我们仍然拥护它,更期待它发展壮大。

【作者简介:佩塔尔·扬德里克(Petar Jandrić,克罗地亚萨格勒布应用科学大学教授;杰里米·诺克斯(Jeremy Knox),英国爱丁堡大学讲师;蒂娜·贝斯利(Tina Besley),中国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托马斯·吕贝里(Thomas Ryberg),丹麦奥尔堡大学教授;尤哈·苏兰塔(Juha Suoranta),芬兰坦佩雷大学教授;萨拉·海耶斯(Sarah Hayes),英国伍尔弗汉普顿大学教授。译者简介:闫斐,香港教育大学国际教育学系博士后。】

转码现实的后数字进路:对《后数字科学与教育》的回应

彼得·麦克拉伦

在知识与现实之间

在过去几十年间,学者们撰写了大量关于现代性与启蒙运动的文章,并正告人类:我们已迈入一个崭新的阶段——后现代主义时代。这种哲思式的探讨在学术界(至少在北美)并没持续太久,其中的大部分最初由对科学马克思主义(Scientific Marxism)的批判引发。早在公元六世纪,形而上学实在论就已经被预设为唯一可能的哲学立场。从那时起,思想家们各自开启了对知识必须以某种基本方式反映现实这一主流假设的挑战。我们只须稍加回忆色诺芬尼(Xenophanes)、皮浪(Pyrrho)、塞克斯都·恩披里柯(Sextus Empiricus)、康德、詹巴蒂斯塔·维科(Giambattista Vico)、贝特森(Bateson)、杜威和皮亚杰等人的一系列探索,乃至乔治·凯利(George A. Kelley)的个人建构理论(personal construct theory)。维柯的思想在很多方面预示了后结构主义者。他认为"客观"现实图像性地存在于人类理解或经验领域之外,因为它必然受到物质条件的限制。不管这些条件的物质或抽象程度如何,它们总是由先前构造的结果(the results of prior construction)组成。(Von Glasersfeld 1984: 30-31)。

正如知识不能指向现实与真理之间的对应一样,佩塔尔·扬德里克(Petar Jandrić)等人(2018)的后数字探索也无法让我们更接近人类经验的"终极"真理,它必然一直是一种推测性解释。我认为这是佩塔尔·扬德里克等人(2018)试图给予当代学者的一个告诫。"后数字"这一术语并不意味着要包含一种全面的崭新世界观。它更像是一个可以稍微改变我们思维范式的启发式装置,一个可以折射当今技术光谱更多带宽的棱镜或透镜。那它是一个有价值的装置,一个模拟(analog)与数字(digital)的有价值的接替物吗?

我们是否正被告知,只有当我们的数字领悟力崩溃时,我们才能经由我们所构筑的现实中的数字空缺(the digital gaps)来认识这个世界?不,这是对扬德里克等人(2018)的过度解读。但我确实同意,借助后数字这一透镜看待这个世界,会给我们一个能补足这些空缺的更详细的现实图景。这让我想起了关于宇宙生成的"填补空缺的上帝 (God of the gaps)"之神学解释:当科学无法解释某件事时,当我们的理解存在"空缺"时,那就只能依靠超自然的创造者来解释。但这种解释也不过是另一种意识形态构造,它的"崩溃"只能用我们自己的构造来诠释,直到我们的构造瓦解。因此,即使后数字这一概念让我们对世界有了更细致入微的理解,它也永远无法完全补足空缺。

后数字真相

这一立场与福柯的论点相吻合,即真理由多重形态的限制所生产。由是观之,后数字只是我们在

理解生活世界时的另一个限制。对福柯来说,真理必须从绝对的领域中移除,并被视作决定何者为真时的易变(changes)(Foucault 1980: 131)。正如我们不能再要求一种在被限定的合理性内运作的经验科学,其可能性范围与预测的形式标准、线性因果关系(结果与原因成正比)等紧密关联。我们不能草率地得出这样的结论,即理解世界的最佳理路是通过量子物理学家的思想实验——或是后数字。与此同时,我们又不能落入后真相陷阱,这一陷阱如此令人不安地描述当下特朗普(Trump)的追随者,这些追随者拒绝区分基于科学证据的论点和纯粹主观意见(MacKenzie, Rose, and Bhatt 2021)。作为学者,我们至少需要同意:尽管我们不能充分理解现实,但我们可以部分了解它。

诚然,我们再也不能屈服于基于可指定和可验证的认识论标准的理论。同时,我们也不能接受任何形式的激进主观主义,该主义认为世界仅仅存在于我们的头脑中——我们称这种认识论立场为唯我论。那么,难道后数字世界只是激进建构主义的另一种形式吗?正如扬德里克等人(2018)使用的那样,它是否与唐娜·哈拉韦(Donna Haraway)的赛博女性主义兼容?我们能否将其恰当地描述为后人类的"自由人本主义主体的解构"?

我确实同意,作为理解人类存在的平台,数字技术非常适合作为解释和推进物理学的媒介,然而,随着我们在人类基因组和进化生物学等方面的突破(Jandrić 2021),我们现在已朝着一种对现实的生物学理解迈进。当我参与人类基因组项目,被邀请去培训民族志学家时(我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研究方法的研究生课程 20 年),我断然拒绝了,因为当时的研究人员正在考虑获得中美洲土著群体 DNA的版权。我的拒绝是出于伦理考虑,认为这是一种生物殖民主义。

对我来说,比使用"后数字"这个术语的认识论优势更重要的是该词的伦理意涵。此处要吸取的教训是,我们不能将社会的偶然性误认为是我们社会中的决定性力量,这一力量对我们看待现实的方式施加霸权化的影响。哪些决定性是最危险的呢?在我看来,与贫困、不平等相关的资本主义和气候危机必须被列入这一名单。我想我们都同意,存在一些调控结构(structures of mediation),这些结构影响我们如何理解我们的经验,以及我们如何在特定历史时刻构造这些结构。不存在位于可被反驳的理论之外的世界中事实(facts-in-the-world),除非我们试图寻求一个存在于物质领域之外的形而上学存在——如此我们又回到了"填补空缺的上帝"。的确,科学须要放弃发现终极真理的直接特权。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经常谈论真理体制(regimes of truth),而不是寻求终极真理,以及为什么我们应该考虑,在福柯之后,知识和真理如何被权力构造所调控的原因。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后数字这一概念仅是关于我们如何看待世界的最新控制策略,或是终极真理体制的一种新应用?它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将我们与后数字技术、人工智能、机器人、生产的社会关系绑定在一起的权力的微观物理学(the microphysics of power)吗?会出现一个叫做后数字马克思主义的新领域吗?

也许是的。我们能从中吸取的教训是:我们须摒弃科学观察——无论是模拟、数字还是后数字——与现实是同构的这一观点,同时,也将 19 世纪版本的科学或 21 世纪版本的科学可以成为社会问题的"自然的"仲裁者这一信念扔进垃圾桶。问题不在于我们生活在一个在历史和认识论上先于人类认知并独立于人类认知的唯物主义世界,而在于外部世界是否独立于认知的社会特性(Stanley Aronowitz [1980] 就此主题写过文章)。我们可以对人类存在的社会特性做出伦理判断。这是后数字理念可以启发性地帮助我们理解资本主义的一种方式。

后数字封建主义和新资本主义

根据亚尼斯·瓦鲁法基斯(Yanis Varoufakis)(2021)的说法,我们当前正处于后数字封建主义或技术封建主义时代。他描述了当今资本主义不断变化和流动的结构形态,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结构越是有力地与当代社会的神经系统相结合,如同一个控制论的蜂群思维,就越不容易被人察觉。瓦鲁法基斯(2021)的基本假设是:"如今,全球经济由中央银行不断发行的货币推动,而不是由私人利润驱动。与此同时,价值的提炼越来越多地从市场转移到像脸书(Facebook)和亚马逊等数字平台上,这些平台的运营不再像寡头垄断企业,而是更像私人领地或庄园。"

这些新的领地如同电视连续剧《权力的游戏》(Game of Thrones)中的那样残酷,甚至更加灾厄;他们构成了由 MANGA(Meta、Apple、Netflix 和 Google)公司领导的全新技术宰制。这些企业拥有一种对当今真实数字领域行使整全权力的不可思议之能为。这一权力使这些企业能够干预地方和国际政治,并对我们的经济和政治命运产生有害影响,就因为他们控制着媒体、大数据和顶级平台。它们的掠夺本性使它们不仅占领大片的虚拟数字领地,增加对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的控制,而且经常从事游说、违抗税法和垄断控制等不法活动(Tandon 2021)。强大的计算能力、集中在 CEO 手中的空前经济实力、构建自身运作其中的社会之意识形态范畴的潜力,使它们成为超级反派的首选,每位都寻求足以摧毁中土世界的最终"魔戒"(Tolkien 2020)。

是的,如果我们愿意把技术-封建主义看作一种后数字经济的形式,那么我们就有了一个强有力的论据。这是否意味着我们不得不将后数字的概念扩展到哲学等其它领域,从而我们将有后数字唯心主义、后数字理性主义、后数字唯名论、后数字唯实论和后数字怀疑主义?这得由哲学家们决定。只要我们记住"活体生物的行为结构永远不能充当一个'客观'世界的论断基础以及一个或许先于经验的世界"(Von Glasersfeld 1984: 4)。

我们对世界如何运转所做的决策总是源自"对主题的定性评定——通常是无意识的评定"(Wilden 1980: 104)。这仅仅意味着我们应认识到,在研究者和他或她的对象之间,总是存在对所有原始事件的转码或重新编码。若是我们想将转码过程称为"后数字",以及如果了解我们的基因被后数字技术修改的方式或者了解我们的脊柱与互联网平台融合的方式,就能够帮助我们重构或重新"认识"现实,从而帮助我们建设一个更美好的世界,那么这是可取的。只要我们不陷入某种新的"后数字"伦理,在这种伦理中,我们将在不久的将来被某种人工智能机器审判。

【作者简介:彼得·麦克拉伦(Peter McLaren),美国查普曼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译者简介:虞嘉琦、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博士后。】

"后"之丰饶性与人际关系的腐蚀: 对《后数字科学和教育》的回应

艾莉森·麦肯齐

什么是后数字

如果你须要回答"后数字"在科学和教育领域中的含义是什么,那么你可以从《后数字科学和教育》(Jandri ć, et al. 2018)这篇文章开始探索。文章的作者们对后数字进行了严密而周全的概述,不仅是在教育、科学和艺术领域,也包括对后数字中的"后"的解读。你将了解,它与后人文主义、后女性主义或后现代主义中的"后"并不相同。后数字中的那种"后"不是与过去的简单决裂,即放弃不值得信任并令人气馁的运动(现代主义),也不是表达对哲学能解决不公正问题的怀疑(后现代主义的失望)——有趣的是,所有这些运动都提出了重要的伦理和道德问题。比如,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者问道:作为一个自主的(选择自己目标的人)和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人,一个能为自己做决定的人,意味着什么?当我们仍不能坦诚认识造成妇女不平等地位的原因时,平等对女性真正意味着什么?扬德里克(Jandri ć)等作者(Jandri ć, et al. 2018)试图让我们理解的是:"后数字"意味着对正在进行中的普遍数字化进程的接受、延续、重识、重构和重置。后数字中的"后"是一种声明,表明数字已是我们生活中的一个事实,就像"空气和饮用水"(Negroponte 1998)。数字不可逆转——我们无法摆脱它。

问题就出在这里。尽管后数字的机遇对教育而言令人激动,如在线教学以及(几乎)无论身处世界何处的学生都能轻易访问在线资源,但正如扬德里克等作者(Jandrić, et al. 2018)所清晰地理解并警示,我们要担忧很多事情。我认为,下面这段经典论述正表达了这一忧虑:

当今,强大、避税的互联网公司四处横行,算法修补"个人的"媒体流,政治干预社交媒体,数据存储和处理造成恶劣生态环境影响。在此大背景下,早期网络所特有的自由的、开放的和共识性的社区乌托邦愿景,显得相当遥远。(Jandrić, et al. 2018: 895)

看上去,几乎可以肯定地说,数字对我们的福祉、选择、自由、民主和真理造成重大而持久的损害。这些令人不安的问题已被充分记录。比如,MacKenzie, et al. 2021;《后数字科学与教育》杂志一期特刊中的《网络上的谎言、胡扯和假新闻:我们应该担忧吗?》一文以及《后数字科学和教育》这本期刊。)

当我们最终死亡之后(相对于我们的后数字死亡),我们如何从互联网上抹去我们的存在?数字世界中的死亡生活是一个须重视的问题,并成为一个新兴研究领域。在他们所编辑的文集的导言中,萨文·巴登(Savin-Baden)和梅森·罗比(Mason-Robbie)(2020)呈现了一个让人信服的概述,关于我们当下如何实现并保护我们在网络上的永生(我们如何消除我们的数字存在的难题是另一个议题)。作者列举了致力于创造数字永生人物的公司,如 LiftNaut 和 Eternime。他们讨论了平台如何从事人格捕捉、意识上传和模拟级别,以及如何处理人类数据挖掘,这些都展现了"由计算启发的"关于死后生命的理

论。这些理论可以彻底改变宗教的实践方式(Savin-Baden and Mason-Robbie 2020: 1)。萨文·巴登和梅森·罗比建议,我们需要理解:"尽管已经逝去,死者如何仍在社会中存活"(2)。我们还不清楚数字世界中死亡后的人生将如何影响信仰、仪式、家庭以及我们与已逝亲人的关系。

去世后的数字人生,引出另一个"后",根据萨文·巴登的解释,后数字神学(宗教研究);

本质上难以捉摸。它不同于后现代之中的"后",而是关于后数字与神学的流转性……人们的确以他们的书信、传记和电影的方式存活,不过即使这些也一直被改变。人们将自己嵌入祖父母的相片中;电影明星留下遗产,被用来为后人设立基金,因为他们的数字存在仍在电影中被重复使用。(Savin-Baden and MacKenzie 2021)

萨文·巴登对后数字的分析与扬德里奇等作者 (2018)的分析相似。不过,如果我们留意后数字的流变性和不可捉摸,我们应立即意识到我们还在处理另一个新的数字问题——逝后数字伤害。至少在英国,立法还未解决关于一个人故去后的隐私、名誉保护、自尊及数字自杀相关的法律和伦理议题(参见Savin-Baden 2021)。

选择・自由・真相

让我们回到一个熟悉的问题——社交媒体。扬德里克等作者 (2018) 在讨论中纳入了迈克尔 · 彼得斯(Michael Peters)(2012)关于"生物信息资本主义"的观点,这很有帮助。这是一种基于投资生物产业的资本主义形式。这种生物投资包括生物的数字化,比如已被置入计算机数字世界的人类基因组(参见 Venter 2008)。生物信息资本"基于自我组织和自我复制的代码,利用信息和新生物革命的成果,并将它们绑定为一个强大的同盟,以彼此强化(Peters 2012: 105)。正如我们所知,数字技术非常聪明,也善于操纵。脸书(Facebook)等平台的设计者非常了解人类心理,因此,任何使用社交媒体并相信自己在自由选择阅读或查阅内容的人,都应该警醒。设计者们正在操纵我们的选择。

人类根本上是社交生物——没有他人的帮助,我们无法生存。我们的大脑是社会性的大脑。然而,我们的社会属性——我们对其他人类的需求,意味着我们易于被利用和操纵。不奇怪,我们非常易于被那些说服技术所影响。它们塑造了我们的态度、自我概念、情感、信念——从攫取并保持我们的注意力中获利。通过不断使用,比如照片墙(Instagram,一款图像社交应用程序),算法训练我们神经网络的行为方式。这一方式能为脸书、推特(Twitter)和抖音(TikTok)等大型科技公司带来巨额利润。那些说服技术能在我们不曾意识到的情况下做到这一点(这种意识的缺乏在经济上非常有利可图)。正如人文技术中心(Center for Humane Technology)(2021)告知我们的:"我们并不是随机点击:许多设计故意利用我们最深层的弱点,促进让人不能自拔的行为,损害我们的自主性和福祉。"

人文技术中心(2021)列出了伤害我们福祉和自主性(选择的自由)的六种方式:(1)让琐事显得紧迫;(2)鼓励寻求而不满足;(3)迫使我们处理多个任务;(4)使恐惧和焦虑成为武器;(5)鼓励社会比较;(6)告诉我们任何我们想要相信的事情。我将简要介绍社交媒体"侵入"我们的神经网络的三种方式。

一是"让琐事显得紧迫"。我们的注意力范围有限,必须迅速决定需要关注什么。我们的哺乳动物大脑通过"凸显网络"(salience network)操作我们的注意力,该网络包括前脑岛和背侧前扣带皮层。当凸显网络被激活,我们对威胁和机会保持警觉,我们的大脑将它的资源导向新的来源。我们电话或电脑里的消息通知,如震动、砰的声音以及信息条,都触发凸显网络。这些精心设计的通知操纵我们去回

应我们所认为的重要信息。事实上,一般这些信息都是琐事。我们失去关注重要事物的能力。

二是"鼓励寻求而不满足"。如果经常触发中脑边缘多巴胺系统(一种关于奖赏和愉悦系统的大脑回路),那么即使我们非常需要某物(如香烟),我们也不感到满足。我们需要摄入更多这种东西,如尼古丁,才能获得同样的原本快乐。这就是成瘾的路径。技术利用了这种让我们渴望某物的强大回路。通过刺激奖励和愉悦系统,技术拥有了让我们沉溺于我们的设备的无限可能性。"……我们不断点击和向下滑动,无意识地消费内容,往往正是在大脑认知控制区域的最弱监管下。(人文技术中心,2020)

三是与我自己的研究兴趣和伦理兴趣相关的一个领域,即"告诉我们任何我们想要相信的事情"。我们很少通过系统和批判的获悉过程来相信事情,如阅读学术文献和书籍。我们的信仰通过媒体和我们的社会阶层,在家庭、学校和社区中形成。通过那些对我们来说常常是不为所知的(或者不易察觉的)实践,我们产生并再生产知识和意义。当我们思考我们的信仰从何而来,我们倾向于认为我们选择了那些信仰并自愿实践(免于强迫、控制或操纵)。后数字告诉我们,我们天真地相信我们是自由选择停留在我们的设备上并搜寻内容。我们与数字世界持续且不可避免地接触,意味着软件算法了解我们的偏好,并定制和策划我们收到的信息。算法配置可以创造回音室和认知气泡,将我们限制在(或困在)信以为真的思想和实践体系中,把它们当作事物自然秩序的证据。挑战我们信念的信息被当作错误信息而被摈弃。当算法告诉我们的是我们想要相信的事情时,不同版本的现实浮现。其结果是社群和社会的两极分化(想想当下的美国),我们的共同理解不复存在(Centre for Humane Technology 2021; see MacKenzie et al. 2021)

新的后数字秩序

尽管存在这个前缀的问题,后数字是丰饶多产的(创造大量机会)。后数字的现实世界同样丰饶多产,就多样性和变化而言,具有无尽的机会。正如这些作者所总结的那样,当我们超越专门术语来看,"'后数字'术语的当代用法,确实描绘了此时此刻我们作为个人和集体所经历的与技术的关系"(Jandrić, et al. 2018: 896)。但是,正如我们所见,通过看似客观且超越个体的数学公式,后数字拥有将人际关系腐蚀的能力(数学并不区别对待。二加二等于四——永远如此!)。

然而,我们知道这不是真的。这些公式确实导致不公正和不平等。布迪厄(Bourdieu)敏锐地观察到:

再生产统治关系的活动越是依仗于客观机制,这一机制服务于统治者的利益而不需要后者任何有意识地努力,这一活动就越间接,某种意义上,也更非个人化,成为客观地导向再生产的策略。(Bourdieu 1977: 189)

这意味着算法现在成为统治群体。在我们不知晓它们如此做的情况下,它们塑造、说服、操纵,并让我们做某事。(只要想想我们的手指在电子/手机屏幕上是如何不断下滑、下滑、下滑……下滑。我们上瘾了。)这些算法是新的机制,再生产不公正、不平等以及新秩序的特权。这种新的后数字秩序通过上瘾和操纵的过程实现,直接针对维系人类生命的器官:我们的大脑。

【作者简介:艾莉森·麦肯齐(Alison MacKenzie),英国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高级讲师。译者简介: 闫斐,香港教育大学国际教育学系博士后。】

后数字声音教育学:回应《后数字科学与教育》

徳里克・R・福特

后数字的构想"既是我们现存理论的破裂也是其延续"(Jandric et al. 2018: 895)。在这篇回应中,我想指向后数字的城市声音环境。通常而言,城市是喧哗与忙碌的。广泛而密集的喋喋不休与喧闹不已来自聚集和流通的行人、汽车、公共汽车、卡车和自行车,来自建筑工地、修理和拆除活动,以及街头艺人和手机里的音乐,它们络绎不绝。我们暴露于众多声音之中,这种暴露为城市注入活力,迫使我们与那些吸引与分散自身注意力的差异、他者、陌生人相遇。布兰登·拉贝尔(Brandon LaBelle,2018)将当代知识经济中那些在城市环境中运作且被数字资本主义及其网络所架构的声音能动者(the sonic agency)称为"监听者(the overheard)"①。当然,可听的总是比听到的多,在我能处理的可听物(the audible)与那些构成听觉氛围的不可听物(the inaudible)之间总是还有一些别的东西。

在网络时代,声音的轮廓以多种构成性的(constitutive)方式转变。日益引入的智力、认知和情感劳动"通过愈加将物质与不再必然依赖有机身体的'智能(intelligence)'和'能动性(agency)'模式②联系起来的方式,重新定义了物质由何构成"(LaBelle 2018: 63)。主体被卷入广泛的网络中,而这些网络扩展和重构着我们关注声音的模式。我们高度地暴露于看不见也不知晓的他者的声音中,同时,我们自身也被迫参与到网络化的通信中,这些通信又放大了流通中的声音的数量。喋喋不休的内容多了,监听(to overhear)和被监听(to be overheard)的机会也多了。

监听,是被一种噪音打断,"一种有了它就可能形成什么但又还没真正形成什么的噪音"(LaBelle 2018:67)。作为一种中断,被监听到的(the overheard)是一个潜在的突现。存在一些高于或低于可听物(the audible)的东西,而我可能会尽力去调避(tune out)或是接收(tune in)它。我可能提高自己的嗓音或远离它,或者我可能通过加入一个新对话来回应;稍后回想它,尝试拼凑它,或是随后琢磨。城市噪音促发了一种"挑战社会社群的音调(tonalities)的潜能,但这情况可能同等地丰富了这些音调的形状与形式的活力",支持"一种他异性(alterity)与社会包容的动态(dynamics)"(LaBelle 2018:72)。我们

① 根据拉贝尔(LaBelle)在 Sonic Agency 一书中有关 the overheard 的专章讨论, "the overheard"指电子信息技术与资本主义融合背景下出现的能够捕捉、监控和治理各种声音的新技术及其渗透性的力量网络。(译者注)

② 在拉贝尔(LaBelle)的原文中,这句引文之前,拉贝尔引述了政治理论家简·贝内特(Jane Bennett)在其专著 Vibrant Matter 中有关新物质主义(new materialism)的相关观点。这种观点认为"政治理论需要更好地关注和认可非人类力量在事件中的积极参与",要认识到"能动性(agency)总是作为人类和非人类力量的特别配置的效果出现,并不特属于人类领域",且这种理论"致力于识别影响情势和事件的力量网络"。(参见杜克大学出版社官网上对 Vibrant Matter 一书的简介: https://www.dukeupress.edu/Vibrant-Matter/)结合文章上下文语境,或许可以理解为,在后数字资本主义的网络时代,肉身和物质的形态(包括声音的轮廓)被渗透性的、延伸性的以及能动性的电子网络平台以及各种线上参与活动(这可以视为网民不自知完成的一种智力、认知和情感劳动,因为普通人的网络活动在为各种网络巨头平台创造利益)重新定义。(译者注)

可能欲求着监听(overhearing)或被监听(being overheard),也或许从中退缩。

在数字网络时代,我们通过评论、点赞和转发来扩展自己,但我们也体验着更强的脆弱性,因为我们的声音有机会被盗取(be snatched)和占有(be appropriated)。虽然声音因其自如来去而天然地转瞬即逝,因进入我而必然是亲密的,虽然它是不稳定的,总是多于或少于我以为我所听到的,它也并不"必然逃离全球文化固有的规制性原则(ordering principles)、算法代码与社会技术结构"(LaBelle 2018:64)。在网络化资本主义中,这正愈发变得可能,因为如此多的通信模式都是由那些捕捉、监控我们声音并将其商品化的企业与国家平台所构建。

在这些可能性选择之间,当一个人在城市中穿行,很明显,此人更有可能被资本与国家监听(be overheard),而不是去监听(to overhear)其他陌生人。声音必定是一种空气振动的关系性运动,可以连接与改变我们;这振动真正地(literally)进入我们。但是什么声音进入,它们如何进入,它们如何被接收,以及出于什么目的,则是另一个问题了。一个马克·哈古德(Mack Hagood, 2009)在其关于俄耳甫斯式媒介(orphic media)①装置的研究中帮助解释的问题,这些装置给个体提供了调控声音环境、自身接收的共鸣(resonances)和暴露其中的干扰的手段,并能使它们都变得个性化。哈古德(2019:10)说,这些功能"压制了我们这个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和日益'以信息为中心'的社会中的一个尖锐的矛盾,它引发了对一个专注的、自由的和离身的(disembodied)主体的迫切需求,同时也使一直否定这种主体之可能性的环境条件复杂化。它们是对自由资本主义的"声波修复(sonic fix)",因为它们将一个系统性的社会问题(即声音)转变为一个通过市场交换来解决的个体问题。

无论是在正式场合还是日常场合,"我们习惯于听(hear)我们所惯听的(listen for),并假设我们听到的是无可争议的"(Eidsheim 2019: 50),以致于当"我们随后听到它们,并且因为我们听到它们,我们便相信感知到的意义已被验证"(51)。当我们正聆听的和我们所听到的之间存在一个差距时,这最为明显。尼娜·孙·艾德森(Nina Sun Eidsheim)曾提供一个突出的例子,关于一位叫安吉丽娜·乔丹(Angelina Jordan)的年轻挪威女孩表演比莉·哈乐黛②(Billie Holiday)的《黑色星期天》(Gloomy Sunday)一曲。令观众(包括乔丹进行表演的电视节目里的观众,艾德森展示自身研究时的观众以及艾德森自己)震惊的是,他们有关嗓音(voice)③是一个独特身份的本质性表达的信念被打破了。哈乐黛的嗓音一直被本质化为黑人苦难的表达与她自己独特的自传;它被听作是一个黑人(Blackness)的故事和她自身的苦难、悲剧等故事的表达。那么这个来自挪威的年轻女孩怎么会听起来如此相似?

这个破坏在教育学上(pedagogically)是强有力的,但也是含混的。一方面,它能强化我们对音色(timbre)作为本质的承诺。这种情况中,"听者在他或她的脑海中持有一个原初嗓音(voice)的图像,并把它与现有证据进行比较,这些证据是或多或少具有某种保真度的良好的(嗓音)复制品"(Eidsheim

① "俄耳甫斯式媒介"(orphic media)是哈古德提出和探讨的一个声音研究领域的概念。他曾在一个学术访谈中提到,之所以选择这个术语,源自他本人对古希腊神话人物俄耳甫斯(Orpheus)的迷恋。在希腊神话中,俄耳甫斯是一位能够弹奏强大乐声并具备非凡音乐天赋的角色。哈古德用"俄耳甫斯式的媒介"来指称当代生活中已较为普及的声音自控(sonic self-control)装置,例如:降噪耳机、白噪音机,以及手机上丰富的提供自然声音的移动应用(apps)等。参见杜克大学出版社对哈古德的一则采访:Q&A with Mack Hagood, Author of Hush。(译者注)

② Billie Holiday(1915-1959),美国著名黑人爵士歌手。(译者注)

③ 参 Merrian-Webester 辞典有关 voice 和 sound 的定义, voice 是比 sound 更具体的概念, 前者主要是人类用自身器官发出的声音,后者指任何可被人类听觉所感受的感觉和存在。(译者注)

2019:164)。换句话说,音色并未被作为音色听见。另一方面,音色与本质间的关系会被弱化。当我们"既听到眼前歌手的嗓音又听到那个改变有关被模仿嗓音的观念(idea)的嗓音",我们应该会被触动进而"质疑关于声乐本质的假设所依赖的基础"(Eidsheim 2019:165)。那么,教育学的任务就是要去聆听(listen to)我们的聆听实践(listening)。

对艾德森而言,这种教育学包括"证明探索每个嗓音中固有的广泛音色潜能的实际经验为任何单一音色提供了一个视角"(57),因而"每一个音色的品质或意义都可以被审视"(58)。作为一种无限的潜能,音色本身并不拥有或传达任何意义;相反,"任何和所有的意义都在形式之外产生"(184)。这并不意味着排斥政治,而是将政治与潜能保持在张力状态。当我们意识到"一种(音色的)风格与技巧的集合可以通过一个名称来区分,那它也可能通过另一个名称来区分,还有另一个名称,以及再一个名称"(193)。音色的无限潜能通过每一个特定的切实化(actualization)而显现出来,这个过程挑战了关于人的"本质"的假设。

这种教育学过程(pedagogical process)的一个后数字案例可在自动调谐(autotune)技术中找到。有趣的是,人们开发自动调谐技术是为了通过消除偏离于预期声音的音高和频率的偏差来纠正或加强人的乐声(vocal sounds)。那么,在某种意义上,开发此类技术是为了关闭音色的多样可能性。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自动调谐的其它潜能以突出的对嗓音的数字干预或使数字与嗓音互动的方式得到探索。在这里,机器的声音与人类的嗓音融合在一起:"当嗓音被操纵并具有了机械或机器人的声音时,它与歌手的真实'自我'之间的联系就被打破了。"(Brøvig-Hanssen and Danielson 2016: 128-129)

由于我们主导性的假设将嗓音(voice)同人的本质联系起来——从而剥夺了那些没有嗓音或是嗓音不被听见的人的能动性地位——对嗓音的公然自动调谐仍是有争议的。不仅如此,自动调谐后的嗓音令人不安。正如多米尼克·佩特曼(Dominic Pettman, 2017: 39)所言,当嗓音作为与人的内在性相联系的假定工具以如此的方式同数字融合在一起,我们意识到"嗓音有了一些深刻的非人格(impersonal)的东西,一些陌异的东西"。人类和机器之间的界限模糊了,各自的声音携带着自身的局限与潜能出现。然而,我们不能不加批判地庆祝这样的机遇,因为这些后数字声音教育学的机会同时也是资本和国家的机会。

【作者简介: 德里克·R·福特(Derek R. Ford), 美国迪堡大学助理教授。译者简介: 黄万飞,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博士后。】

(责任编辑 王建平)

现代教育论丛

JOURNAL OF MODERN EDUCATION

No. 2, 2022 General. No. 244

"双减"政策下的私人家教:无序风险与规范向度

余 晖 胡劲松

(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广州 510631)

摘 要:在中央"双减"政策背景下,课外补习市场正逐渐从培训机构转移到私人家教。家教活动隐蔽性较强、功利应试色彩较浓、逐利性特征明显,存在无序发展的风险。若不能及时加以规范,或将消减"双减"政策的实效性:加重家庭经济负担,增加学生学业负担,加剧教育系统内卷,损害群体教育公平。规范私人家教,应处理好国家监管、个体选择与教育规律间的矛盾及张力,凸显合法性、选择性与有序性三大价值向度。

关键词: 双减: 学业负担: 校外培训: 私人家教

中图分类号: G6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6762(2022)02-0029-08

2021年7月24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以下简称"双减"政策),确立了"减轻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工作目标。作为新时代基础教育改革发展的一项重大战略布局,"双减"政策所指向的"学业负担"并非单纯教育教学意义上的负担,而是涉及千家万户的民生负担[1],是对近年来教育内卷化、社会阶层固化、家长教育焦虑、教育支出高昂、学生身心负担加重等问题的综合治理[2][3]。随着校外培训机构的全面整顿,课外补习市场正悄然发生着一个变化:相关学科辅导业务逐步从培训机构转移至私人家教。由于私人家教活动隐蔽性强,市场化程度高,监管难度大,存在着无序发展的风险,或将消减"双减"政策的实效性。

本研究通过问卷调查和半结构式访谈进行资料收集。通过问卷调查,对广州、深圳、南昌、佛山等四地共计 2 391 名相关人员进行调研,其中包括: 1 921 名家长、233 名培训机构教师、237 名大学生家教(表 1 为问卷调查对象列表)。通过半结构式访谈,对广州和南昌两地共计 30 名相关人员进行调研,其中包括: 14 名家长、8 名培训机构教师、8 名大学生家教(表 2 为访谈对象列表)。基于实证研究,对"双减"政策背景下私人家教的发展态势及无序风险进行了研判,从学理与现实层面探讨了私人家教的合法属性、价值定位及其合理规范,并提出了规范私人家教发展的三大向度。

表 1	问卷调查对象列表
ᅏᅵ	山苏崎古刈家州太

地区 -		家长		- 培训机构教师	大学生家教	总计(人)
	小学	初中	高中	一 培训机构教师	人子生豕叙	芯灯(人)
广州市	161	153	158	73	91	636
深圳市	165	159	164	62	54	604
佛山市	154	162	157	43	40	556
南昌市	168	158	162	55	52	595
总计(人)	648	632	641	233	237	2391

表 2 访谈对象列表

地区 -	家长			1호 기미 +F1 +A4 미포	上 兴 L 会 数	光
	小学	初中	高中	一 培训机构教师	大学生家教	总计(人)
广州市	3	2	2	5	5	17
南昌市	3	2	2	3	3	13
总计(人)	6	4	4	8	8	30

一、双减政策推动课外补习市场转向私人家教

"双减"政策出台的重要动因在于大量校外学科培训被异化为功利性应考工具,造成了超标超前学习、学业负担过重等影响学生学业和身心发展的问题。^[4]部分校外培训机构的过度逐利行为和制造教育焦虑的渲染手段,加重了家长的经济和精力负担。^[5]随着"双减"政策的出台,校外培训行业无序发展的乱象得到了全面规范。然而,由于教育考试制度具有较强的筛选功能,中小学生的课外补习需求将持续存在。

(一)教育考试筛选功能决定了补习市场将持续存在

在"双减"政策下,校外培训机构学科类培训活动(作为"供应方")的减量并不意味着中小学生实际补习需要(作为"需求方")的自动减少。由于教育考试制度具有较强的筛选功能,特别是高考和中考承担着较强的选拔与分流功能,中小学生的课外补习需求将会长期存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决定了其教育制度的设计始终将维护公平作为一项重要价值准则。^[6]具体到招生和考试制度的设计中,高等院校和高中学校将绝大部分录取名额投放给通过统一考试渠道报考的考生,并将高考和中考的具体形式设定为标准化笔试,从而尽可能降低考试和招生过程中人为因素的影响。这一刚性制度设计不同于很多西方国家"弱考试、强面试"的弹性制度设计。尽管西方的这种制度能够通过较大的面试权重避免单纯依赖笔试所产生的测量偏差问题,从而选拔出具有较强综合素质或特殊天赋的学生,但其在实施过程中同样容易造成学生家庭背景影响面试成绩的"阶层再生产"现象。^[7]相比而言,我国的教育考试制度突出公平性原则,凸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鲜明特色。

尽管教育考试中的标准化设计能够有效保障最终考试环节的公平性,却难以杜绝中小学校及学生 在应考过程中的"开小灶"行为。由于中考和高考属于高利害性考试,其结果将对学生的未来发展产生 重大影响,加之中华文化中固有的"惟有读书高"的群体心态,家长们普遍愿意"砸锅卖铁"支持子女读 书,以实现子女的阶层跃升或优势延续。在升学名额有限的情况下,升入理想学校的分数线将随着学生整体应试能力的提升而水涨船高。因此,对于考生而言,即便其具备较强的应试能力,其在应试中具备的竞争力也并不绝对,因为最终的录取结果取决于竞争中其他考生的实力。对于具备一定经济条件的家庭而言,维持子女应试竞争力最有效的方式便是参与课外补习,而补习的具体形式既可以是培训机构举办的学科培训班,也可以是聘请私人家教进行一对一或小班化辅导,部分教师家庭还出现了几个家庭抱团相互辅导对方子女的现象。在未来,只要教育考试筛选机制不发生重大调整,中小学生课外补习的需求就会持续存在;与此相应,课外补习市场也将会持续存在。

(二)"双减"政策的附带效应推动私人家教快速增长

随着校外学科培训的式微,大量家长开始为子女寻求替代性补习渠道,使得私人家教成为热门选项,这也是"双减"政策的附带效应^[8]。本调研显示:高达87%的受访家长表示不会因为"双减"政策而放弃子女的校外学科培训;同时,37%的家长愿意接受一对一(或小班化)家教作为原校外培训班的替代形式。在2021年暑假,大学生家教的需求量(特别是在小学阶段的需求量)相比往年有了显著提高,多数从业人员的业务量比去年同期增长了50%—100%。此外,43%的受访培训机构教师表示"转人(或暂时转人)私人家教行业"是其未来再就业的可能选项。若通盘考虑家长对于课外补习的持续热情,以及自暑假以来快速增长的私人家教业务量,加之校外培训机构转型背景下从业人员涌入家教市场的潜在趋势,不难预测,短时间内私人家教市场的规模将会持续扩大。

在"双减"政策下,私人家教的从业形态发生了一定的改变。当前主要有四种类型:一是大学生利用课余时间兼职从事家教——特别是重点高校及师范类院校本科生及研究生,这也是 2021 年暑假增长最快的一种家教形式。大学生群体主要依托所在高校的家教中心从业,其辅导内容主要针对中小学各科课程,同时也有部分对口专业的大学生从事文艺、体育或科技特长培养,其收费标准相对于其他几类家教从业人员较为平价。二是培训机构学科教学人员转型成为个体家教从业人员。受"双减"政策影响,大量校外培训机构的学科培训业务面临转型、裁员甚至关停,使得部分学科教学人员在短期内面临再就业,而转入私人家教领域继续从事学科辅导成为其重要选项。三是部分在职中小学老师利用课余时间从事私人家教。由于"双减"政策规定校外培训机构不得利用寒暑假、节假日和周末开展学科类培训,部分有学科培训需求的家庭便转而寻求在职教师进行辅导,往往采取"地下"形式一对一或组团式开展。四是有一技之长的社会人士全职从事家教。这一群体的从业形式多为个体经营的家教工作室,也有少量人员从事上门家教业务,其辅导内容多为才艺培养。与大学生家教相比,后三类家教从业人员的专业性更强,收费也相对更高。

二、私人家教无序发展的动因及其表征

由于私人家教活动隐蔽性强、监管难度大,在缺乏有效监管的情况下其功利性和逐利性行为将形成无序发展的乱象。应当指出的是,私人家教的无序发展风险并非由"双减"政策本身所造成,由于"双减"政策正处于落地初期,中央和大部分地区的相应政策文本中尚未针对私人家教做出专门规定,使得部分家教从业人员和机构获得了变相违规培训的空间。随着课外补习市场从培训机构转向私人家教,部分家教从业人员、家长和培训机构的"共谋"行为助长了家教活动的无序发展苗头。

由于私人家教活动隐蔽性较强,其规范发展面临着一定挑战。若将校外培训机构办学比喻为"集团

军"作战,则私人家教活动可类比为"游击战"或"地道战":从业人员无需进行登记注册,业务往来多为应家长主动要求,通过熟人间彼此介绍,不依赖固定的办公场所,辅导地点多为学生或教师家中,或是租借写字楼作为课室,没有明显的挂牌和宣传。因此各部门在监管方面具有较大的难度,难以做到有效根除。同时,随着"双减"政策对校外培训行为的监管逐步走上正轨,部分以应试培训为目的的家教活动转入"地下"。其结果是:在缺乏可靠中介平台及信息不对称的状况下,一些不法分子可能会以大学生家教的名义上门,危及家庭人身财产安全;而对于从事上门辅导的家教人员来说,由于缺乏可靠的中介平台保障,其自身也面临一定的人身财产安全风险;若"地下"家教活动中出现费用纠纷或师德操守(如教师体罚学生)问题,家长和家教人员双方都可能面临维权困难。以上安全及法律风险将成为有关部门治理私人家教的难点。

就私人家教的服务形式与内容而言,一对一或小班化的辅导模式容易使其成为部分家庭开展应试教育的工具。对于部分家长而言,无论是"双减"政策所重点治理的校外培训行为,还是私人家教或其他形式的"开小灶"行为,其实质都是帮助子女进行应试辅导的工具。若有关部门未能对家教辅导的内容实现有效治理,家教活动将会演变为一种变相的应试工具。一旦部分学生开始聘请家教并取得考试成绩上的优势,就会倒逼其他同学进行效仿,而部分经济条件较好的家长能够为其子女聘请多科家教。本调研显示,在为子女聘请学科家教的家庭中,32%的家庭聘请了2科及以上的家教,有8%的家庭聘请家教的数量达到了3科及以上。这种功利性竞争模式一旦开启就很难自动停止,且会从一门科目蔓延至多门科目,层层加码,最终导致各科间的恶性竞争。

随着家教目的的功利化转向,私人家教活动将会逐步取代校外培训机构在课外应试教育活动中的角色,导致超标超前学习。本调研显示,自 2021 年暑假起已有部分私人家教开始替代校外培训机构开展应试教育:一是进行超难度学习(占学科类家教活动的 43%),即学习内容超出学校正常的授课难度,甚至进行系统化刷题训练,这也是 2021 年暑假以来学科类家教活动中的普遍现象。尽管对于参与家教辅导的学生个体而言,超难度学习并非辅导中的主要内容,但这一现象的普遍化折射出不少家庭对功利应试性家教辅导的广泛需求,并可能随着内卷化应试竞争的加剧而愈演愈烈。二是进行超进度学习(占学科类家教活动的 17%),即家庭教师提前为学生讲授下学期的学习内容,人为地加速其学习进度,从而让学生在与同学的竞争中实现"先发制人"。三是进行超纲学习(占学科类家教活动的 13%),即学习超出课纲和考纲范围的知识,从而为学生的后续学习积累优势,这种情况通常出现在具有较好学业基础的学生身上。

同时,作为一种市场化的营利行为,私人家教的逐利性使其存在无序收费的风险。在当前缺乏针对私人家教活动的指导性收费标准的状况下,私人家教的收费标准将游走于监管的灰色地带。若出现特定科目家教资源供不应求的状况,热门家教老师的收费将会水涨船高,超出合理水平。部分家教从业人员也可能利用家长的教育焦虑心态,游说家长扩大家教的时长和内容量^[9],如以子女应试能力不足为由劝说家长购买额外的应试辅导服务。

此外,在"双减"政策对校外培训机构的大力整顿下,部分培训机构将应试培训转入"地下",与私人家教行为汇流。例如,部分培训机构采取"换汤不换药"的策略,将语文课改名为"人文素质拓展",将数学课改名为"逻辑思维拓展",或是以高中课程名义招生但实际讲授初中课程内容。同时,部分培训机构开始转型拓展学科家教业务,其市场性与逐利性也会驱使家教服务带上功利应试色彩,并向着

更为隐蔽的"地下"形式转型。

三、私人家教无序发展或将消减双减政策实效性

私人家教的无序发展将会加重家庭经济负担和学生学业负担,加剧教育系统内卷化、损害群体教育公平,从而消减"双减"政策的实效性,带来政策失效的风险,破坏基础教育的良性生态。

第一,私人家教的过度逐利行为将会加重家庭经济负担。一对一或小班辅导家教相对于培训机构大班授课的优势在于,教师能够有效回应学生的个体化需求实现对症下药,但这一形式所产生的费用也相对较高。作为一种课业辅导的"VIP 服务",私人家教的人力成本远高于培训机构的大班授课。同时,不同的学习科目往往需要聘请多位家教老师——本研究对象中有近 1/3 的家庭便属于这种情况,因而家长需要承担更多的家教费用。

第二,超标超前学习行为将会加重中小学生学业负担,进而对学生的学业和身心发展造成一系列负面影响:一是异化学生的学习动机,致使其对所学科目的实际内容失去兴趣,片面关注与考试相关的内容,失去学习后劲。二是加重学生的心理压力。由于超进度、超纲和超难度学习需要学生较高的认知能力和充足的精力作为保障,若学生不具备上述条件则会感受到吃力,并产生一定的心理负担。三是影响学生的身体健康。过量的家教辅导会挤压学生课后的自由支配时间,影响其正常的锻炼、休息和睡眠,增加其近视率和肥胖率。

第三,功利应试辅导行为将会加剧整个教育系统内卷化。从教育系统宏观层面看,学生间的内卷 化应试竞争仅仅是为了争取有限的升学名额,它既不会扩大优质教育资源的覆盖面,也无法缩小区域 和群体间的教育资源差距,同时也不能提升学生的实际学业水平和综合素养。因此无论是在提高教育 质量、促进教育公平还是促进学生发展等层面,都无法产生实际的社会效益。

第四,高额收费将对寒门子弟造成逆向淘汰,损害群体教育公平。对于大多数农村家庭、外来务工家庭、低收入家庭和多子女家庭来说,聘请私人家教是父母难以负担的一笔费用。若私人家教的无序发展得不到控制,成为中小学生课外学习的新常态,则会加剧寒门学子在应试竞争中的不利处境,形成逆向淘汰,拉大教育中的"贫富分化"。

值得注意的是,在教育公平层面,私人家教的无序发展或将放大城乡、群体和家庭间的教育资源差距。具体而言:一是加大城乡间的教育鸿沟。目前,私人家教主要盛行于城市(特别是大中型城市),农村的经济社会环境无法支撑成型的家教培训市场,且农村居民大多属于中低收入人群,无力负担私人家教费用。因此,私人家教在城市中的常态化,将会使得农村学生在应试竞争中整体处于不利地位,加大城乡间的教育鸿沟。二是加剧不同收入群体间的教育差距。私人家教较高的收费门槛使得高收入家庭在这一竞争中处于优势——可以为子女聘请多科家教老师;而工薪阶层、外来务工人员等低收入群体则难以承担私人家教费用,或是至多能承担一至两门家教的费用。随着私人家教的盛行,低收入家庭子女将会被置于应试竞争中的不利地位。三是加剧独生子女和多子女家庭间的教育差距。在实施三孩政策的大背景下,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家庭成为多子女家庭。相比于独生子女家庭,多子女家庭的父母所要承担的家教费用将会翻倍,成为一项巨大的家庭开支。这一局面将使得独生子女得以享受更为充裕的家教资源,并在学业竞争中取得优势。

四、私人家教的规范向度: 合法性、选择性与有序性

尽管现实中私人家教的无序发展并非"双减"政策设计者所能预料,但这一现象却是该政策在执行过程中的附带产物。相关部门若不能对私人家教的无序发展加以有效防范,将有可能造成"双减"政策目标的失真或偏移。对此,在"双减"政策落地之初,相关部门应及时针对现有的问题苗头进行诊断,防患于未然。当前,私人家教的无序发展苗头尚处于可控范围之内,下一步若通过一系列平台、机制和标准建设,将能够实现对私人家教行为的有效规范,从而更好地达成"双减"目标。对此应处理好国家监管、个体选择与教育规律间的矛盾张力,统整社会公义、个体差异与自由选择等多元价值目标,突出其合法性、选择性与有序性。

(一)实现公权力对个体学习权的让渡

"从国家与教育关系的角度看,教育选择其实是公与私、官与民、强制与自由相互博弈的结果。"[10]就"双减"政策而言,一方面,其对于个体教育选择权的规范并非绝对的限制,因为该政策对课外辅导的限制主要是针对培训机构这类特定机构的学科类培训行为,而对于私人家教及其辅导的内容则未作出限定,体现出国家公权力对个体学习权的让渡。另一方面,个体对于校外培训和私人家教(包含其教育内容)的选择权亦非完全意义上的自由选择,而是受到国家公权力的约束,这种约束的背后是保障社会公义的价值准则。整体而言,私人家教作为个体的一种教育选择,其合法性源于国家公权力(权力)与个体学习权(权利)之间的平衡,关键在于公权力对个体学习权的让渡。

在现实中,部分中小学生确实存在正当的学科辅导需求,如;部分学生在特定科目上无法跟上所在班级学习进度(在以"补差"为目的的家教辅导中,有41%的辅导内容为复习旧知识,帮助学习进度滞后的学生巩固基础知识[11]);另有部分学生希望聘请家教老师帮助其巩固深化在校所学知识;也有部分学生对特定科目具有浓厚兴趣且希望在课后进行拓展性学习。私人学科家教有助于满足学生个性化、差异化的学业需求,这也是其现实合理性的根源。

若从合法性角度进行审视,我国现行的教育及民事法律法规中并未禁止私人家教行为(包括了学科与非学科类家教)。换言之,学生聘请私人家教属于行使学习权,受到教育法保护;而家教从业人员提供辅导并获取报酬则属于行使劳动权,受到民事法保护。因此,在保障学生学习权以及家教人员劳动权的双重意义上,对私人家教进行限制都于法无据。此外,"双减"政策本身也并未限制私人家教开展学科辅导,其政策目标在于减轻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而不是对学生正当的课外学习需求进行约束。

应当注意,并非所有的家教行为都具备合法性基础。现实中依然存在诸如在职教师从事有偿家教等违反政策法规、损害教育公平的行为,以及"双减"政策所要治理的超标超前学习、功利应试等家教辅导行为。因此,私人家教活动应当在法律政策许可的范围内开展。

(二)凸显因材施教与全人发展的价值

作为一种非正式形态的教育活动,私人家教的功能定位与教育活动的根本目的一致,都在于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12]就其教育属性而言,私人家教的独特价值在于为个体提供教育选择的机会,尽可能满足个性化与差异化的学习需求,实现因材施教。由此,因材施教的家庭教育、强基固本的学校教育和融入生活的社会教育形成了一种教育合力,共同推动着学生实现全人发展。^[13]作为一项教育政策,

"双减"对于社会公义的追求并不意味着对学生个性化发展需求的否定,这一点特别值得政策解读者们注意。

然而在现实中,由于教育考试制度具备的筛选功能,加之过去十多年间校外培训机构的无序发展,导致课后补习被异化为功利应试的工具,这也是"双减"政策出台的初衷。尽管家教辅导应当满足学生在学科方面的合理学习需要,但其内容不应片面限定于学科辅导,而应当以发展学生课余爱好(特别是文艺、体育和科技特长)为主,以激发学生学习兴趣为目标。在这个意义上,"双减"政策对校外学科培训的培训时间及内容的限定也同样适用于私人家教的学科辅导,即"不得占用国家法定节假日、休息日及寒暑假期"且"严禁超标超前培训"。而对于才艺类家教辅导而言,其开展的时间则不受上述规定限制,只要是安排在课余时间且有助于达到放松学生身心的效果,均可以正常开展。

(三)保障家教组织形态的多样及有序

学生个体学习需求的差异性决定了家教组织形态的多样性,这也是家教活动生命力的来源。首先,在组织性方面,家教活动包括了个体从业和依托机构从业等类型。前者包含个体经营工作室或上门辅导等形式,后者包含依托培训机构或高校家教中心开展家教等形式。其次,在专业性方面,家教活动包括了全职从业和兼职从业等类型。前者包含个体家教从业和依托辅导机构从业等形态,后者主要表现为大学生利用课余时间兼职从事家教活动。最后,在沟通渠道方面,私人家教与家长的对接渠道主要包括熟人介绍、微信/QQ 群推介、中介机构推介等,其中个体家教人员主要依托第一种渠道,兼职从业人员主要依托后两种渠道。总体而言,私人家教活动的开展并不必然依赖特定的中介服务机构。

不论对于何种家教从业形态,政府相关部门均应建立相应的监管机制,以避免家教活动走入"地下"和走向无序发展。在监管主体方面,应当由教育行政部门、市场监管部门、物价部门等多部门进行协同配合,且以教育行政部门为主。由于私人家教既是一类教育活动同时也是一类市场性活动,因此教育部门主要负责的是内容监管、人员审查、平台搭建、宣传引导和政策研拟,而市场监管部门则配合教育部门开展家教管理信息系统建设及家教中介机构运行监管,物价部门负责确定各类家教辅导服务的指导性收费标准。针对家教活动的不同从业形态,应建立下列分类监管机制:对于家教中介机构和志愿服务机构应进行注册监管,并建立相应的管理信息系统,以全面掌握其师资情况、费用标准及辅导内容等核心信息;对于个体家教从业人员,无论全职或兼职从业均应进行登记备案,保障家教活动的规范开展及有效追责;对于对接家长与家教从业人员的中介性平台,如网站或微信/QQ 群等虚拟网络平台,应进行有效监控。

(四)确立从业资质的德行与操守标准

关于私人家教从业人员是否需要统一的资质标准,涉及个体教育选择权与国家监管职能间的冲突协调。在现实中存在一定的两难困境:一方面,作为一种非正规的教育形式,学生的个性化学习需求使得家教服务并不像学校课程教学那样具有明确客观的质量标准,其成效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家长和学生的满意度,属于主观评价,因人而异。同时,作为一种市场行为,家教服务的"产品质量"亦应当由购买服务的受众(即家长)而不是政府部门或公共机构进行判断,即由市场本身的机制进行调整。另一方面,作为直接面向未成年学生且多为一对一形式的辅导活动,家教从业人员的德行及专业操守应当由权威部门(即司法机关和教育部门)进行严格把关。综合以上两方面因素,应当确立针对私人家教从业人员资质标准,但具体内容应限定在对从业人员犯罪记录、道德品行及专业操守等底线行为的把

关方面, 而无需针对其学历、资质或专业能力做出限定。

具体而言,由于私人家教的辅导内容并不直接指向由国家颁发的学业证书或技能资格,因此并不受国家对正规学校办学资质的限制,其从业人员也并不需要具备"专业人员"的知识能力与从业资质。换言之,私人家教就其教育属性而言类似于父母对子女的学业辅导,或者是社会生活中随时随地发生的人与人之间的辅导行为。由于其所指向的是学生个体化、差异化的学习需求,因而只要能够满足学生的学习需求即达成了辅导目标。尽管现实中大量家教从业人员事实上具备了教师资格证或相关行业资格证,但就其工作性质而言,家教从业人员并不需要像学校教师那样经由官方资质认定而获得"专业人员"的身份。若对家教从业人员设定准人标准,反而会妨碍家教市场中"供给端"与"需求端"的自由对接,造成人为添堵的反效果;此外还将导致大量不符合相关资质的从业人员转入"地下",加大政府部门的监管难度,最终造成相关资质标准有名无实,难以真正落地。

与此同时,由于私人家教面向的是未成年学生,其从业人员的犯罪记录、道德品行及专业操守应当由权威部门进行严格把关,通过后方可发放(或续认)家教从业资格证书。具体而言,对家教从业人员犯罪记录及道德品行的审核应由司法部门负责,此外若其在取得从业资质后从事违法犯罪或严重违反社会公德的行为,则应吊销从业资格证书。同时,家教从业人员的专业操守应由教育部门进行考核,若取得从业资质后出现违背教师专业操守(如辱骂、体罚学生等)的行为,则同样对其从业资格证书予以吊销。

参考文献:

- [1] 张志勇. "双减"格局下公共教育体系的重构与治理[J]. 中国教育学刊, 2021(09): 20-26.
- [2] 陈先哲. "双减": 中国教育改革新起点[N]. 光明日报, 2021-09-28(14).
- [3] 马陆亭,郑雪文. "双减": 旨在重塑学生健康成长的教育生态[J].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 43(01): 102-113.
- [4] 马开剑, 王光明, 方芳, 张冉, 艾巧珍, 李廷洲. "双减"政策下的教育理念与教育生态变革(笔谈)[J]. 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06): 1-14.
- [5] 周洪宇, 齐彦磊. "双减"政策落地: 焦点、难点与建议[J].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 43(01): 122-132.
- [6] 胡劲松. 论教育公平的内在规定性及其特征[J]. 教育研究, 2001(08): 8-12.
- [7] 钟景迅,赵巾慧. 复杂政治角力下对多元化的坚守与反复——当前美国高等教育中肯定性行动实施回顾[J]. 教育发展研究,2019,39(21):60-68.
- [8] 余晖. "双减"时代基础教育的公共性回归与公平性隐忧[J]. 南京社会科学, 2021(12): 145-153.
- [9] 周序. 家庭资本与学业焦虑——试论"双减"政策引发的家长焦虑问题[J]. 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01): 1-13.
- [10] 劳凯声. 受教育权新论[J]. 教育研究, 2021, 42(08): 23-34.
- [11] 张婷. 中小学在职教师"有偿家教"问题研究[D]. 杭州师范大学, 2019; 28-29.
- [12] 刘磊明. 找回家庭学习活动的存在感[J]. 中华家教, 2021(05): 90-92.
- [13] 刘复兴,董昕怡. 实施"双减"政策的关键问题与需要处理好的矛盾关系[J].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 43 (01); 1-7.

(责任编辑 于小艳)

现代教育论丛

JOURNAL OF MODERN EDUCATION

No. 2, 2022 General. No. 244

学生参与影子教育存在邻里效应吗

——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分析

徐丹诚 薛海平

(首都师范大学 教育学院, 北京 100048)

摘 要: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0—2018年数据,运用二元 Logit 模型,探究学生参与影子教育是否存在邻里效应。研究结果表明:(1)学生参与影子教育存在邻里效应,同一社区影子教育参与率越高学生个体参与影子教育的概率越大,将同一社区影子教育参与率的滞后期纳入回归模型后结果依然显著。(2)影子教育的邻里效应逐渐减弱,同一社区影子教育参与率的系数呈逐年下降趋势。因此,建议教育行政部门、学校和社区有效落实"双减"政策,拓宽家校社共育途径,引导家长树立科学育儿观;居民社区应配合有关部门加大力度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宣传内容,缓解家长教育焦虑,抑制影子教育的邻里效应,以期有效减轻学生负担。

关键词:影子教育;邻里效应;"双减"政策

中图分类号: G4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6762(2022)02-0037-09

一、引言

2021年7月24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以下简称"双减"政策)。"双减"政策将减轻学生校外培训负担提升至空前高度,这是因为影子教育(Shadow education)在近20多年来"野蛮生长",冲击了主流学校教育体系,严重破坏了教育生态。影子教育作为提升学生成绩而进行的补充性教育活动[1],已经成为教育竞争的重要形式[2]。已有研究表明我国影子教育规模和支出呈逐年上升趋势[3]。影子教育大规模扩张不仅加重了学生的学业负担^[4]和家长的精神负担,高昂的影子教育支出也给家庭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压力,陡增的育儿成本将降低年轻人的生育意愿。因此,需要进一步探究学生参与影子教育的影响因素。一些学者的研究表明学生个体特征、家庭背景和学校排名、区域等因素都会影响学生参与影子教育[5-8]。这些研究均将学生参与影子教育看作是独立于群体的行为。

许多学者的研究结论表明学生的行为会受同辈群体行为的影响^[9-11]。我国是典型的关系型社会^[12], 人与人之间频繁的交流与互动,使得中国居民的思想和行为易受他人行为的影响^[13]。从社会心理学的

收稿日期: 2020-02-01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家庭资本、影子教育与社会再生产》(71774112)

角度看,人是一种社会性动物,群体间通过长时间的互动,个体的思想和行为会逐渐与群体趋同^[14]。生活在统一社区中群体对个体的影响的现象称为邻里效应^[15],即社区邻里层次的特征对社区居民个体生活所具有的影响^[16]。因此,学生个体可能会受到同一社区影子教育参与率的影响参与影子教育。本研究将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2010—2018 年数据,以居住于同一社区(包括农村村落和城市社区)的家庭作为一个群体,运用二元 Logit 模型考察学生参与影子教育是否存在邻里效应。

Manski 认为家庭与邻里之间行为共同变动的作用机制是内生影响、外生效应及关联效应。内生影响是指受到邻居行为或思想的影响,这是本研究核心自变量同一社区影子教育参与率。外生效应是指邻居其他外部特征(如同一社区平均受教育年限、平均职业层级等)影响参与影子教育行为,关联效应是指学生家庭根据自己的偏好选择与某些类似特征的家庭居住在同一社区时所导致的参与影子教育行为的共同变动[17-18],这两种机制将干扰对邻里效应是否存在的判断。因此,本研究将选取同一社区邻里群体特征的平均值和社区特征作为控制变量纳入实证模型以减小外生效应和关联效应对研究结论的影响。

二、文献综述

(一)邻里效应

早在17世纪,居住在弱势邻里中的居民更可能与犯罪、低教育水平、低社会经济地位和较高的疾病发生率联系在一起等问题就已被人们认识到,而邻里效应(Neighborhood effect)作为专门的实证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19]。邻里效应最早出现于美国社会学家威尔逊(Wilson)的著作《真正的穷人》,通过对美国城市中贫民窟的研究,威尔逊发现邻里特征会影响居民的生活态度和社会行为^[20]。

在教育学领域,国外的研究多集中于探讨邻里外部特征对学业成就的影响,而国内教育领域有关邻里效应的研究较少,已有研究表明学生的学业成就、教育期望以及家庭的教育支出均存在邻里效应。Owens(2010)基于全国青少年健康纵向研究数据(Add Health),研究发现邻里家庭社会经济背景与学生教育程度呈正相关关系^[21]。Wodtke 等(2015)采用 6,137 名儿童的追踪调查数据进行研究发现,弱势社区对青春期学生的学业成绩存在负面影响^[22]。Chetty 等(2016)利用"搬向机遇(Moving to Opportunity,MTO)"的试验数据分析发现,13 岁之前搬到低贫困社区的儿童会提升其升入大学的概率^[23]。Wodtke和 Parbst(2017)使用来自 PSID 的调查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社区社会经济构成显著影响儿童和青少年的阅读和数学成绩^[24]。刘欣和夏彧(2018)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4 年调查数据的城市样本,采用多层线性模型进行分析发现,城市社区邻里效应对于青少年儿童学业成就的重要性,邻里优势集聚对学业成就的促进作用^[25]。孙伦轩(2018)基于 2013—2014 年中国教育追踪调查(CEPS)的实证研究发现,在青少年成长中存在邻里效应,不同社区类型会给青少年自我教育期望和同伴上进程度带来显著影响^[26]。余丽甜和詹宇波(2018)基于 2010—2014 年 CFPS 数据研究发现,同社区的家庭平均教育支出对家庭教育支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27]。

(二)邻里效应与影子教育

社区邻里和班级同伴对学生个体参与影子教育的影响,均是从群体角度探讨影子教育的影响因素,故本研究对邻里效应、同伴影响与学生参与影子教育的文献进行综述。方航等(2021)基于 2010—2016 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农户数据,研究发现农户个体的教育支出会随其他农户教育支出的增长而增长[28]。

周东洋和吴愈晓(2018)对 CEPS 基线数据使用多层混合效应模型进行分析,结果表明班级内影子教育参与比例越高,学生个体参与影子教育可能性和支出越高^[29]。杨莉(2021)基于 CEPS 两期数据研究发现,班级同伴校外补习支出对个体校外补习支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并且父亲为精英职业、富裕家庭学生校外补习支出受同伴效应的影响更大^[30]。金红昊等(2021)基于中国教育追踪调查的实证研究发现,班级平均补习参与率对学生个人的课外补习参与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31]。

综上所述,既有研究存在如下不足: (1)虽然已有研究证实了同一社区的邻里对学生学业表现和行为具有显著影响,学生参与影子教育也会受到同伴的影响,但极少有研究探讨邻里效应与学生参与影子教育的关系。(2)多数学者将社区质量、邻里社会经济地位等外生效应影响因素作为核心解释变量,未关注从众心理这一内生效应的影响(3)关于邻里效应的研究多采用截面数据,会产生反射性问题,影响结果的准确性。因此,本研究基于中国教育追踪调查(CFPS)2010—2018 年数据,运用二元 Logit 模型,探究学生参与影子教育是否存在邻里效应,并将同一社区影子教育参与率的滞后期纳入回归模型,以克服反射性问题。

三、数据来源与变量说明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所用数据来自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 CFPS)2010—2018年追踪数据,该数据抽样采用了内隐分层的(implicit stratification)、多阶段、多层次、与人口规模成比例的概率抽样方式(PPS)。样本来自中国除香港、澳门、台湾、新疆、西藏、青海、内蒙古、宁夏和海南之外的25个省、市、自治区的人口。这25个省、市、自治区的人口约占全国总人口(不含港、澳、台)的95%。访卷包括三种:村(居)问卷、家庭问卷和个人问卷(包括16岁以下的少儿问卷和成人问卷),分别以了解社区环境、家庭环境及个体状况为目的,具有较强的代表性,能够较好地反映中国的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状况。本研究5个年份基础教育的样本容量分别为6277、6691、6857、6769、7364。

(二)变量说明

1. 因变量

本研究因变量为"是否参与影子教育",该变量的数据来源于成人和幼儿问卷中"是否参加家教/辅导班"和"过去12个月课外辅导费(元)"合并而成,若参与影子教育则编码为1,反之为0。

2. 自变量

本研究自变量为"同一社区影子教育参与率"。CFPS 的调查具体到村/居委会层面,居住于同一村或社区里面的居民彼此间交流频繁且数量适宜。因此,本文根据村/居编码"cid"将同一个村/社区的家庭汇总为邻里。本研究借鉴 Liu 等(2014)和 Ling 等(2018)的做法,采用当前研究中较为常用的邻里效应计算指标,将邻里效应定义为除家庭 i 之外,社区 c 内其他家庭的平均影子教育参与数量[32-33],如公式(1)所示:

peer_ shadoweducation^c_{-i} =
$$\frac{\sum_{N^c} shadoweducation^c - shadoweducation^c_i}{N^c - 1}$$
 (1)

其中, peer_ shadoweducation 为社区 c 中家庭 i 的影子教育参与情况, \sum_{N^c} shadoweducation 为社区 c

样本参与影子教育的家庭总和,peer_ shadoweducation_i为社区 c 除家庭 i 之外其他家庭影子教育参与情况, N^c 为社区 c 中样本家庭的个数。

3. 控制变量

本研究控制变量为可能影响学生参与影子教育的个人特征及其所在的社区特征,及区位特征,如 表 1 所示。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说明 因变量 是否参与影子教育 0. 否; 1. 是 自变量 同一社区影子教育参与率 连续变量 控制变量:个人特征 性别 0. 女; 1. 男 1. 文盲/半文盲; 2. 小学; 3. 初中; 4. 高中; 5. 大专; 父母受教育程度 6. 大学本科及以上 1. 下层; 2. 中层; 3. 上层 父母职业层级 家庭人均收入 连续变量 控制变量:邻里特征 同一社区平均性别 连续变量 同一社区平均父母受教育年限 连续变量 同一社区平均父母职业层级 连续变量 同一社区平均家庭人均收入 连续变量 控制变量:区位特征 是否为重点校 0. 否; 1. 是 城乡 0. 乡村; 1. 城镇 地区 1. 东部地区; 2. 中部地区; 3. 西部地区

表 1 统计分析中的变量说明

注: 1. 关于父母的职业背景,李春玲将职业分中上中产阶级、中下中产阶段和底层阶级。中上中产阶级包括: 机关及企事业单位负责人、中层管理人员、中高级职称专业技术人员、一般机关干部公务员、经济业务人员、私营企业主(雇工 8 人或以上)。中下中产阶级包括: 基层管理人员、其他专业技术人员/一般技术员、企事业单位职员、技术工人、军人警察消防人员、个体户/小业主(雇工 8 人或以下)。底层阶级包括: 商业与服务业人员、非技术工人、农林牧渔业人员、自由职业者、无业失业下岗家务人员。根据李春玲的分类将中上中产阶级划分为上层阶层、中下中产阶级划分为中层阶层、底层阶级划分为下层阶层。

四、数据分析结果

(一)描述性统计

表 2 呈现了本研究所用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由表 2 可得, 5 个年份数据中个体参与影子教育的均值分别为 23.6%至 25.7%,同一社区影子教育参与率由 22.3%至 25.6%,与全国影子教育参与情况大致相当。其他变量不再一一赘述。

(二)二元 Logit 模型回归结果

表 3 呈现了二元 Logit 模型回归结果。如表 3 所示,"同一社区影子教育参与率"的估计系数均为正,且在 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学生参与影子教育的确存在邻里效应,假设 H1 成立。2010—2018 年的系数分别为 3.472、2.656、2.537、2.278 和 2.015,呈现出下降的趋势。从控制变量来看,女性、父母受教育程度越高、人均家庭收入层级越高、重点校及城镇学生参与影子教育的概率更大,父母职业为上层或中层的学生参与影子教育的概率比父母职业为下层的大。

表 2 描述性统计

本目 <i>4</i> W	2010	0 年	2012	2年	201	4 年	201	6年	201	8年
变量名称	平均值	标准差								
是否参与影子教育	0. 257	0. 437	0. 236	0. 425	0. 247	0. 431	0. 244	0. 429	0. 244	0. 429
同一社区影子教育参与率	0. 256	0. 272	0. 232	0. 243	0. 238	0. 252	0. 229	0. 245	0. 223	0. 256
性别	0. 520	0.500	0. 520	0.500	0. 520	0.500	0. 531	0.499	0. 529	0.499
父母受教育程度	2. 893	1. 145	3.094	1.057	3.076	1. 142	3.097	1. 203	3. 281	1. 239
父母职业层级	1. 432	0. 567	1.474	0.586	1.649	0.653	1.746	0.665	1.702	0.644
家庭人均收入	6783	8675	10493	13114	11834	25392	17118	53470	20220	59861
同一社区平均性别	0. 520	0. 170	0.516	0. 166	0.518	0. 186	0. 529	0. 195	0. 524	0. 201
同一社区平均父母受教育年限	2. 874	0. 783	3.081	0.701	2. 960	0.837	3.010	0.807	3. 149	0.842
同一社区平均父母职业层级	1. 349	0.350	0.885	0.405	1.459	0.430	1. 581	0.418	1.389	0.458
同一社区平均家庭人均收入	6405	5431	10111	6586	10559	10899	15642	31758	17006	14203
是否为重点校	0.065	0. 247	0. 259	0.438	0. 262	0.440	0. 284	0.451	0. 276	0.447
城乡	0.380	0.485	0. 385	0. 487	0. 424	0. 494	0.426	0. 495	0. 144	1.731
地区	2.040	0.814	1. 945	0.845	1. 962	0.838	1. 972	0. 838	1. 958	0.842

注:"是否为重点校"变量 2010 年所用问题为"就读是哪种类型的学校",而其余年份为"学校是否示范/重点",故均值差别较大。

表 3 影子教育的邻里效应二元 Logit 模型回归结果

变量名称	2010年	2012年	2014年	2016年	2018年
同一社区影子教育参与率	3. 472 ***	2. 656 ***	2. 537 ***	2. 278 ***	2. 015 ***
	(0.16)	(0.28)	(0.18)	(0.20)	(0.21)
性别	-0. 049	-0. 262 **	-0. 140 *	-0. 374 ***	-0. 266 ***
(以女姓为参照)	(0.07)	(0.10)	(0.08)	(0.08)	(0.09)
父母受教育程度	0. 204 ***	0. 430 ***	0. 125 ***	0. 199 ***	0. 304 ***
入马又获自任汉	(0.04)	(0.06)	(0.04)	(0.04)	(0.05)
父母职业中层	0.097	0. 116	0. 174 *	0. 049	0. 290 ***
(以下层为参照)	(0.08)	(0.11)	(0.09)	(0.10)	(0.10)
父母职业上层	0. 352 *	0. 433	0. 351 **	0. 584 ***	-0.009
(以下层为参照)	(0.19)	(0.27)	(0.15)	(0.14)	(0.17)
家庭人均收入	0. 0002 ***	0.000005	0. 00001 ***	0. 000001 *	0. 00001 ***
SCHOOL CONTROL	(0.000005)	(0.000005)	(0.000003)	(0.0000006)	(0.000003)
同一社区平均性别	-0. 011	-0. 166	-0. 183	-0.070	0. 169
14 EE 124 EM	(0.22)	(0.31)	(0.21)	(0.21)	(0.22)
同一社区平均父母受教育年限	0. 103	0.070	0. 206 ***	0. 239 ***	0. 210 **
N EE POZICIONA	(0.08)	(0.11)	(0.07)	(0.08)	(0.08)
同一社区平均父母职业层级	-0. 172	0. 166	-0. 119	0. 020	0. 181
内 压色 [4] 人 子 小 正 / A	(0.12)	(0.14)	(0.11)	(0.12)	(0.11)
同一社区平均家庭人均收入	-0.000008	-0.000006	0. 000002	-0.0000006	-0.000004
	(0.000009)	(0.000009)	(0.000005)	(0.000001)	(0.000004)
是否为重点校	0. 354 **	0. 394 ***	0. 132	0. 195 **	0. 158
(以非重点校为参照)	(0.14)	(0.12)	(0.09)	(0.09)	(0.10)

城镇	0, 141	0. 296 **	0. 272 ***	0. 147	-0. 029
(以乡村为参照)	(0.09)	(0.13)	(0.10)	(0.10)	(0.11)
中部地区 (以东部地区为参照)	-0. 017 (0. 10)	-0. 166 (0. 13)	0. 061 (0. 10)	-0. 025 (0. 10)	-0. 107 (0. 11)
西部地区	0. 068	-0. 410 ***	-0. 357 ***	-0. 435 ***	-0. 223 *
(以东部地区为参照)	(0. 10) -3. 003 ***	(0. 13) -3. 358 ***	(0. 11) -2. 708 ***	(0. 11) -2. 859 ***	(0. 11) -3. 799 ***
常量	(0.24)	(0.35)	(0.25)	(0.27)	(0.30)
P 值	<i>P</i> <0. 001				
伪 R 方	0. 218	0. 212	0. 178	0. 163	0. 163
样本容量	5 098	2 577	3 708	3 613	3 255

注: 括号内为标准误; *** p<0.01, **p<0.05, *p<0.1。

(三)稳健型检验结果

表 4 呈现了影子教育的滞后期邻里效应二元 Logit 模型回归结果。如表 4 所示,滞后期系数分别为 1.623、1.807、1.772、1.482,均为正数且在 1%的水平上显著,结果证实了学生参与影子教育存在邻里效应,更好地克服了反射性问题,研究结论更为稳健。

变量名称	2016-2018年	2014-2018年	2012-2018年	2010-2018年
同一社区影子教育参与率	1. 623 ***	1. 807 ***	1. 772 ***	1. 482 ***
内一 <u>社区</u> 影	(0.24)	(0.25) (0.30)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3.661*** -3.776**	(0.38)	
个体特征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邻里特征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区位特征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量	-3. 686 ***	-3. 661 ***	-3. 776 **	-3. 857 ***
币里	(0.34)	(0.34)	307 *** 1.772 *** 1.25) (0.30) 空制 控制 空制 控制 空制 控制 20 (0.39) 0.001 (0.32) 220 (0.232)	(0.55)
P值	<i>P</i> <0. 001	<i>P</i> <0. 001	<i>P</i> <0. 001	<i>P</i> <0. 001
伪R方	0. 226	0. 220	0. 232	0. 156
样本容量	2 685	2 501	1 910	885

表 4 影子教育的滞后期邻里效应二元 Logit 模型回归结果

注: 括号内为标准误; *** p<0.01, **p<0.05, *p<0.1.

五、主要结论、讨论与政策建议

(一)主要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0—2018 年数据,运用二元 Logit 模型探究学生参与影子教育是否存在邻里效应,并得出如下结论:

1. 学生参与影子教育存在邻里效应

学生参与影子教育存在邻里效应,影子教育的邻里效应表现为同一社区影子教育参与率对学生参与影子教育具有稳健的显著正向影响。首先,根据参照群体理论,个人是其成员的群体和那些个人并非其成员的群体都可以构成某人态度、自我评价及行为的参照群体^[34]。因此,同一社区的邻里可被看作是学生和家长的参照群体^[35]。受当前"就近入学"政策的影响,同一社区的邻里也多为学生和家长的

同辈群体。同辈群体作为一个外在于个体或家庭特征之外的结构情境因素具社会遵从功能,社会遵从行为多数出于群体的压力或惩罚。邻里在互动过程中,会形成一定的舆论、风气及行为规范,产生一种心理压力。出于自尊、声望和被他人所接受等心理需求,多数人参与影子教育的行为对学生和家长个体造成了一种无形的压力,若不遵从则可能会受到群体成员的排斥甚至惩罚。所以,学生需要参与影子教育,以维持对群体的归属[36-37]。其次,学生家长受"就近入学"政策所致的居住群分效应的影响而感到焦虑,从而对子女进行过度的和非理性的影子教育投资。另外,在家校社共育的过程中,社区未能满足学生校外个性化、多样化的教育需求和有效引导家长树立科育儿观,且对校外培训机构在社区线上线下的虚假宣传、夸大宣传管控力度不足,以至于学生和家长在焦虑氛围下疯狂"卷入"影子教育。

2. 影子教育的邻里效应逐渐减弱

本研究发现同一社区影子教育参与率的系数呈逐年下降趋势,影子教育的邻里效应逐渐减弱。这可能是因为,随着城市化与市场化发展,城市居民生活节奏加快导致其无闲暇时光与邻里交流,现代网络的迅速发展和住房结构的转换也逐渐减少了邻里间的社会联系^[38]。已有研究表明,有六七成的居民不知道同一楼层邻居的姓名^[39]。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也使得乡村地区的生产生活方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随着大量劳动力流入城市,乡村地区的邻里关系表现出淡化趋势^[40]。现如今发达的网络打破了城镇和乡村居民的交流格局,邻里间关于教育的交流不仅限于居住在一起的邻居,学生和家长不限于将邻里作为参照群体。

(二)政策建议

从古时"孟母择邻"到现代"择校而居",社区邻里对学生个体行为的影响不容忽视。教育作为实现代际流动的重要方式,家庭教育支出又是决定子女教育机会的重要因素,家庭在所属群体中对相对优势的社会地位的追求将促使家庭追随其他家庭参与影子教育^[41]。影子教育的邻里效应虽然在近些年来呈减弱趋势,但依然显著影响学生个体参与影子教育。影子教育的邻里效应导致学生疯狂"卷入"影子教育,加重了家庭的经济负担,学生也背上了沉重的身心负担。因此,本研究尝试提出如下政策建议,以抑制影子教育的邻里效应,有效减轻学生负担。

1. 落实"双减"政策、拓宽家校社共育途径

"双减"政策的落实将有效降低影子教育的供给和需求,降低同一社区影子教育参与率,有助于抑制影子教育的邻里效应。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应积极构建家校社共育的多种途径,学校可定期开展家长课堂、家长沙龙等交流活动,为家长提供科学的育儿引导和服务。2021年10月23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以下简称《家促法》)从法律层面提出社区应为家庭教育提供支持。《家促法》明确指出,家庭教育指导机构对辖区内社区家长学校进行指导①。因此,教育部门要会同有关部门,着力推动建设覆盖城乡的社区家庭教育指导机构,社区应积极建设学生活动中心,为学生参与社会实践、社团活动、志愿服务提供活动场所。其次,学校应与社区建立结对帮扶,全面了解学生成长环境,针对社区以及学生家庭情况,依托社区家庭教育指导机构开展具有针对性的学生课后服务和育儿指导服务。社区也可以建立教育联席会议制度和街道一学校沟通机制[42],向学校反映社区中学生和家长的教育需求。同时,学校和社区应有效利用当地自然和人文资源,联合博物馆、科技馆和文化馆等专业

① 详见中国政府网: http://www.gov.cn/xinwen/2021-10/23/content_ 5644501. htm.

机构承接学生的课后活动,进一步整合社会资源^[43],拓宽家校社共育途径,满足学生校外个性化、多样化的教育需求,引导家长树立科学育儿观,破除"唯分数论",真正基于孩子的发展理性参与影子教育,减少学生和家长的影子教育需求,避免盲目跟风和过度焦虑。

2. 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宣传内容,缓解家长教育焦虑

有效落实"双减"政策还需校内外共同发力,校外培训机构的虚假宣传营造了焦虑氛围,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教育竞争,以致形成影子教育的邻里效应,最终将加重学生及其家庭负担。截止 2021 年 6 月,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以"虚构、夸大、诱导"等违规行为为由已对 15 家知名培训机构进行顶额处罚^[44]。因此,校外培训机构需要明确社会责任,自觉遵守宣传准则。同时,居民社区应贯彻落实《关于做好校外培训广告管控的通知》中"居民区不刊登、不播发面向中小学(含幼儿园)的校外培训广告"的要求①,配合市场监管等部门持续加大校外培训市场监管力度,坚决遏制虚假宣传、夸大宣传等违规行为,依法依规严惩各种夸大培训效果、误导公众教育观念和制造家长焦虑的广告行为。社区应配合各类新闻媒体积极宣传科学育儿观,不炒作考试成绩排名和升学率,营造良好社区育人氛围。

参考文献:

- [1] Bray M, Kwok P. Demand for private supplementary tutoring: conceptual considerations, and socio-economic patterns in Hong Kong [J]. Economics of Education Review, 2003, 22(6): 611-620.
- [2] Song K O, Park H J, et al. A cross national analysis of the student and school level factors affecting the demand for private tutoring [J]. Asia pacific education review, 2013, 14(2), 125-139.
- [3] 薛海平, 左舒艺. 我国基础教育学生参加课外补习的现状与变化趋势[J]. 教育科学研究, 2021(1): 16-25+36.
- [4] 张媛, 薛海平. 课外补习对我国初中生减负的影响研究——基于中国教育追踪调查(CEPS)2015 数据分析[J]. 基础教育, 2020, 17 (2): 33-44.
- [5] 薛海平,李静. 家庭资本、影子教育与社会再生产[J]. 教育经济评论, 2016, 1(4): 60-81.
- [6] 李佳丽, 胡咏梅. 谁从影子教育中获益?——兼论影子教育对教育结果均等化的影响[J]. 教育与经济, 2017(2): 51-61.
- [7] 宋海生,薛海平. 初中生课外补习支出:现状、影响因素及政策启示[J]. 当代教育论坛,2018(4):83-92.
- [8] 胡咏梅, 王亚男. 中小学生家庭对子女课外教育的投资及效果分析[J].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5): 167-188.
- [9] 宗庆庆, 李雪松. 基础教育中的同伴效应估计[J]. 财经研究, 2018, 44(7): 4-15.
- [10] 高翔, 薛海平. 家长参与、同伴影响和初中生学业成绩[J]. 教育科学研究, 2020(6): 55-63.
- [11] 吴愈晓, 张帆. "近朱者赤"的健康代价: 同辈影响与青少年的学业成绩和心理健康[J]. 教育研究, 2020, 41(7): 123-142.
- [12] Bian Y J. Bringing strong ties back in: Indirect ties, network bridges, and job searches in China[J].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97, 62(3): 366-385.
- [13] Eun C S, Wang L L, Xiao S C. Culture and R2[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2015, 115(2): 283-303.
- [14] Nie P, Sousa-Poza A, He X B. Peer effects on childhood and adolescent obesity in China [J]. China Economic Review, 2015, 35: 47-69.
- [15] Sampson R J. Great american city[M].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2.
- [16] Manski C F. Identification of endogenous social effects; The reflection problem [J].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1993, 60(3): 531-542.
- [17] 晏艳阳,邓嘉宜,文丹艳. 邻里效应对家庭社会捐赠活动的影响——来自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的证据[J]. 经济学动态, 2017(2):76-87.
- [18] 汪毅. 欧美邻里效应的作用机制及政策响应[J]. 城市问题, 2013(5): 84-89.
- [19] 盛明洁, 运迎霞. 中国城市邻里效应研究框架初探[J]. 城市规划学刊, 2017(6): 50-55.
- [20] 盛明洁. 欧美邻里效应研究进展及对我国的启示[J]. 国际城市规划, 2017, 32(6): 42-48.

① 详见中国政府网: 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1-11/10/content_5650017.htm.

- [21] Owens A. Neighborhoods and schools as competing and reinforcing contexts for educational attainment [J]. Sociology of Education, 2010, 83 (4): 287-311.
- [22] Wodtke G T, Elwert F, Harding D J. Neighborhood effect heterogeneity by family income and developmental period[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2016, 121(4): 1168-1222.
- [23] Chetty R, Hendren N, Katz L F. The effects of exposure to better neighborhoods on children: New evidence from the Moving to Opportunityexperiment[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6, 106(4): 855-902.
- [24] Wodtke G T, Parbst M. Neighborhoods, Schools, and Academic Achievement: A Formal Mediation Analysis of Contextual Effects on Reading and Mathematics Abilities [J]. Demography, 2017, 54(5): 1653-1676.
- [25] 刘欣、夏彧. 中国城镇社区的邻里效应与少儿学业成就[J]. 青年研究、2018(3): 1-11+94.
- [26] 孙伦轩. 中国城镇青少年成长的邻里效应——基于"中国教育追踪调查"的实证研究[J]. 青年研究, 2018(6): 31-38+92.
- [27] 余丽甜, 詹宇波. 家庭教育支出存在邻里效应吗? [J]. 财经研究, 2018, 44(8): 61-73.
- [28] 方航,程竹,陈前恒.农村教育投资存在同群效应吗?——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实证研究[J].教育与经济,2021,37 (3):51-58.
- [29] 周东洋,吴愈晓. 教育竞争和参照群体——课外补习流行现象的一个社会学解释[J]. 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5):84-97.
- [30] 杨莉. 同伴效应对初中生校外补习支出的影响研究——基于 CEPS 数据的实证分析[J]. 上海教育科研, 2021(5): 29-34.
- [31] 金红昊, 谢心怡, 杨钋. 学生课外补习参与的同伴效应研究[J]. 教育经济评论, 2021, 6(5): 66-82.
- [32] Liu H, Sun Q, Zhao Z. Social learning and health insurance enrollment: Evidence from China's new cooperative medical scheme [J].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 Organization, 2014, 97: 84-102.
- [33] Ling C, Zhang A Q, Zhen X P. Peer effects in consumption among Chinese rural households [J]. Emerging Markets Finance and Trade, 2018, 54(10): 2333-2347.
- [34] 罗伯特·K·默顿. 社会理论和社会结构[M]. 唐少杰, 齐心,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6: 484.
- [35] 罗伯特·K·默顿. 社会理论和社会结构[M]. 唐少杰, 齐心,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6: 456.
- [36] 余丽甜, 詹宇波. 家庭教育支出存在邻里效应吗? [J]. 财经研究, 2018, 44(8): 61-73.
- [37] 吴愈晓, 张帆. "近朱者赤"的健康代价: 同辈影响与青少年的学业成绩和心理健康[J]. 教育研究, 2020, 41(7): 123-142.
- [38] 廖常君. 城市邻里关系淡漠的现状、原因及对策[J]. 城市问题, 1997(2): 37-39.
- [39] 杨贵庆. 安得"高"厦千万间,大庇都市居民尽欢颜——上海城市高层住宅居住环境和社会心理调查分析与启示[J]. 城市规划汇 刊,1999(4):35-38+79-80.
- [40] 王丽娟. 从一场纠纷透视农村邻里关系的变迁[J]. 中国青年研究, 2012(8): 22-25.
- [41] 闫新华,杭斌,收入不平等与家庭教育支出——基于地位关注的视角[J]. 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17,(5):1-13.
- [42] 邱慧燕, 柴江. 家校合作体系构建的要素、困境及路径[J]. 内蒙古社会科学, 2021, 42(6): 179-186.
- [43] 储朝晖. 家校社协同育人实施策略[J]. 人民教育, 2021(8): 33-36.
- [44] 赵文君. 市场监管总局对校外培训机构突击开展现场检查 15 家校外培训机构被处以顶格罚款[N]. 中国教育报, 2021-06-02(3).

(责任编辑 王建平)

现代教育论丛

JOURNAL OF MODERN EDUCATION

No. 2, 2022 General. No. 244

我国课后服务政策工具选择及其优化

——基于27份省级政策文本的计量分析

邓 亮 张一帆

(江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南昌330022)

摘 要:本研究基于内容分析法构建政策工具和工作要素的二维分析框架,对我国省级政府课后服务政策工具构成进行计量分析。研究发现,我国课后服务政策工具选择存在内部结构性失衡、政策供给不均衡,以及课后服务政策工具与工作内容要素间不匹配等问题。应优化政策工具的结构性,提升课后服务政策的协同效力;增强政策工具的均衡性,实现课后服务政策的长远目标;完善政策工具的匹配性,创设课后服务实施的良好环境。

关键词: 课后服务: 政策工具: 均衡: 匹配: 计量分析

中图分类号: G52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6762(2022)02-0046-10

课后服务是中小学课堂教学结束后,由学校、家庭和社会等多部门提供的一种不同于学校课堂教学,旨在保护和促进儿童成长的教育服务活动。[1]为全力做好课后服务工作,解决"三点半"难题,我国教育部于2017年2月印发的《关于做好中小学生课后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指出,"广大中小学要积极开展课后服务工作"[2]。此后,全国各省、直辖市和自治区相继出台了省级层面的课后服务政策实施方案。然而,政策制定并不必然意味着政策价值和政策目标的实现,政策执行作为一个复杂的动态过程,受诸多因素影响,尤其是"政策工具作为实现政策目标的基本途径,其选择是政策成败的关键"[3]。美国学者莱斯特·M·萨拉蒙(Lester M Salmen)指出"公共行动的失败不是源于政府管理人员的无能或渎职,而更多是由于他们使用的工具或行动方式"[4]。从当前政策执行情况来看,课后服务政策执行效果并未达到预期目标,"66.4%的教师和54.5%的家长认为课后服务形式单一,难以满足学生成长需求"[5]。为确保课后服务政策执行结果达到预期目标,应关注其政策工具的使用情况。因此,本研究依循政策工具视角,构建"政策工具—工作要素"二维分析框架,对我国省级政府层面课后服务政策中政策工具的类型结构、选取倾向及其对当前我国课后服务工作发展的影响等进行分析,以期从政策文本内部审视课后服务政策,剖析文本内部政策工具的深层结构和互嵌关系,揭示政策工具选择和使用中存在的问题,为今后课后服务政策科学出台和有效落实提供参考。

收稿日期: 2022-01-15

基金项目: 江西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江西省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现状及推进策略研究(20JY46)

一、政策文本选择与分析方法

(一)政策文本选择

为保证研究样本的权威性和科学性,本研究样本均来自教育部、教育厅和教委网站发布的相关政策,共收集到全国 27 个省份"课后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的政策文本(见表 1)。

表 1 课后服务政策文本

	省(市、自治区)	颁布时间	文件名
1	湖北	2016-08-24	关于开展小学生课后在校托管服务的指导意见(试行)
2	广西	2017-11-20	关于做好中小学生校内课后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
3	天津	2017-12-22	关于在我市中小学开展课后服务工作的通知
4	广东	2018-03-23	关于做好中小学生校内课后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
5	福建	2018-03-29	关于做好中小学生课后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
6	北京	2018-09-19	关于加强中小学生课后服务的指导意见(试行)
7	浙江	2018-12-12	关于进一步规范小学放学后校内托管服务工作的实施意见
8	安徽	2018-12-17	关于进一步做好中小学生课后服务工作的通知
9	江苏	2018-12-20	关于做好中小学生课后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
10	四川	2019-01-26	关于做好中小学生课后服务工作的实施意见
11	辽宁	2019-02-20	关于切实做好中小学生课后服务工作的通知
12	湖南	2019-02-28	关于做好中小学生校内课后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
13	上海	2019-03-01	关于进一步做好本市小学生校内课后服务工作的通知
14	河北	2019-04-08	关于做好小学生校内课后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
15	陕西	2019-05-23	关于做好中小学生课后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
16	山东	2019-05-30	关于全面推进小学课后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
17	内蒙古	2019-08-16	关于做好中小学生校内课后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
18	新疆	2019-08-19	中小学校试点开展学生课后托管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
19	江西	2019-08-30	关于做好全省中小学生课后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
20	海南	2019-09-26	关于做好中小学生校内课后服务工作的实施意见(试行)
21	黑龙江	2019-11-06	关于做好中小学课后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
22	甘肃	2019-11-19	关于做好中小学生课后服务工作的实施意见
23	重庆	2019-11-28	关于全面推进中小学生课后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试行)
24	宁夏	2019-12-27	中小学生(幼儿)课后服务工作指导意见
25	河南	2020-05-20	关于做好中小学生课后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
26	山西	2020-12-28	关于做好中小学生课后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
27	吉林	2021-02-26	关于做好中小学生课后服务工作的通知

(二)研究方法

内容分析法是"对被记载下来的人类传播媒介的研究,其本质是一种编码,即将原始材料转换成标准化形式材料"^[6],通过对质化文本内容所包含的信息进行规范性的分类编码和数理统计,分析和验证政策文本制定者的意图、目标及有效性等^[7]。本研究采用内容分析法对课后服务政策文本展开分析,通过构建政策工具与工作要素二维分析框架,对编码后的课后服务政策文本进行量化分析。

二、课后服务政策分析框架构建

政策工具是政府为达到既定政策目标所采取的手段^[8],也就是政策目标与政策结果之间的桥梁。政策工具的相关研究最早始于荷兰经济学家柯辛(Kirschen)等对经济政策工具的分类。20 世纪 90 年代政策工具研究不断丰富和拓展,并成为政策科学研究的焦点。学者们依据不同标准对政策工具进行了不同分类:麦克唐纳尔(McDonnell)等依据政策工具目的将其分为命令性工具、激励性工具、能力建设工具和系统变化工具 4 种^[9];施奈德(Schneide)等人基于目标群体对政策反应的行为假设将其分为权威、能力建设、激励、象征及劝诫、学习工具^[10];罗斯威尔(Rothwell)等将其分为供给型、需求型和环境型政策工具^[11]。本研究认为罗斯威尔·罗伊的分类方法更为具体,易于操作,且该政策工具已广泛运用于我国基础教育领域的政策文本中^[12],对于分析课后服务政策具有较好的适切性。

(一)X维度:政策工具类型维度

本研究将课后服务政策样本中的政策工具按照供给型、需求型和环境型工具进行分类(见图 1)。其中,供给型政策工具是指对课后服务起到推动作用的政策,通常体现为政府通过提供基础设施、教育培训、公共服务、资金投入等有效手段来支持课后服务工作的开展,它是我国课后服务工作持续推进的基本保证;需求型政策工具是指对课后服务起拉动作用的政策,通常体现为政府通过政府购买、公私合作、鼓励引导、示范宣传来激发课后服务工作;环境型政策工具是对课后服务产生影响的政策要素,包括目标规划、金融支持、管理措施和法规管制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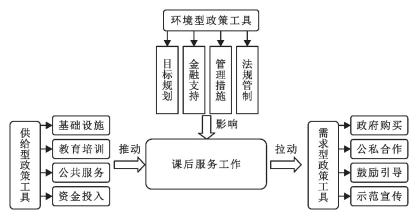


图 1 政策工具对课后服务工作的影响

(二)Y 维度:课后服务工作要素维度

政策工具类型呈现了课后服务政策的一般特征,但难以反映课后服务工作的内在规律和特点,而这恰是制定课后服务政策和落实课后服务工作要关注的重点。因此,需要在政策工具维度基础上进一

步结合课后服务工作的要素来构建课后服务政策的二维分析框架。张亚飞通过对英美等主要发达国家中小学课后服务研究发现,课后服务工作包括"认识定位、经费保障机制、场所供给、内容设计、师资配置、质量监管"六大要素^[13]。屈璐通过对我国课后服务政策的梳理发现,课后服务工作包括"行政职能、实施对象、服务内容、经费保障、人员推进"五方面要素^[14]。本研究依据教育部《意见》及省级课后服务政策文本的相关内容,结合国内外已有研究对课后服务工作构成要素的分析,将我国中小学课后服务工作要素划分为总体要求、服务内容、师资队伍、经费保障、质量评价和监督管理六个方面。其中,总体要求是政策执行主体对课后服务工作应达目标与相关要求的认识与安排,包括目标定位和具体要求两个次级要素;服务内容是课后服务应该提供何种形式的学习内容,具体包括服务形式和服务方式两个次级要素;师资队伍是对从事课后服务工作的教师进行聘任、培训以及评价等制定安排,包含教师聘任、教师培训和教师评价三个次级要素;经费保障是开展课后服务所需要的经费支持,具体包括财政投入、税收优惠、费用收取三个次级要素;质量评价是多元主体对课后服务质量的评价,包括教学评价、组织管理评价和社会满意度三个次级要素;监督管理是为保障课后服务政策高效运转所实施的保障性措施,具体包括工作监督、规范管理、批评惩处三个次级要素。

三、政策文本内容分析

政策文本内容分析是以政策文本为研究对象,对政策文本中的内容进行量化分析,以发现文本深层次内涵的一种研究方法。该方法能在一定程度上克服文献定性研究的主观偏见,增加研究的可信度,因而广泛应用于政策研究当中。本研究运用内容分析法对我国课后服务政策文本进行量化分析,首先是对政策文本进行内容编码,其次依据构建的分析框架对编码内容进行计量分析。

(一)政策文本内容编码

依据构建的二维分析框架,对研究样本进行内容编码,并从纵横两个维度进行计量分析。本研究按照"省(市、自治区)-章-节-条目"的规则,对政策文本内容反复研读,以具体条款中所表达的一句话(以句号或分号为标准)作为编码依据与划分标准进行编码和归类统计。编码由三个人共同完成。编码前先明确了编码的要求与标准,然后三名研究人员运用独立评判法共同进行编码归类,通过协商确定编码中出现的不同意见。具体操作步骤:(1)在充分理解研究设计和编码要求后,三人同时独立对分析单元进行类目编入,得到初步编码表;(2)对比初步编码表,对编码不一致的分析单元进行二次归类;(3)最终形成了表 2 所示的内容编码一览表(由于篇幅限制,此处仅展示部分编码内容)。

(二)X 维度分析

通过对 27 份政策文本编码单元进行计量分析后,得到课后服务政策工具分析结果(见图 2)。根据量化统计结果可知,我国课后服务政策综合运用了供给型、需求型和环境型三种基本政策工具,但三者的使用频率存在较大差异。其中,环境型政策工具使用最多,占比达到 58.22%;其次为供给型政策工具,占比 24.39%;需求型政策工具使用最少,占比 17.38%。由此可知,我国课后服务政策较为依赖环境型政策工具的使用。

表 2 课后服务政策文本的文献编码(部分	表 2	课后服务	多政策文	本的文i	献编码(部分
----------------------	-----	------	------	------	------	----

省(市、自治区)	章	节	条目	编码
海南省	二、基本原则	(四)民主管理原则	中小学生校内课后服务由学校统一组织或参与	20-2-4-1
			实施, 服务方式、服务内容、安全措施、收费	
			标准等事项要公开公正, 主动接受学生、家长	
			和社会监督。	
北京市	一、总体要求	(一)总体思路	普遍建立弹性离校制度,以学校丰富多彩的课	6-1-1-2
			外活动为基础,以提供课后托管服务为基本内	
			容,做好课后服务工作,促进学生全面健康	
			成长。	
宁夏自治区	五、保障措施	(三)加强队伍保障	学校(幼儿园)开展课后服务可根据实际学生人	24-5-3-2
			数组班, 对参加人数较少的可跨班级跨年级统	
			筹组班,每个班应安排1名教师负责管理服务。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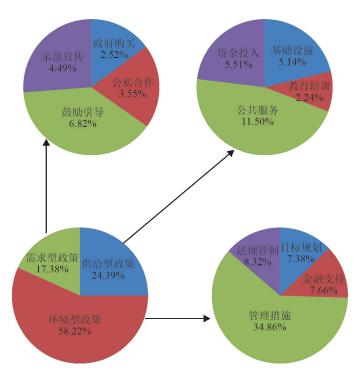


图 2 课后服务政策工具类型的比例图

对政策工具各维度的频次统计分析发现,三种课后服务政策工具的二级分类中,占比也各不相同, 且均存在明显倚重的政策工具类别。在供给型政策中,基础设施频次为55,占比5.14%;教育培训频 次为24,占比2.24%;公共服务频次为123,占比11.50%;资金投入频次为59,占比5.51%。在需求 型政策中,政府购买频次为27,占比2.52%;公私合作频次为38,占比3.55%;鼓励引导频次为73, 占比6.82%;示范宣传频次为48,占比4.49%。在环境型政策中,目标规划频次为79,占比7.38%; 金融支持频次为 82, 占比 7.66%; 管理措施频次为 373, 占比 38.86%; 法规管制频次为 89, 占比 8.32%。

(三)X-Y 二维分析

为深入探究课后服务政策工具应用的具体领域差异,本研究构建了"政策工具(X)-工作要素(Y)"二维分析框架,并基于该分析框架对政策文本分析单元的匹配情况进行统计分析和编码,从而形成 X-Y 维度的交叉分析统计表(见表 3)。整体来看,政策文本内容基本涵盖了课后服务政策工作的所有要素内容,但三种政策工具在不同要素中的应用频次存在显著差异。其中,与监督管理相关的政策工具共有 408 条,占比高达 38.13%,表明国家尤为注重对课后服务的监督管理,这与前文 X 维度的分析一致。但在师资队伍和质量评价中,三种政策工具使用不足,前者有 63 条,后者只有 23 条,占比分别为 5.89%和 2.15%。

政策内容 工具类型	供给	需求	环境	总计	占比	
总体要求	57	54	115	226	21. 12%	
服务内容	63	28	105	196	18. 32%	
师资队伍	22	9	32	63	5.89%	
经费保障	30	36	88	154	14. 39%	
质量评价	5	3	15	23	2. 15%	
监督管理	84	56	268	408	38. 13%	
合计	261	186	623	1070	100%	

表 3 X-Y 维度交叉分析

四、当前我国课后服务政策工具选择存在的问题及影响

(一)当前我国课后服务政策工具选择存在的问题

通过上述对我国中小学课后服务工作政策工具分布的分析发现,当前我国课后服务政策工具已产 生了较为严重的选择偏向,对课后服务工作带来了不利影响,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

1. 政策工具结构性失衡

第一,过度使用环境型政策工具,且集中于管理措施。在我国省级层面课后服务政策所包含的三种政策工具当中,环境型政策工具占比 58. 22%,这近乎六成的比重使其具有绝对主导地位,然而其内部结构却呈现两极分化状态。管理措施所占比重为 34. 86%,超过其他三个比重之和。从文本内容分析来看,政府主要通过一定的方法、措施以及手段来推动课后服务工作的开展。这些管理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促进课后服务开展,但其发挥作用的持续性有限,尤其是当政府部门对于课后服务的目标规划不够明晰时,专注于管理措施会导致课后服务缺乏方向以及相应的评价标准。法规管制共计 89条,占比 8. 32%,说明政府应加强课后服务工作的法律监管,明确违规收费、变相补课等行为的惩处措施。从整体来看,环境型政策工具中,管理措施占比最高,其余三项占比较低,且比重差别不大,政策工具的影响力有限,政策工具内部的协调性较差。

第二,供给型政策偏弱,潜力尚未发挥。供给型政策工具对课后服务工作起着直接的刺激作用,

能有效推动课后服务工作的开展以及课后服务市场的形成。通过分析发现,供给型政策工具总共 261 条,占比为 24.39%,相比环境型政策工具而言,明显偏弱。尤其是针对课后服务的基础设施、教育培训和资金投入更显不足。而我们知道,课后服务工作的可持续推进离不开大量资金的投入,同时更需要通过形式多样的教育培训来打造高素质的专业化教师队伍。由此可知,目前课后服务供给型政策工具使用不足,其执行效果不够充分,需要进一步挖掘和释放供给型政策工具的潜力。

第三,需求型政策工具较为缺乏,处于"半缺失"状态。与前两种政策工具相比,需求型政策工具在所有政策工具中占比最低。仅为 17. 38%,在政策工具整体设计中处于弱势地位和"半缺失"状态。在二级政策工具分类中,政府购买占比最低,进一步结合文本分析可知,目前政府部门并未通过积极购买课后服务市场中的优质教育资源来推动学校课后服务质量提升,加之由于"学校管理者没有从思想上真正认识到家长参与学校管理的重要性以及家长参与学校管理的相关制度不健全"[15],使得学校难以联合家庭等多方力量,无法提供丰富且多元的优质课后服务内容,也严重挫伤课后服务市场的积极性与政策影响力。由此可见,目前我国课后服务政策体系中,需求型政策工具的设计与应用能力亟待提升。

2. 政策工具选择多着眼于短期效益, 政策供给不均衡

通过对 X-Y 维度的统计数据可知,政策工具在课后服务工作的六大要素上都得到了全面覆盖,但各要素间呈现出不均衡的政策供给。监督管理、总体要求和服务内容这三个要素的频次较多,所占比重也较高,而经费保障、师资队伍和质量评价三个要素的频次依次减少,比重较低,尤其是与课后服务密切相关的师资队伍和质量评价要素供给严重不足。这表明当前我国课后服务政策的重心是在监督管理方面,即着眼于通过快速解决眼前出现的问题以推进课后服务工作全面开展,而对于课后服务的关键性问题和有利于课后服务长远发展的问题关注不够。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过于注重对课后服务工作的监督管理,难以释放课后服务市场活力。加强监督管理确实有利于课后服务工作的有序开展,但如果只是一味强调对课后服务工作的监督,难以发挥学校之外的社会组织力量,难以充分激发课后服务市场活力。其次,课后服务师资队伍缺乏。与师资队伍相关的政策工具使用比例只有5.89%,明显不足。如果没有充足的专业化教师队伍,课后服务质量的提升便无从提起。随着课后服务规模的扩大,以及对高质量课后服务的多元化需求,加强课后服务师资队伍的政策工具设计显得至关重要。最后,课后服务质量评价标准缺失。如何对课后服务进行科学的质量评价也是影响课后服务工作的重要因素。从目前的分析可知,政策工具对于该维度的关注明显不足。这也反映了目前关于课后服务工作的重要因素。从目前的分析可知,政策工具对于该维度的关注明显不足。这也反映了目前关于课后服务工作质量评价的指标体系、评价主体以及评价方式等都是极为缺乏的,这也是未来课后服务工作的重点改进之处。

3. 课后服务政策工具与工作内容要素间的匹配性不足

X-Y 维度的交叉分析显示,课后服务政策供给与内容要素间存在匹配性不足问题。一方面,不同政策内容的工具类型匹配不足。例如,监督管理和总体要求的政策工具类型较多,而质量评价、师资队伍等政策内容的工具类型较少,这种匹配不均衡导致课后服务工作的一些要素在政策落实中受到忽视,影响政策的实效性。教师队伍是开展课后服务的重要主体与关键因素,没有优秀的教师队伍,课后服务的形式、内容与质量都得不到有效保障。另一方面,同一政策内容的工具类型匹配不足。例如课后服务内容在供给、需求和环境三种工具类型的频次分别为 63、28、105,出现了需求政策工具匹配不足,这会导致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出现极端偏差行为。又如,针对课后服务工作的监督管理,若仅强

调需求型政策供给,而缺乏供给型政策和环境型政策的配合使用,将严重影响监督管理政策的整体效应。

(二)当前我国课后服务政策工具选择对课后服务工作的影响

当前我国课后服务政策中政策工具的环境型选择偏向与缺乏系统组合配置对课后服务政策的实施 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方面,环境型的政策工具选择偏向能在短期内营造课后服务工作的氛围;另一 方面,缺乏系统组合配置则会影响课后服务工作的可持续性。

1. 促使学校迅速开展课后服务工作,扩大课后服务规模

环境型政策工具的使用,尤其是其中监督措施的大量使用能为课后服务工作开展创造较好的环境氛围。与此同时,政府部门自上而下的强制性措施能够有效推进中小学校迅速开展课后服务工作——即使在条件还不成熟的学校,为了避免不履行上级政策文件所带来的惩罚,学校也会通过成立课后服务工作领导小组,发布学校层面课后服务文件来推动课后服务工作开展。如此,短期内课后服务规模将得到快速扩大。

2. 难以激发课后服务市场活力,限制课后服务内容的多元化

通过对课后服务政策文本进行横向维度分析发现,需求型政策工具中的政府购买和公私合作占比都非常低。这说明目前的课后服务政策工具选择仍然偏向于要求学校利用已有场地和资源来开展课后服务,而对于已具有较好优势的课后服务市场化运作机构以及具备资源优势的社区等没有进行政府购买和积极合作。这种将课后服务市场化机构排除在外的政策行为难以激发课后服务市场活力,也难以提供丰富且多元的课后服务内容。有研究指出:"由于学生放学后学校和教师被'义务性'地要求提供和履行额外服务,缺乏必要激励,学校和教师缺少动力探索和提供多样化的社会服务。"[16]这与现实中许多学校缺乏开展课后服务的相关场所和资源、许多时候只为应付上级的要求、学校依然将课后服务局限于辅导学生作业或让学生自习等较为单一的形式较为吻合。

3. 不利于打造专业化教师队伍, 影响课后服务质量水平提升

从对课后服务政策文本进行纵向维度分析发现,目前的政策文本对于师资队伍和质量评价的政策 关注和政策供给偏弱。中小学教师目前教学任务和压力都较大,若还要开展课后服务难免会不从心。 如果课后服务工作只是"一味依靠教师的自觉性来实施,这项工作就缺乏可持续性和常态化机制^[17]", 况且中小学教师更倾向于提供作业辅导等课堂内容服务,对于促进学生全面发展所需要的艺术鉴赏、 课外劳动实践等形式的课后服务内容难以提供。因此,如果仅在供给型政策中强调公共服务,而不是 加强对教师培训以打造一支高素质的专业化课后服务教师队伍,将影响课后服务质量提升。与此同时, 课后服务政策科学的评价标准尚未建立,对于按什么标准考评、考评结果如何使用等问题都没有明确 的指导。^[18]质量评价政策的供给不足,使得学校和社会无法对课后服务质量进行科学合理的评价。这将 进一步"助推"教师开展一些低层次且质量不高的课后服务,严重影响课后服务工作的可持续推进与质量的稳步提升。

五、政策建议

(一)优化政策工具的结构性,提升课后服务政策的协同效力

不同的政策工具具有不同的特点及适用情境。[19]因此,政策工具的科学化组合对政策效果有着重要

影响。当前我国政府应根据课后服务政策目标与现实需求,对政策工具进行科学组合,提升政策协同效力。首先,在环境型政策工具中,应减少短期性管理措施的运用,增强对课后服务的长远目标规划以及相关的金融支持和法规管制,为课后服务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氛围。其次,在供给型政策层面,在增强基础课后服务公共服务建设的同时,进一步强化相关的基础设施建设,为课后服务开展提供充足的设施场所,尤其应增加课后服务的资金投入以及教师培训,为课后服务的可持续发展提供资金与师资队伍保障。纵观我国 27 份省级课后服务政策发现,大部分样本中对于政策工具的三个层面均有所覆盖,每一个政策工具都有其特定的使用范围与实效价值。今后我国课后服务政策制定应该根据课后服务目标,选择合适的政策工具,并平衡好政策工具的内容,发挥政策工具促进课后服务工作开展的综合效应。最后,增加需求型政策工具中各维度内容。政府应通过增加政府购买与公私合作等行为方式吸引更多优质的课后服务资源进入我国中小学课后服务当中,丰富课后服务的形式与内容,同时通过鼓励引导与示范宣传等方式树立课后服务工作先进典范,为我国课后服务的高质量开展提供政策支持与保障。总之,政府部门应综合运用三种基本政策工具,并协同使用各工具中的子工具,为我国课后服务工作开展提供长效的政策动力。

(二)增强政策工具的均衡性,实现课后服务政策的长远目标

在省级层面课后服务政策的实施过程中,必然会出现政策的调整、反馈以及改进,这些过程除了应关注当前课后服务工作的启动与开展之外,更应该立足长远,关注课后服务工作如何实现高质量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在强化监督管理与丰富服务内容的同时,要不断增强课后服务师资保障、经费投入以及质量评价,使政策供给实现高质量的动态均衡。从长远效益来看,省级政府部门应该进一步制定专项政策,以加强对课后服务的经费投入,研制课后服务质量评价标准。例如,上海市教委于2019年3月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做好本市小学生校内课后服务工作的通知》提出,"要加强对财政性经费使用的规范管理,指导学校提高经费使用效益"[20]等具体要求,明确省级政府层面不仅应该重视对课后服务经费投入政策的供给,更应该不断规范课后服务经费的使用,以提高经费使用效益。其他省(市、地区)可以效仿上海市的做法,进一步出台专项政策,实现政策供给的均衡性。与此同时,政策制定部门接下来应该结合本地课后服务开展的总体要求与现实情况,邀请相关专家来研制课后服务质量评价标准,并对课后服务工作进行科学合理的评价。

(三)完善政策工具的匹配性, 创设课后服务实施的良好环境

为满足中小学课后服务工作深入开展的迫切需要,我国省级政府部门应充分发挥政策工具的作用,提高基本政策工具与课后服务内容要素之间的匹配性,尤其是根据课后服务工作发展的现实问题与未来目标,动态调整政策供给与内容要素之间的匹配性,优化我国课后服务政策体系。在总体要求要素中,应增加供给型和环境型政策工具的使用,促使人们对课后服务总体要求有更明确的认识,也为课后服务总体要求的实现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氛围;在师资队伍建设要素中,应该增强需求型政策工具的使用,通过政府购买优质课后服务,鼓励和引导有才艺和经验的社会人士参与到学校的课后服务中来,扩大课后服务教师队伍规模,优化课后服务教师队伍结构。比如,广东省《关于做好中小学生校内课后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中提出校内托管为主,校外参与为辅的理念,建立"家长有责,合理分担""教工参与,合理取酬"的机制,对课后服务工作模式进行了新的探索。[21] 在质量评价要素中,政府部门要做好项层设计,在增加相关政策工具供给的同时,也要做好政策供给与质量评价要素间的良好匹配,让课后服务质量评价工作在良好的环境当中稳步推进,为我国课后服务工作高质量发展提供保障。

参考文献:

- [1] 李醒东, 赵伟春, 陈蕊蕊. 对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课后服务的再思考[J]. 中国教育学刊, 2020 (11): 61-65+91.
- [2]《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做好中小学生课后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EB/OL]. [2017-03-12]. http://www.moe.gov.cn/srcsite/A06/201703/t20170304_298203. html.
- [3] 严强. 公共政策学[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8: 94.
- [4] 莱斯特·M. 萨拉蒙. 公共服务中的伙伴: 现代福利国家中政府与非营利组织的关系[M]. 田凯,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2008: 23.
- [5] 邓亮, 赵永辉. 江西省中小学课后服务工作的现状调查与分析[J]. 南昌师范学院学报, 2019(5): 124-127.
- [6] 艾尔·巴比.社会研究方法(第11版)[M]. 邱洋奇、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2009: 318-328.
- [7] 李纲. 公共政策内容分析方法: 原理与应用[M]. 重庆: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07: 4.
- [8] 陈振明, 张敏. 国内政策工具研究新进展: 1998—2016[J]. 江苏行政学院学报, 2017(6): 109-116.
- [9] Elmore RF. Instrument sand strategy in Public Policy [J]. Policy Studies Review, 1987, 7(1): 174-186.
- [10] Schneider A, Ingram H. Behavioral As-sumptions of Policy Tools [J]. Journal of Politics, 1990, 52(2): 522.
- [11] Rothwell R, Zegveld W. Reindusdalization and Technology[M]. London: Logman Group Limited, 1984: 436-444.
- [12] 谢倩,王子成,周明星.新中国成立70年乡村教师支持政策文本量化分析——基于政策工具视角[J].现代教育管理,2020(4):61-67.
- [13] 张亚飞. 主要发达国家中小学课后服务研究[J]. 外国教育研究, 2020(2): 59-69.
- [14] 屈璐. 我国基础教育课后服务政策嬗变及展望[J]. 现代远距离教育, 2019(4): 14-19.
- [15] 何光桥. 家长参与学校管理存在的问题、原因与对策[J]. 教学与管理, 2019(1): 39-41.
- [16] 马健生, 邹维. "三点半现象"难题及其治理——基于学校多功能视角的分析[J]. 教育研究, 2019(4): 118-125.
- [17] 唐守伦. 解决"三点半难题"政府要舍得花钱[N]. 中国教育报, 2018-04-17(2).
- [18] 顾艳丽, 罗生全. 中小学课后服务政策的价值分析[J]. 教育科学研究, 2018(9): 34-38.
- [19] 黄忠敬. 教育政策导论[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93.
- [20]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等. 关于进一步做好本市小学生 校内课后服务工作的通知[EB/OL]. [2019-03-14]. http://edu. sh. gov. cn/html/article/201903/99514. html.
- [21] 广东省教育厅. 关于做好中小学生校内课后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EB/OL]. [2018-03-22]. http://edu. gd. gov. cn/gkmlpt/content/2/2102/post_2102594. html.

(责任编辑 于小艳)

现代教育论丛

JOURNAL OF MODERN EDUCATION

No. 2, 2022 General. No. 244

小学家长作业参与:方式、行为与改进

康乃馨1 徐文琪2 方 征2

(1. 西安航空学院, 西安 710077; 2. 华南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 广州 510631)

摘 要:采用混合研究法,通过对 429 组学生及家长展开问卷调查,对家长和教师进行深度访谈,以考察家长在学生家庭作业中的参与方式及行为。研究发现,以自主支持或控制型、响应或介入型的方式参与学生作业时,家长较高的自我效能感促使其高频率、高响应的参与行为形成;以物理环境构建型的方式参与学生作业时,家长对自主学习观的误解及参与条件和体验感的缺乏,导致其行为具有较强的控制性和监控性。改善小学家长作业参与,应更新家长观念确保学生在作业中的主体地位,促进家校联动、加强作业参与的沟通和指导,激活社会资源帮助家长释放活力。

关键词:家庭作业;家长参与;参与方式;参与行为

中图分类号: G4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6762(2022)02-0056-10

2021年7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明确指出建立作业管理机制,严禁给家长布置或变相布置作业,严禁要求家长检查、批改作业"的规定是否等同于家长不用参与学生家庭作业?除了检查批改作业,家长在学生家庭作业完成上还需要和能够扮演什么角色和发挥什么功能?本文将基于我国小学家长在家庭作业中的具体参与行为,廓清目前家长的参与方式和特点,探寻在"双减"背景下家长作业参与的改进路径。

一、文献回顾与研究框架

(一)文献回顾

1. 家长参与和作业参与

家长在子女教育中的参与十分普遍。国外学者认为家长参与内容包括: (1)建立家校合作关系; (2)充当教育角色,如在学校作为志愿者或在教学上提供帮助; (3)出席学校活动及支持孩子学业,如

收稿日期: 2022-02-01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十三五"规划 2018 年度教育学一般课题"公共性视域下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政策体系建构研究"(BFA180060)

设置学业目标、辅导学生作业、设立学业期望等。① 家长参与,尤其是家长作业参与看似是发生在家庭中的,但事实上是学校教育在家庭环境中的延伸,家长的参与行为并不仅取决于家长和子女,更受到其他教育主体的影响,如学校、专门教育机构等。

因此,本研究将"家长参与"定义为家长为了提升子女学习、促进子女全面发展,与孩子、学校及其他教育组织机构产生的互动行为。并将家长的作业参与行为的范畴定义为对作业的辅导、批改等简单行为,和对子女思维方式的培养、学习习惯的培养、学习环境的塑造,以及由作业表现产生的家校沟通等。

2. 家长参与学生家庭作业的行为方式划分

美国家庭作业领域的专家 Harris Cooper(2000)用自主支持、直接接入和消除干扰三个维度区分家长在孩子作业过程中的参与方式。自主支持(Autonomy support),指家长让孩子独立完成作业的行为;直接干预(Direct involvement),指家长在教师或者孩子的要求下,参与学生家庭作业,帮助孩子理解作业内容的行为;消除干扰(Elimination of distractions)是指家长排除作业干扰,为孩子营造安静的学习环境的行为。这一划分法被称为"三分法",被国内外学者广泛引用,多用来给家长作业参与行为进行分类。

德国学者 Dumont 及其团队(2014)在开发家长作业参与质量测量表时,也用控制(control)、响应 (responsiveness)和结构(structure)三个维度划分家长参与方式。控制与 Cooper 提出的自主支持相对,专指父母参与中的消极行为方式,如施压、干涉和指挥等行为;结构指父母对作业物理环境的布置和构建;响应用来表示介入(interpersonal involvement),指家长在作业过程中的积极参与行为。

我国则起步较晚,2010年开始才陆续有学者关注这一话题,学者们一系列关于家长参与学生作业行为的研究证实了国外的划分方法可以在中国本土化情境中被广泛利用。如黄小瑞,安桂清(2018)在对国内外文献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对我国学生及家长进行调查,得到四种家长参与类型,分别是支持型、一般型、严厉型、放养型。

3. 家长参与学生家庭作业的原因及角色功能

国外学者在研究中发现有不少家长会参与到学生的学习及作业过程中去。有学者总结出家长参与学生作业的原因在于:第一,家长对家长角色的构建,家长认为参与子女教育是家长的义务和责任;第二,家长对自我效能的感知,家长认为他们参与子女教育能够促进孩子成长成才;第三,来自学生的请求,家长会因为子女在作业过程中请求帮助而参与作业,这也让家长感受到他们的参与是被需要的。②③

国外学者研究发现,家长在学生作业参与中所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功能都是多样的。家长的榜样 角色起到了重要作用,由于家长的作业参与给学生近距离认识父母提供了机会,学生便会通过观察家 长的参与行为,感受到家长的学习态度、学术水平和学习能力。此外,家长的作业参与不仅对学生学 业产生影响,使学生的知识和技能得到巩固、强化和指导,也对学生的思维能力和情感认知产生影响, 有助于端正学生对学习和做作业的态度、形成有效的作业完成策略,也有利于帮助学生对个人能力和

① Sofia Brock, Alan L. Edmunds. Parental Involvement; Barriers and Opportunities. EAF Journal. 2010. 20(1); 48-59.

② K V Hoover-Dempsey, HM Sandler. Parental involvement in children's education: Why does it make a difference. Teacher College Record. 1995: 97(2): 310-31.

³ HM Sandler, K V Hoover-Dempsey. Why Do Parents Become Involved in Their Children's Education?. Review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1997: 67(1): 3-42.

思想产生正确的自我认知。① 反观国内,家长在学生作业中所发挥的作用都较为单一,家长的作业参与形式多为提供支持、监督和控制,大多关注孩子作业的完成情况及其学业成绩,缺乏对孩子思维能力、非认知能力等多方面的素质培养。如,高雷(2016)通过问卷调查发现,家长参与、家长自主支持和教师支持都能通过影响家庭作业自主动机进而影响家庭作业努力。李新(2018)表示当家长对作业管理态度越严时,学生各科学业成绩表现越好。实际上,除了对孩子作业的简单参与外,家长还需拓展作业参与的角色与功能,使参与的方式更多样化、更有价值,这也是本研究所关注的重点。

(二)研究框架

家庭作业是学生接受学校教育过程中的重要一环,对巩固学生所学、促进全面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为了更好地发挥作业功能和价值,许多家长主动或被动地以控制型、介入型的方式参与学生作业,如监督、检查、批改作业等。但是,家长在作业中的参与不仅限于上述方式,本文借鉴 Cooper 的三分法和 Dumont 的量表,对我国家长参与行为进行区分提出本研究分析框架(见表 1)。家长作业具体参与行为被从三个维度进行分析:(1)自主支持或控制,家长参与行为被分为自主支持型参与和控制型参与;(2)响应或介入,将家长参与行为分为响应型参与和介入型参与;(3)物理环境构建,这一维度描述家长在作业过程中,表现出的对作业环境的布置和构建行为。

表 1 家长家庭作业参与分析框架

		50 1 30 100 ET 20 300 ITEM
	方式界定	具体参与行为描述
自主支持	自主支持型	1. 家长参与学生家庭作业的频率稳定且持续。
或控制	参与	2. 学生经常独立完成作业。
		3. 家长参与作业的目的并不只在于提高作业完成速度。
	控制型参与	1. 孩子并不需要任何帮助时,家长仍会辅导作业。
		2. 孩子做作业时, 若作业出错家长会立刻纠正。
		3. 当孩子作业表现不佳时,家长会施加惩罚(如禁止看电视)。
响应或介入	响应型参与	1. 在孩子求助或遇到难题时,家长会来辅导作业。
		2. 在孩子做作业时,他可以随时向家长寻求帮助。
		3. 在孩子做作业时,家长会用心听取孩子想法,而非直接粗暴地告诉孩子该如何去做。
	介入型参与	1. 家长不是自愿参与作业,而是因为学校或教师的要求。
		2. 在孩子求助或遇到难题时,家长难以及时辅导。
		3. 家长的不当帮助反而给学生带来困扰(如家长辅导内容与学校教育内容不相适合等)。
物理	环境构建	1. 家长希望孩子在外出或玩耍前先做作业。
		2. 家长重视孩子是否有充裕的时间做作业。
		3. 家长会确保孩子处于一个安静的作业环境中,如不受到音乐、电视或电话等带来
		的干扰。
		4. 家长会向孩子解释为何需要在特定的学习环境中(如安静的书房里、或专门的书
		桌前)做作业。
		5. 家长会确保孩子在做作业时准备好所需物品(如尺子、笔等)。

① Hoover-Dempsey K V, Battiato A C, Walker J M T, et al. Parental Involvement in Homework [J]. Educational Psychologist, 2001, 36(3): 195-209.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设计

本研究主要运用混合方法中的顺序性解释设计,即先通过发放问卷收集量化数据,通过分析量化数据对家长作业参与的行为与方式产生基本认识,再通过选择典型个案进行访谈,收集质性数据以帮助解释量化数据结果背后的原因和意义,最后综合定量和定性的结果从整体进行探析。①同时,本研究也融入了嵌套思想,即在资料分析阶段,针对研究问题"家长在学生家庭作业中的参与行为有何特点?",以分析量化数据为主,并借助部分质性数据对内容进行补充说明;在分析研究问题家长参与学生家庭作业行为特点的形成因素时,以质性数据分析为主,辅之以量化数据分析研讨家长特征和家长参与方式间的相关性。

1. 问卷设计

本研究基于上文分析框架,设计了《家长参与学生家庭作业行为调查问卷》,本套问卷分为《家长参与学生家庭作业行为调查问卷(家长版)》(以下简称为《家长版问卷》)和《家长参与学生家庭作业行为调查问卷(学生版)》(以下简称为《学生版问卷》)。其中,《家长版问卷》包括家长的背景变量,家长对于参与家庭作业的看法、功能的认知、对学生作业表现的基本评价,以及家长参与学生家庭作业的频率和方式。《学生版问卷》包括学生的背景变量,学生对于家长参与家庭作业的意愿和效果反馈,以及对作业功能的认知等内容。

2. 访谈设计

访谈具体分为三个部分:访谈前期,即访谈提纲的设计、访谈对象的联系及确定。正式访谈,分为家长访谈和教师访谈。访谈后期,即对访谈材料进行整理和归纳,分析访谈材料,整理结论。本研究采用半结构化访谈对受访对象(家长和教师)进行提问,更为深入全面地了解家长作业参与的具体情况。家长访谈主要围绕家长参与家庭作业的基本情况、学生做作业遇到问题时所采取的策略、对参与家庭作业的看法等话题展开。教师访谈则主要用于了解家长与教师间就学生作业问题展开的家校沟通情况,如沟通方式、沟通频率和沟通内容等,并了解教师对于家庭作业功能的看法。

(二)样本选取

本研究采用方便抽样和典型抽样相结合的方法,选取 G 市 429 组学生和家长,以及 10 位教师作为样本。其中,G 市是我国一座具有代表性的外来人口流入大市,学生与家长群体的特征存在较大差异,保证了样本的全面性和代表性。另外,为了确保调查数据的有效性,避免学生在校寄宿导致家长无法参与家庭作业的情况发生,本文所选样本均来自非寄宿学校,使研究结论更具说服力。

(三)数据收集

数据收集包括两个方面: (1)问卷数据。研究将每位学生及其家长的问卷配对为一组样本。经统计,本研究共发出问卷 429 组,共收回有效问卷 336 组,回收率达 78.3%。采用 SPSS 统计分析软件对问卷进行信效度检验得到,Cronbach's Alpha = 0.719,大于 0.7,表明问卷信度较好;效度检验得到,KMO=0.752,大于 0.7,表明问卷量表部分结构效度较好。(2)访谈调研。研究选取了 19 位已接受问

① IIvankova N V, Stick S L. Students' persistence in a distributed doctoral program in educational leadership in higher education: A mixed methodsstudy [J]. Research in Higher Education, 2007, 48(1): 93-135.

卷调查的家长,及10位班主任教师作为访谈对象。访谈对象身份及编码见表2。

表 2 访谈对象身份及编码

取样对象	取样代码
家长	S1. 1, S1. 2, S2. 1, S2. 2, S3. 1, S3. 2, C1. 1, C1. 2, C1. 3, C1. 4, C1. 5, C2. 1, C2.
	2、C2. 3、C2. 4、C3. 1、C3. 2、C3. 3、C3. 4
班主任教师	S. 1, S. 2, S. 3, S. 4, C. 1, C. 2, C. 3, T. 1, T. 2, T. 3

三、家长在学生家庭作业中的参与方式分析

(一)家长在学生家庭作业中的自主支持型或控制型参与方式

表 3 家长在家庭作业过程中的自主支持型参与方式统计(家长问卷)

题目	选项	占比(%)
家长辅导孩子家庭作业的频率	每天	42. 26
	每周2次以上	32. 14
	大约1周1次	13. 69
	大约 2—3 周 1 次	8. 04
	大于1-2月1次	3. 87
家长参与作业的目的是否只在于提高作业完成速度	是的	13. 39
	有时是的	46. 43
	不是, 出于其他原因	40. 18
学生独立完成作业的频率	总是	34. 23
	经常	55. 36
	偶尔	9. 23
	从不	1. 19

据表 3 结果显示,约 74%的家长在学生家庭作业中的参与频率较高,甚至有四成的家长每天都会辅导孩子作业,从侧面反映出,大部分家长对孩子做作业的情况都较为关心,能做到定期参与孩子的作业辅导,给孩子提供稳定且持续的帮助。在帮助的同时,大部分家长也会注重为孩子提供独立完成作业的时间,让孩子拥有独立思考和独立解决问题的机会。另外,有 86%的家长作业参与的目的并非只图"快",他们往往会为了达到多样的目的去辅导孩子作业,如保障孩子作业质量、巩固学习成果、锻炼思维能力等,体现了家长对作业潜在的作用和帮助的深刻理解。总体而言,家长在家庭作业过程中能适当地给与孩子支持与帮助。

表 4 家长在学生家庭作业中的控制型参与方式(学生问卷)

题目	总是	经常	偶尔	从不
当孩子作业表现不佳时,家长会施加惩罚	19. 64%	11.61%	26. 79%	41. 96%
孩子做作业时,若作业出错家长会立刻纠正	11.61%	13.69%	38.99%	35.71%
孩子不需要任何帮助时,家长仍会辅导作业	8. 04%	15.48%	45. 83%	30.65%

据表 4 显示,较少家长会在学生作业过程中选择控制型的参与方式。大部分家长在孩子作业表现不佳时,不会选择对孩子施加惩罚来改进作业表现,因为批评和惩罚式的辅导教学只会适得其反。在孩子做作业过程中,多数家长不会一看见孩子作业出错就立刻纠正错误,他们会先考虑孩子的需求再向孩子提供指导,可见让孩子学会自己检查和更正作业在家长眼里更为重要。

(二)家长在学生家庭作业中的响应型或介入型参与方式

题目	总是	经常	偶尔	从不
在孩子做作业时,家长会用心听取孩子想法,而非直接粗暴地	50%	22, 62%	12. 8%	14. 58%
告诉孩子该如何去做	30%	22. 02%	12. 6%	14. 38%
在孩子做作业时,他可以随时向家长寻求帮助	32. 14%	24.4%	34. 23%	9. 23%
在孩子求助或遇到难题时,家长会来辅导作业	41.96%	33. 04%	18. 15%	6.85%

表 5 家长在家庭作业过程中的响应型参与方式统计(学生问卷)

据表 5, 受访学生反映,在做作业遇到问题、需要帮助时,多数家长都会提供及时性、经常性的响应和帮助,而且大部分家长在提供帮助时,会听取和尊重孩子的想法,不会简单粗暴地向孩子灌输经验和做法。综合来看,家长在作业参与过程中能结合考虑孩子的需求再向其伸出援手,该参与方式表现出家长较好的响应性。

题目	选项	占比(%)	
学校或教师要求家长参与家庭作业的频率	每天	19. 46	
	每周 1—2 次	30. 95	
	大约 2-3 周 1 次	24. 11	
	大于 1—2 月 1 次	25. 3	
午孩子求助或遇到难题时,家长能及时辅导的频率	总是	46. 13	
	经常	42. 86	
	偶尔	10. 42	
	从不	0.6	
家长是否觉得自己的辅导是一种不当帮助, 反而给学生带	总是	1. 79	
来困扰	经常	11.01	
	偶尔	40. 48	
	从不	46. 72	

表 6 家长在家庭作业过程中的介入型参与方式统计(家长问卷)

表6显示,学校或教师要求家长参与家庭作业的频率的中位数位于"每周1-2次",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学校经常对家长在作业中的参与做出要求,这也许会加大家长被动介入学生家庭作业的可能。另外,超过87%的家长认为,学生做作业遇到问题时,他们能经常为学生提供及时的帮助和指导,而且家长们对自身参与的效果较为乐观,认为自己的参与不会给孩子的作业带来消极影响,自己的介入不会给孩子带来困扰,这从侧面反映出家长对自己的作业参与都较为满意,自我效能感较高。

(三)家长在学生家庭作业中的物理环境构建型参与方式

家长在参与孩子家庭作业时的物理环境构建是指为孩子布置安静、适合的作业环境,做出周全的准备,进行适当的提醒。表7显示,多数家长都会重视孩子的作业时间安排,帮助学生营造安静的作业环境,甚至把必须的文具或学习设备都准备好,部分家长不仅在行动上直接构建利于做作业的学习环境,也会主动向学生解释自己用心布置作业环境的理由。由此看出,家长在参与作业时的物理环境

构建程度较高,具有较好的物理环境构建意识,注重为学生提供有利的学习环境,传授孩子学习环境构建的意识。但家长亲力亲为的环境构建行为也从侧面反映出其对学生作业环境和作业态度有着较高要求,体现了家长在该参与方式中控制性较强的一面。

题目	总是	经常	偶尔	从不
家长会确保孩子在做作业时准备好所需物品	28. 27%	15. 77%	22. 02%	33. 93%
家长会向孩子解释为何需要在特定的学习环境中	50.3%	16. 37%	15. 18%	18. 15%
家长会确保孩子处于一个安静的作业环境中	53. 57%	21. 43%	16.07%	8.93%
家长重视孩子是否有充裕的时间做作业	55.06%	26. 79%	11.61%	6. 55%
家长希望孩子在外出或玩耍前先做作业	55. 65%	17. 26%	14. 58%	12.5%

表 7 家长在家庭作业过程中的物理环境构建型参与方式统计(学生问卷)

四、家长在学生家庭作业中参与行为的特点

(一)家长作业参与具有高度响应性

数据显示,在作业参与过程中,无论面对学生提出的学业问题,还是学习需求,多数家长能够及时回应,配合程度高,普遍给孩子提供了较好的学习环境与硬件支持。

值得注意的是,数据还显示学生就作业问题向家长求助时,许多家长并不会直接告诉答案,而是循循善诱,帮助学生理解题意、掌握解题思路、学习解题方法,表现出家长在参与学生作业时的耐心和用心,说明多数家长的作业参与行为属于积极响应而非消极介入。

(二)家长作业参与具有较强的控制性

研究发现,家长普遍认为孩子应具有独立作业、自主学习的空间和时间,而家长也为学生培养自主能力提供了机会,这表明家长具有培养学生学习的意识和行动。

家长进行物理环境构建型参与时,会帮助学生准备好学习用具、营造适合的作业氛围,甚至亲自规划学生的作业时间,这些举动虽然体现了家长对学生作业的重视,但家长亲力亲为的环境构建行为所映射出的控制欲望与家长的自主支持观念构成了矛盾:家长对学生作业准备工作的高度关心和介入,在一定程度上阻碍着学生自我规划能力和独立作业能力的发展,暴露出家长对学生学习环境建构较强的控制性。

(三)家长作业参与具有高频参与的特点

数据显示,88%家长会在一周内至少参与一次学生的家庭作业,更有七成左右的家长会经常参与学生的作业(每周至少参与两次)。美国的一项调查称美国家长参与家庭作业的频率较高,在不考虑家长社会经济地位等变量的情况下,约70%的家长每周至少辅导孩子一次。①相比之下,我国家长在学生作业中的参与频率远高于美国家长的参与频率,反映出高频参与的特点。

五、家长在学生家庭作业中的参与行为特点的成因分析

(一)家长较高的自我效能感促使其高频率、高响应的参与行为形成

家长的自我效能感是影响家长参与子女教育的因素之一。表8显示,有近一半的家长认为其作业

① Pomerantz E M, Moorman E A, Litwack S D. The How, Whom, and Why of Parents' Involvement in Children's Academic Lives: More Is Not Always Better[J]. Review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2007, 77(3): 373-410.

参与行为对学生学习有着直接影响,认为家长作业参与影响微弱的家长仅占 5.65%,说明家长的自我效能感很高。研究还发现,家长普遍认可作业是帮助学生巩固知识、提升学习效果的重要手段,肯定家长参与对学生作业表现、学业成就上的积极影响,体现了家长参与学生作业较强的意愿。家长这种积极的参与意识促进了高频率、高响应的作业参与行为的形成。

题目	选项	占比(%)
家长是否应该参与到孩子的作业过程中	必须参与24.7可以参与57.44无所谓2.38不应参与15.18有直接影响47.32	
	可以参与	57. 44
	无所谓	2. 38
	不应参与	15. 18
家长作业辅导能否对于孩子的学习产生影响	有直接影响	47. 32
	有一定影响	47. 02
	影响可以忽略	2. 08
	没有影响	3. 57

表 8 家长的作业参与意愿与自我效能感的认知情况(家长问卷)

(二)家长参与条件的缺乏和体验感不佳,减弱了参与的有效性

家长在学生家庭作业中的参与需要家长具备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在我国,双职工家庭的增多和学生放学时间的提前形成了矛盾,家长缺乏必要的、充足的作业参与时间和精力,无法顾及学生的作业表现,这样的现实困境冲击着家长参与的有效性。

而且,学校教育内容和知识体系在不断更新,部分家长的自身知识储备虽然能够"解决"学生作业问题,但家长解决问题的思路与学校中的讲解方法会有出入,导致家长有时不能有效地为学生答疑解惑。在访谈中,有家长提到:"有一些题目真的是有点难度,老师讲的一些方法跟我们所自己理解的方法有出入,这导致指导性的作用暂时(无法发挥),可能发现跟老师讲的不一样,所以我们也就不会太多去干预了。"(C1.3)这种情况说明家长要想有效辅导学生作业,就需要不断学习巩固课内知识,但这对有工作、有个人生活的家长群体来说多有不便。在这种情况下,家长参与的有效性也相对减弱。

访谈中,有位家长吐露的心声让人印象深刻:"(孩子)习惯没养成,学习态度不好。我们家长因为这个也很烦的。每次写作业我们都要跟他发脾气的。如果(孩子)认真(家长心情)就很好,我们有的时候就得连哄带骗,但是有的确实太那个,我们也是会大发脾气的,相信很多家长都是这样的……嗯很烦的。写作业时一直拖拖拉拉不写,你让他去他不去,很烦的。"(C1.5)这位家长在短短 20 秒中,留下了3个"烦"、谈及2次"发脾气"。这种不佳的情感体验令家长难以消化,有些家长在这样的情绪下逐渐产生厌烦心理,不但会对作业参与形成不好的刻板印象,而且使其更想用强硬的手段去干预孩子做作业的过程。

(三)家长对自主学习观的误解导致其参与行为的监控性

在许多家长看来,学习是为孩子自己而学,学习是孩子自己的事情。这些言论是有一定道理的,能够让家长、学生重视学习在个体成长成才中的重要作用。但若以这些话语为依据来削弱家庭教育的重要性、推卸家长在子女教育中的责任,则不妥当。许多家长接受着传统观念,向子女灌输"完全自主学习"的观念,如"作业是他自己的事情"、"做作业是他的本职,是他的分内事"(C2.2,C1.1),这是片面的。有家长在言语上表达"要支持学生自主学习"的观点,可在实践中:(孩子做作业时)时不时地敲敲他的门,透过门缝看看他到底在做什么。有时候他把门还反锁,气的我要命!"(S2.1)这些行为暴露出家长仍有监控欲望和介入行为。

当然也有家长用正确方式培养学生自主学习习惯,比如:"(孩子)他有自己的房间,他自己可以在房间里独立完成作业。我也会让他把作业时间空出来,要求他做作业前把桌面清洁干净,把玩具啊课外书啊这些不必要的东西清理掉。"(C2.4)但实际上,家长仅仅提供物理环境条件上的支持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自主支持,要在主观上充分尊重和信任孩子,减少如过分的监督、苛责、命令等强制的介入行为,让孩子做自己学习的主人,才能真正实现对孩子的自主支持。

六、我国小学家长作业参与的改进

研究数据显示,我国小学家长的作业参与意识强,但参与体验不佳;作业参与频率高、响应及时,但参与方式局限于控制型和介入型。家长在教育过程中的参与体验迄待得到改善,家长的作业参与方式也不应局限于狭窄的检查、批改范围。"双减"政策的推出,正是将传统的、狭义的作业参与方式叫停,减轻家长负担,改善家长作业参与体验。

(一)更新家长观念,确保学生在作业中的主体地位

家长需要理解自主学习的深刻含义,充分尊重学生在作业参与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做好沟通工作。首先,家长需要更新观念。理解自主支持并非单指为孩子提供物理环境条件,还需要帮助学生发挥主观能动性,在作业参与中,承担"指引者"的角色,引导孩子的自主学习行为,塑造孩子主动自主学习意识。如在孩子独立完成作业的过程中减少打扰、不擅自帮孩子规划作业时间或准备作业工具等;减少在作业中的强制介入行为,只需在学生真正有需求时及时响应、在学生遇到瓶颈时加以指点。

其次,家长需要注重沟通。在作业参与前,与孩子进行足够的沟通,充分了解孩子需要何种参与、何种支持,明确孩子的真实诉求;在参与时,应观察孩子学习习惯和成长特性,耐心倾听孩子的反馈,将孩子作业表现中暴露出的问题细致化、精致化,再有针对性地改进作业参与策略,最终实现提升作业质量的目标。这样一来,家长的参与也更加灵活细腻,良好的沟通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与子女产生摩擦和争执,提升了家长的参与体验。

(二)促进家校联动,加强作业参与的沟通和指导

加强子女教育需要学校与家长形成合力、协同发展,帮助家长摆脱孤立无援、无人指导与协助的境地,从而提高家长作业参与的效率。

首先,学校应拓宽家校沟通的渠道。学校要保留传统的家校沟通渠道,如家长委员会、家长学校、家长会、家访、家长开放日、家长接待日等,同时也要创新合作手段,以"高层次双向性"为导向,就家长作业参与问题和学生作业表现与家长加强沟通联系,可以通过搭建家长与教师的课后互动云平台,使得学生在学校和家庭的学习动态都能够被家校共享,并形成双向的家校沟通模式,或通过增设家委会中作业管理委员职责等途径,盘活多种家校沟通渠道,全面整改家校合作工作,使家校沟通话题细致化、实际化。

其次,家长应积极联系教师和学校。家长要放下对学校的防备,解除不信任关系,主动关注家校沟通的渠道,与教师和学校取得联系,针对在作业参与中所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向教师提出家庭作业设计形式和内容的建议和意见,针对学生个性特征及作业表现,与教师—同探讨有效指导学生作业、培育学生习惯能力的技巧和方法。

(三)加大社会关注度,释放家长作业参与的活力

家长在参与学生作业的过程中受到多种必要条件的限制,因此,获得社会各界的帮助与关注尤为 重要。

首先,政府应明确作业参与中各主体的权责边界,加强对各主体的监管。可通过政策指引和制度

设计加以实现,"双减"政策就是政府对学生作业参与进行管理的重要表现,有助于家长从检查、批改作业的桎梏中脱离出来,更有时间和精力关注学生在作业过程中反映出的思维能力和其他表现。

其次,政府应激活社会和社区资源,牵头确立专门的家校合作管理队伍。如我国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工作就是在各级妇联组织、教育行政部门、中小学校等多主体主导下进行的。① 家校合作工作也可以参照这一模式确定统筹家校合作工作的主导部门,并且在各级政府内引入有专业资质的、可以有效开展家校合作指导工作的专家学者及专职人员,建立起一支专业水平过硬的家校合作指导队伍。

最后,政府应调动学校资源,指导开展家长学习培训活动。在一定区域内和学校内组织家长学习 专业文化知识,提高专业素养,加强家校合作知识技能培训,培养家校合作意识,为更好地指导家长 如何参与子女教育储备专业知识和技能。

参考文献:

- [1] Sofia Brock, Alan L. Edmunds. Parental Involvement: Barriers and Opportunities[J]. EAF Journal. 2010. 20(1): 48-59.
- [2] Cooper H, Lindsay JJ, Nye B. Homework in the home; How student, family, and parenting-style differences relate to the homework process [J]. Contemporary Educational Psychology. 2000; 25(4): 464-87.
- [3] Pomerantz E M, Moorman E A, Litwack S D. The How, Whom, and Why of Parents' Involvement in Children's Academic Lives; More Is Not Always Better [J]. Review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2007, 77(3); 373-410.
- [4] Dumont H, Trautwein U, Nagy G, et al. Quality of Parental Homework Involvement: Predictors and Reciprocal Relations with Academic Functioning in the Reading Domain [J]. Journal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2014, 106(1): 144.
- [5] K V Hoover-Dempsey, HM Sandler. Parental involvement in children's education: Why does it make a difference. [J] Teacher College Record. 1995; 97(2); 310-31.
- [6] HM Sandler, K V Hoover-Dempsey. Why Do Parents Become Involved in Their Children's Education? [J] Review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1997: 67(1): 3-42.
- [7] Ivankova N V, Stick S L. Students' persistence in a distributed doctoral program in educational leadership in higher education: A mixed methods study [J]. Research in Higher Education, 2007, 48(1): 93-135.
- [8] Pomerantz E M, Moorman E A, Litwack S D. The How, Whom, and Why of Parents' Involvement in Children's Academic Lives; More Is Not Always Better[J]. Review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2007, 77(3); 373-410.
- [9] 黄小瑞,安桂清. 家长参与类型与儿童学习结果的关系[J]. 学前教育研究, 2018(11): 40-49. DOI: 10. 13861/j. cnki. sece. 2018. 11. 004.
- [10] 高雷. 家长参与、家长自主支持和教师支持对家庭作业努力的影响: 自我决定的视角[D]. 华中师范大学, 2016.
- [11] 李新. 初中生家庭作业与学业成就的关系研究——基于中国教育追踪调查(2014—2015 学年)数据的实证分析[J]. 课程教学研究, 2018(09): 51-55.
- [12] 中共中央、国务院. 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N]. 人民日报, 2004-2-26(1)

(责任编辑 王建平)

① 中共中央、国务院. 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N]. 人民日报, 2004-2-26(1)

现代教育论丛

JOURNAL OF MODERN EDUCATION

No. 2, 2022 General. No. 244

高中生乡村"三同"劳动教育课程的育人价值

姚训琪1 袁颢菁2,3 肖朝云1

(1.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广东广州 510630;

2、3. 华南师范大学旅游管理学院/华南生态文明研究中心, 广东广州 511436)

摘 要:本研究以广东省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开展了30多年的"三同"劳动教育课程为研究对象,采用访谈法对核心教师进行深度访谈,并对21.8万字的学生总结和校友回忆语料库进行词频分析和关键词提取,从教师和学生的视角总结提炼了"三同"劳动教育课程三大领域和十大方面的育人价值,三大领域分别是理想责任、劳动生活和创新审美,十大方面分别是增强理想信念、增强国家认同、增强责任担当、形成劳动观念、形成劳动精神、形成劳动能力、形成劳动习惯与品质、培养问题意识、培养探究能力、培养审美情趣。

关键词: 劳动教育课程; 乡村; 三同; 育人价值; 词频分析

中图分类号: G63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6762(2022)02-0066-09

一、引言

2020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指出,将劳动教育纳入人才培养全过程,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劳动教育模式,以强化学生对劳动精神的理解。同年7月,教育部印发《大中小学劳动教育指导纲要(试行)》,表明劳动教育成为我国中小学校教育研究与实践的重点和热点。尽管政策文章在强化中小学劳动教育,然而,青少年劳动教育弱化是近二十年来我国基础教育中不可忽视的问题[1]。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是广东省内的重点中学,从1990年就提出"让学生到社会中去接受更深刻的教育",组织学生深入农村与农户同吃、同住、同劳动(简称"三同"),进行真正的体验式劳动教育(习惯上称为"学农"),并逐步发展成为一门内容丰富、具有广泛社会影响力的特色课程。

国内有关劳动教育的研究自 2013 年以来出现爆发式增长。2018 年,苗小燕和张冲通过文献计量法对 650 篇主题为"劳动树人"的论文进行量化分析,发现该领域的研究热点主要集中在立德树人、德育课程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方面^[2]。2021 年,苗小燕对 2017 年以来中小学劳动教育的相关研究进行再次梳理,发现新时代劳动教育政策的发展完善推动了劳动教育研究的蓬勃发展,对达成新时代立

收稿日期: 2022-02-25

基金项目:广东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时代新人视域下的劳动教育实践研究"(2020ZQJK072);广东省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 2020 年度研究项目(德育专项):广东中小学"学农教育"的感知价值及影响因素研究(2020JKDY020)

通讯作者: 姚训琪, Email: 465893035@qq. com

德树人的育人目标具有战略意义^[3]。此外,学者们从劳动教育的内涵和时代特点^[4],劳动教育的作用^[5],劳动教育与五育共举结合^[6],劳动教育与具身德育^[7]等方面开展了研究。总体上看,目前劳动教育的研究理论探讨较多,实践探索较少,教育政策研究较多,教育内容研究较少,实证研究更是少之又少。

中小学生的实践能力培养分为"劳动教育""活动课"和"综合实践活动"三个主要阶段^[8]。"三同"劳动教育本质上是一类实践性课程。以"劳动教育"和"课程"为关键词,在 CNKI 中搜索 CSSCI 所收录的文献,共得到 225 篇相关文献。以"中小学"为主题,可得到 34 篇相关文献。以国内外中小学的劳动教育课程实践为研究视角对文献的摘要进行筛选,最终得到 15 篇相关文献。在这 15 篇文献中,理论研究居多,实证研究较少。宁本涛等通过大量样本调查发现,青少年与教师、家长在劳动认知上有一定差异,青少年对劳动教育价值的认识仍需进一步提升,教师、学生、家长均对劳动教育持积极肯定的态度^[9]。吕晓娟等,夏惠贤等,艾兴等则分别从百年及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劳动教育课程的发展历程,基本走向及特征趋势等进行了详细的阐述^[10-12]。段福生等,姜婷等则将中小学劳动教育与职业教育结合,探索普职联动共建的中小学职业体验课程^[13-14]。李群等,李绪明等,田友谊等,朱志勇等,牛瑞雪等主要从劳动教育课程策略方面开展研究^[15-19]。殷世东则从背景、输入、过程和成果四个维度建构了基于 CIPP 课程评价模式的劳动教育课程评价体系^[20],但该文仅给出了思路和理论基础,没有开展实证研究。从比较的视角看,德国中小学劳动教育课程的目标及考评有一定借签意义^[21],俄罗斯及美国的中小学劳动素养提升策略也有一定启发。^[22-23]综上所述,对于如何凝练劳动教育课程的育人价值,现有研究还有较大深入空间。

二、研究方法及数据处理

为准确地评估"三同"劳动教育课程的育人价值,本研究采用了以质性研究为主的研究方法。首先, 研究者对早期(1990年代)及现阶段(2020年代)前后 30 多年设计、策划和实施劳动教育课程的数位"关 键信息提供者"进行访谈,获得教师视角的"三同"劳动教育课程的育人价值。其次,通过 ROST-CM 软 件、结合背对背关键词提取方法、以学生总结及校友回忆语料库为基础材料进行内容分析、考察学生 视角的"三同"劳动教育课程育人价值。具体操作过程为:(1)收集和整理数据。为了降低乡村的发展及 变化对课程效果的影响,故本研究选取了 2016—2021 年的学生总结,以及 1990—2021 年间的校友回忆 为分析数据。同时对相同作者的总结进行剔除,最终获得21.8万字的文字材料并形成语料库,将文本 保存为 txt 格式, 便于后期分析。(2)进行数据处理。首先运用 ROST-CM 软件中的语义网络分析、高频 特征词分析以及情感分析功能进行第一次分词处理。由于 ROST-CM 软件中自带的分词库中包含的词汇 有限,较多的常见词汇缺失,故在整理文本过程中,把经常出现的名词、动词、形容词等进行归纳, 并添加到系统分词库中。然后,将第一次分词结果中出现的无意义或不相关词汇添加到系统过滤词库 中,进行第二次分词处理。对分词结果进行分析发现,有部分词汇词义相近。因此,为了更好地突出 核心词汇,对文本中意思相近词汇进行替换。最后,将修正后的 txt 文本导入 ROST-CM 软件中,对文 本内容依次进行语义网络分析、高频特征词分析以及情感分析。(3)数据分析。以 ROST-CM 所得到的 关键词为基础数据,研究团队采用背对背关键词提取的方法,根据从教师视角得出的育人价值体系具 体指标相对应的关键词进行归类整理,直到两组操作者在同一维度下得出的关键词趋于一致,然后以 此数据为依据对劳动教育课程学生视角的育人价值进行分析。

三、研究结果和分析

(一)教师视角的"三同"劳动教育课程育人价值分析

研究者首先对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20 世纪 90 年代初负责策划及组织学农实践活动的 2 位负责人进行了半结构式访谈,访谈内容围绕当初为什么设计这个课程,这个课程的育人目标是什么,具体内涵是什么,育人价值如何体现。其次,研究者对当下组织课程实施的 3 位负责人进行访谈,访谈内容考察课程的目标体系及其发展变化。最后整理出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三同"劳动教育课程的育人价值体系(如表 1 所示)。

表 1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三同"劳动教育课程育人价值体系

	· · · · · ·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具体内涵
理想责任	增强理想信念	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执行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坚定为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和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而奋斗的信念
	增强国家认同	增进对国情(特别是三农问题)的认识,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增强热爱家乡、热爱国家的情感
	增强责任担当	增强责任意识,激发学习动力,勇于承担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责任;积极参加志愿服务,服务社会、服务农村、服务农民
劳动生活	形成劳动观念	理解劳动是人类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根本力量,认识劳动创造人、劳动创造价值、创造财富、创造美好生活的道理,尊重劳动,尊重普通劳动者,树立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思想观念
	形成劳动精神	领会"幸福是奋斗出来的"内涵与意义,继承中华民族勤俭节约、敬业奉献的优良传统,弘扬开拓创新、砥砺奋进的时代精神
	形成劳动能力	掌握一定的劳动知识和劳动技能,具有动手劳动能力及创造性劳动的能力;在劳动过程中磨练意志品质,提高抗挫折能力
	形成劳动习惯 与品质	能够自觉地参与日常劳动;珍惜劳动成果,养成良好的消费习惯,杜绝浪费;珍惜自己的生活和学习环境,提高自我管理能力;形成诚实守信、吃苦耐劳的品质
创新审美	培养问题意识	具有改进和创新劳动方式、提高劳动效率、解决实际问题的意识,能对个人感兴趣的领域开展广泛的实践探索,提出具有一定新意和深度的问题 能将所学科学文化知识用于农村生产实践或社会调查,综合运用知识分析问题、
	培养探究能力	开展研究、解决问题,建构基于证据的、具有说服力的解释,形成比较规范的研究报告或其他形式的研究成果
	培养审美情趣	感知农村优美的自然与人文风光,形成审美体验;形成劳动创造美的观念,培养热爱自然、热爱生活、热爱祖国、热爱劳动者的美好情感

(二)学生视角的"三同"劳动教育课程育人价值分析

1. 词频、语义网络及情感分析

词频分析是根据系统默认词表以及研究者自定义词表抽取文本中的核心词汇,并对核心词汇的频数进行统计。本研究利用 ROST-CM 提取词频最高的 100 个特征词,其中名词共计 61 个,形容词 15 个,动词 24 个。具体如表 2 所示。

表 2 高频特征词分析

			4X 2 同 9次	IA ITT MI YI AII			
	特征词	频数	词性	序号	特征词	频数	词性
1	我们	1684	名词	51	青年	49	名词
2	学农	501	名词	52	振兴	46	动词
3	生活	341	名词	53	这次	46	名词
4	农村	316	名词	54	淳朴	46	形容词
5	劳动	306	动词	55	生命	44	名词
6	孩子	247	名词	56	田间	44	名词
7	同学	224	名词	57	努力	43	名词
8	农户	208	名词	58	面对	42	动词
9	农民	158	名词	59	国家	41	名词
10	老师	156	名词	60	过去	40	形容词
11	乡村	144	名词	61	成长	39	动词
12	城市	140	名词	62	工作	39	名词
13	时间	129	名词	63	辛苦	39	形容词
14	感受	124	动词	64	环境	39	名词
15	学生	115	名词	65	青春	38	名词
16	实践	113	动词	66	文化	38	名词
17	清远	108	名词	67	汗水	37	名词
18	知道	108	动词	68	中华	37	名词
19	农活	106	名词	69	明白	34	动词
20	社会	105	名词	70	感动	32	形容词
21	朋友	102	名词	71	能力	32	名词
22	支教	99	名词	72	喜悦	32	形容词
23	热情	96	形容词	73	习惯	31	动词
24	教育	95	名词	74	创造	31	动词
25	学习	92	名词	75	困难	31	名词
26	回忆	92	动词	76	真实	30	形容词
27	体验	89	动词	77	珍惜	29	动词
28	问题	88	名词	78	完全	29	形容词
29	中国	85	名词	79	感恩	28	动词
30	稻田	80	名词	80	家庭	27	名词
31	土地	80	名词	81	价值	26	名词
32	自然	77	名词	82	学会	24	动词
33	美好	76	形容词	83	最好	23	形容词
34	人生	71	名词	84	团结	23	动词
35	记忆	69	名词	85	城里	22	名词
36	拉练	68	名词	86	成果	22	名词
37	精神	66	名词	87	责任	22	名词
38	经历	65	动词	88	祖国	21	名词
39	慢慢	65	形容词	89	完成	21	动词
40	收获	65	名词	90	情感	21	名词
41	准备	59	动词	91	意识	20	动词
42	学校	58	名词	92	任务	20	名词
43	体会	58	动词	93	梦想	20	名词
44	可爱	57	形容词	94	改变	20	动词
45	知识	56	名词	95	融入	19	动词
46	晚会	54	名词	96	相信	19	动词
47	过程	52	名词	97	主动	19	形容词
48	力量	52	名词	98	充实	19	形容词
49 50	未来	52	名词	99	热爱	19	形容词
50	身体	51	名词	100	历史	19	名词

语义网络分析是通过抽取文本中的高频特征词,利用共现矩阵形成网络结构图,可以直观地反映不同特征词之间的关联程度。对农村"三同"劳动教育课程总结文本进行语义网络分析,如图 1 语义网络结构图所示: 网络图共包含 28 个特征词。对特征词进行归纳,可分为 4 大类: (1)活动及地点类词汇 8 个,分别是"清远""飞来峡""农村""农户家""晚会""支教""拉练""劳作"; (2)身份类词汇 6 个,分别是: "农户""农民""户主""孩子""老师""同学"; (3)学生感受类词汇 9 个,分别是: "美好""体验""回忆""热情""收获""感受""内心""记忆""问题"; (4)互动类词汇 6 个,分别是: "下来""准备""行李""晚上""劳动""学农"。总的来看,感受评价类词汇和活动及地点类词汇偏多,且多为正面词汇。从核心特征词来看,与"三同"劳动联系较为紧密的特征词有: "学农""农民""农户""收获""支教""感受""记忆""热情""体验"。其中,"农户""农民"是表示是本次劳动最密切相关者的词汇,劳动的内容以及劳动方式都是由学生所住农户家的农户提出,"热情"是学生们对农户的感受,同时可以看出学生与农户家之间的关系是融洽的;"学农""支教""拉练"均为本次劳动教育课程的核心内容;"收获""感受""体验""记忆"是学生们对"三同"劳动教育课程的深切体会和感受,可以看出课程对于学生而言产生了外在和内在的影响,具有一定的教育效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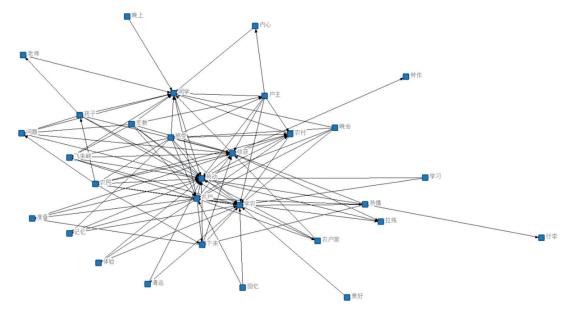


图 1 语义网络分析

为了进一步分析学生对劳动教育的情感状态,运用 ROSR-CM 中的"情感分析"功能对网络文本进行分析,结果见表 3。

情绪分类 -	分析结果		一般		中度		高度	
	数量/条	比例/%	数量/条	比例/%	数量/条	比例/%	数量/条	比例/%
积极情绪:	14	93. 33%	4	26. 57%	3	20. 00%	7	46. 67%
中性情绪:	0	0.00%						
消极情绪	1	6. 67%	0	0.00%	1	6. 67%	0	0.00%

表 3 高频特征词情感分析

说明:积极情绪的分段标准为:一般(0-10),中度(10-20),高度(20以上);消极情绪的分段标准为:一般(-10-0),中度(-20-10);高度(-20以下);中性情绪不做分段。

学生积极情绪比例为 93. 33%,中性情绪比例为 0. 00%,消极情绪比例为 6. 67%。总体来看,学生对"三同"实践课程持积极态度并且满意度较高。

2. 文本关键词与课程育人价值的对应分析

以 ROST-CM 所获得的关键词为基础,结合高频特征词分析与教师视角的育人价值体系,通过背对背方法进行关键词抽取,以分析文本关键词与课程育人价值的对应关系。

第一是理想责任方面,对应增强理想信念的关键词包括"坚定、珍惜、未来、青春、梦想",对应增强国家认同的关键词包括"国家、祖国、家庭、城市、乡村、中华、感恩",对应增强责任担当的关键词包括"责任、人生、社会、真实"。

"中国未来的发展,当然更离不开农村。学农能更好地让我们了解中国农村的现状,将来为我国的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我们在农村社会的接触过程中,明白当代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现状,让我们在社会实践过程中,通过独立生活、独立思考、独立自主的去面对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对社会的认识更加清晰。不管在实践过程中遇到挫折还是成功,对我们都是一种收获,明确了优势同时也发现了不足之处、让我们面对社会更加自信。"

"在交流与学习中,把青春梦想,与祖国之乡村振兴大业紧密联结。奋斗致远是吾辈青年应接住的历史接力棒,我们纵情放歌飞来峡,眼前是稻田千里,心中是诗书抱页——我们可以脚踏黄土辛勤劳动,亦可以怀抱问卷了解民生,规划未来。在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的七天里,我真正体悟了乡村生活,认识了'三农'问题,在与农户建立起友好而和谐的关系时,心中亦萦系着乡村未来。"

"学农十天见过的每个人,经历的每件事,都给我未来的人生道路留下了念想——农户家留守的女人和孩子告诉我,我该为那个外出打工的丈夫和父亲及时领取工资做点事情,所以我们有了'民工惠';我所收割过的那四亩田地,所打过的每一把稻谷告诉我,农村土地应该流转起来,让龙头企业把现代农业引进来,所以我们有了农业龙头企业专项贷款;临走,乡亲们把自己不舍得吃的土鸡蛋、红薯送给我们,这沉甸甸的礼物告诉我,农村有那么多城里供不应求的好食材需要用线上的手段销往全国各地,于是我们有了'善融商务扶贫专区'……我还没有回去,也许是因为我觉得,自己应该为那里做的事情还有许多没有做到。"

学生们长时间生活在学校的象牙塔内,一定程度上缺乏对国家发展现状的了解。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的"三同"劳动教育课程在校园与社会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通过这座桥梁,使学生对乡村和社会发展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学生通过自己的切身实践,直观地看到农村的发展现状,加深了对农村社会现状、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解,增强了对国家的认同感和勇担时代责任紧迫感。同时,"三同"劳动教育课程能够促进学生理想信念的形成,是培养责任担当的重要途径。通过组织丰富多彩的社会实践活动引导高中生深入社会,能使他们在实践的大课堂中了解社会,认识国情,培育自觉为人民服务的责任意识,进一步明确自身所肩负的历史使命,牢固树立国家主人翁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在志愿服务课程中,一方面将学生在学农过程中形成的责任担当、劳动意识转化为具体的行动;另一方面,通过角色互换,学生在实践中进一步加深了对学农成果的理解和认同。以此,让学生志存高远,去思考、去规划自己以后的发展道路,树立为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和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而奋斗的远大志向。

第二是劳动生活方面,对应形成劳动观念的关键词包括"充实、淳朴、朴实、珍贵、珍惜",对应 形成劳动精神的关键词包括"艰苦、困难、意志、体会、汗水",对应形成劳动能力的关键词包括"学 会、掌握、技能、食材、收获、稻田、支教、家务、任务",对应形成劳动习惯与品质的关键词包括 "磨练、意志、习惯、满满、拉练、团队、独立"。

"学农使我们懂得珍惜劳动,珍惜成果,每日三餐,农户都会为我们准备丰盛的饭菜,而我们往往难以全部吃完,有时农户会为每人再盛一些,更多时候会将剩菜收集起来喂养牲畜。不浪费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对劳动的珍惜敬畏。此外,在手忙脚乱地合力完成了一桌饭菜,在复杂的流程和难以掌握的火候中,我们更当明白:劳动不易,故应珍惜。"

"通过体验艰苦的学农生活,在极大地开拓视野的同时,让我们亲身感受到原来每天上学要来回走那么远的路,原来夜幕降临后村里的路乌漆嘛黑的只能待在家里哪也去不了,原来村里唯一一家小卖部买到的带金箔戒指的廉价糖果是那么好吃……"

"通过劳动,青少年可以养成艰苦奋斗、吃苦耐捞的品性,形成朴素节俭、懂得感恩的优秀品质,摈弃好逸恶劳的恶习,培养健康的人格。"

"割禾正确的姿势是左手从右至左搂禾秆,右手持镰刀从左至右、刀口向外割,这样不容易伤到自己,割下来的禾顺手放在地里。"

通过上述关键词提取以及部分访谈资料可以看到,"三同"劳动教育课程让学生发自内心地认同劳动、崇尚劳动、尊重劳动,懂得了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和劳动最美丽的道理。农事活动中,学生走出教室,走进农场,身心得到了放松,也感受到了自然与人类的密切关系。长期生活在城市的学生通过在这短短的与农户同吃同住同劳动的时光中,学到了新的农业知识和技能,在实践过程中切实提高了动手能力。学生在劳动的过程中完成相应的农事任务时体会到真正的价值和意义。在认知过程中,高中生的情感体验以及情绪经验会影响个体的态度和行为,这也是促进劳动价值内化的重要因素。"三同"劳动教育课程提高了学生的情感体验,并且培养了学生的劳动观念,让学生在劳动情境中构建了正确的劳动观。在树立正确劳动观念的过程中,学生会形成良好的劳动习惯和艰苦奋斗的精神,从而让责任担当素养落地生根。劳动教育的本质是把劳动观念、习惯和技能等内化的过程,而内化的最佳方式是走进真实社会劳动的实践体验。因此,可以认为"三同"劳动教育课程的实践体验,既培养了学生基本的劳动技能,又让他们懂得帮助他人,主动担当和奉献社会的意义和价值,将艰苦奋斗精神和吃苦耐劳品质外化于形,内化于心,让学生充分发掘劳动的价值。所以,"三同"劳动教育课程实现了劳动教育优质与高效发展,形成了契合高中生实际和时代特征、多维一体的劳动习惯与态度,促进了学生劳动理念、知识、技能的深度融合,让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形成二维共进,推动了学生身心全面发展和人格健全。

第三是创新审美方面,对应培养问题意识的关键词包括"实践、调查、学习、创新",对应培养探究能力的关键词包括"研究、问题、解决、创造",对应培养审美情趣的关键词包括"乐趣、田间、感受、美好、融入"。

"与此同时,学农实践更让一些有识之士和未来的社会精英走进农村,了解农村,与农民交流心声,听到农民心中所需所想。只有根植于这样的实践中,才能真正看到乡村发展中存在的问题,进而思考其原因和影响,最后给出解决方案,为乡村发展建言献策。"

"或许有的人会认为贫困农村的农民不太懂科学,甚至很迷信。但是,经过这次研究性调查后,我认为这是不真实的。"

"我研究的课题是关于清远飞来峡镇普通话调查,设计并打印了一百份调查问卷,在田间地头,在村民家里,在横岗村、大厂村和富勤第三小学等地积极调研,回收有效问卷近六十份。"

"芦苇荡里,我们奔跑,随着你们的目光;晨光熹微,我们收割,身影定格在你们的相机里。"

"在那段与自然和谐共处简单生活的日子里,我们从原本程序化的生活节奏中跳脱出来,与那个充满诱惑的世界拉开距离,时间的空闲足以让我们慢下来悉心感受身边的一切,去亲身体会农村问题的重要性,去享受劳作带来成果的快乐,去认真思考自我的存在和与世界的联系。"

通过分析得出,区别于单纯的以"苦"启发人、磨练人,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的"三同"劳动教育课程真正做到贴近真实的农村生活,让学生在了解"三农"问题的同时,深入观察农户的生产生活现状并开展社会调查和研究性学习,进而从不同层次认识农村现状。这样的方式很好地运用了真实情景,培养了学生主动发现问题的意识和探究意识。同时,由于学生们长期生活在城市里,容易失去积极、敏感、鲜活的情感表达和感受力,进而失去感受美的动力,也就容易被消费文化和娱乐文化劫持着走向浮华和颓废。"三同"劳动教育课程让学生真正走进自然村,使其身心浸润在美丽的大自然中,触发灵感,激发潜能,舒畅地进入一种奇妙的审美体验状态。劳动教育对学生的审美能力培养有着重要作用,一是因为古今中外人文领域的基本知识和成果都源于生活,是人们在生产劳动中创造的,是为人民大众服务的;二是因为只有源于生活的人文作品才有生命力,才能被人们所接受和喜爱。学生通过参与劳动,形成对劳动人民的情感认同、形成高尚的人文情怀和正确的审美情趣。因此,劳动教育是培养学生浓厚的人文情怀和科学的审美情趣一种重要途径。

四、结论与讨论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的"三同"劳动教育课程有鲜明的社会性和生命性;无论从教师还是学生的视角看,都具有较高的育人价值。其育人价值可统括为三大领域十大方面:三大领域分别是理想责任、劳动生活和创新审美;十大方面分别是增强理想信念、增强国家认同、增强责任担当、形成劳动观念、形成劳动精神、形成劳动能力、形成劳动习惯与品质、培养问题意识、培养探究能力、培养审美情趣。

从课程的角度看,"三同"劳动教育是"活"的课程,是"真"的课程,充满了活力与张力,体现出课程的深刻性和内容的丰富性,不断丰盈着劳动教育课程的创新与进步。这种劳动教育课程优化了学校教育教学体系,关照到了学生的个性发展和全面发展的统一;从学生总结的关键词情感分析来看,学生对该课程的满意度也较高。此外,该课程促进了协同育人格局的形成,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劳动教育在理论与实践层面的丰富与完善,很好地展现了劳动教育课程的育人价值。

参考文献:

- [1] 徐海娇,柳海民. 历史之轨与时代之鉴:我国劳动教育研究的回顾与省思[J]. 教育科学研究,2018(03):36-41+47.
- [2] 苗小燕, 张冲. 大中小学德育一体化研究的热点与发展趋势——基于 CNKI 数据库的 CITESPACE 分析[J]. 中国特殊教育, 2018 (08): 85-90.
- [3] 苗小燕. 新时代中小学劳动教育研究热点及展望[J]. 中国特殊教育, 2021(10): 7-12+6.
- [4] 檀传宝. 劳动教育的概念理解——如何认识劳动教育概念的基本内涵与基本特征[J]. 中国教育学刊, 2019(02): 82-84.
- [5] 褚宏启. 21 世纪劳动教育要有更高立意和站位[J]. 中小学管理, 2019(09): 61.
- [6] 孟万金、姚茹、苗小燕、张冲、新时代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学校课程建设研究[J]、课程・教材・教法、2020、40(12): 40-45.
- [7] 许瑞芳,张宜萱. 具身认知视角下的劳动教育审视:基础、价值与路径[J]. 教育发展研究,2021,41(22):54-61.
- [8] 李宏新. 对新时期我国培养中小学生实践能力问题的回顾[J]. 教育科学, 2005(02): 6-7.
- [9] 宁本涛,孙会平,吴海萍. 我国中小学劳动教育的认知差异及协同对策——基于六省市的实证分析[J]. 教育科学,2020,36(05):11-18.
- [10] 吕晓娟, 李晓漪. 我国劳动教育课程的发展历程、主要成就和实施方略[J]. 课程・教材・教法, 2021, 41(08): 137-143.
- [11] 夏惠贤,杨伊. 我国中小学劳动教育的百年探索、核心议题与基本走向[J].教育发展研究,2020,40(24):13-20.

- [12] 艾兴, 李佳. 新中国中小学劳动教育课程设置: 演变、特征与趋势[J]. 教育科学研究, 2020(01): 18-24.
- [13] 段福生, 张建飞, 左欣. 发挥区域职教资源优势 构建中小学劳动教育课程体系[J]. 中小学管理, 2020(04): 19-21.
- [14] 姜婷,徐昌,张志鹏. 普职联动共建区域中小学职业体验课程[J]. 中小学管理, 2019(03): 46-48.
- [15] 李群,魏雅平,韩玉彬,张庆民. 劳动教育课程的创新性实施策略探索[J]. 中小学管理, 2021(11): 30-33.
- [16] 李绪明. 新时代中小学劳动课程的构建与实施[J]. 课程·教材·教法, 2020, 40(05): 16-21.
- [17] 田友谊,韩雪童. 信息化时代创造性劳动的发生机制及其课程实践[J].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1, 60(06): 164-173.
- [18] 朱志勇. 中小学劳动教育课程体系构建与实施[J]. 课程・教材・教法, 2021, 41(08): 131-136.
- [19] 牛瑞雪. 中小学如何构建劳动教育特色课程体系——落实《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的实践策略[J]. 课程·教材·教法,2020,40(05);11-15.
- [20] 殷世东. 中小学劳动教育课程评价体系的建构与运行——基于 CIPP 课程评价模式[J]. 中国教育学刊, 2021(10): 85-88+98.
- [21] 孙进, 陈囡. 德国中小学的劳动教育课程: 目标・内容・考评[J]. 比较教育研究, 2020, 42(07): 73-81.
- [22] 顾建军, 董秀敏. 俄罗斯 20 年来中小学技术课程改革历程与思考[J]. 比较教育研究, 2016, 38(05): 82-89.
- [23] 翟俊卿, 陈郁郁, 王西敏. 面向劳动素养提升: 美国中小学学校花园教育探析与启示[J]. 比较教育学报, 2022(01): 81-93.

(责任编辑 于小艳)

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举办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项目立项仪式暨学术沙龙

为进一步鼓励我院研究生积极开展具有创新性和前沿性的教育教学研究,加强研究生科研创新意识、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的培养,推动研究生培养质量的不断提高,我院于2022年1月正式设立"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项目",用于资助研究生开展创新课题研究。

3月15日下午,我院在学院225会议室顺利举办2022年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项目立项仪式暨学术沙龙。研究生院安宁副院长、马冬秀老师应邀出席,我院李盛兵院长、葛新斌副院长、卓泽林副教授和线下线上的50余名研究生参加立项仪式和学术沙龙。活动由院研工办王晓隆老师主持。

在立项仪式上, 葛新斌介绍了我院实施设立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项目的背景、目的和筹备过程。他指出, 经过前期评审, 2022 年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项目共立项 41 个课题。其中, 特别委托项目 10 个, 重点项目 10 个、一般项目 21 个。希望这次获得项目立项的同学们把握机会,刻苦钻研,努力提高自身的科研能力和综合素质。

安宁在致辞中对我院的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项目设计和研究生的项目选题,表示高度肯定。她指出,教科院专门设立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项目,在石牌校区各研究生教育单位中,尚属首次。在研究生阶段参加科研项目,是一次很宝贵的锻炼机会。同学们的项目选题得当,主题鲜明,或贴合学院和学科发展需要,或关涉教育教学改革与发展前沿,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她勉励同学们在学习中不仅要了解学术前沿动态、广泛阅读、勤于思考,更要掌握研究方法,学会沟通与合作。

李盛兵对获得本次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项目立项的同学表示祝贺。他强调,做好学术研究,首先要牢固树立 4 个意识:即要有鲜明的问题意识、方法意识、成果意识和时间意识;要注重研究过程,积极体验、潜心研究,培养钻研精神,促进科研能力提升。

随后、与会领导先后为特别委托项目、重点项目、一般项目主持人颁发了立项通知书。

2021 级博士研究生谢辰在代表获批项目主持人发言时表示,学院举办此次项目为研究生科研创造了机会,并表示此次项目可以增加自身的科研实践和提升自身的科研能力,此次人选既是荣誉也是鞭策。

仪式结束后,我院卓泽林副教授围绕"学术历程与发表",结合自己的科研经历,从选题、模仿、交流、方法、热情、如何开展课题等六个方面,向同学们分享了自己的科研技巧和方法。

现代教育论丛

JOURNAL OF MODERN EDUCATION

No. 2, 2022 General. No. 244

保研内卷生态及其非预期后果

——双一流高校大学生保研历程的个案研究

海子奕 程 猛

(北京师范大学 教育学部, 北京, 100875)

摘 要:"内卷"一词被用于描述精英大学普遍存在的过度竞争生态,而保研是观察这一生态的重要窗口。通过对北京市某双一流高校 8 位本科生保研历程的深度访谈发现,保研中的内卷生态具体表现为"抢好分"、拼筹码和竞争性攀比。绩效主义取向的积分式保研规则促成褒奖与贬抑效应,加剧了个体的自我剥削,极易将学生引向精神世界的"空心化",铸造"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和"内卷型"人格,既危及学生身心健康,也给国家长期的人才选拔和培养种下选才单一化、功利化的苦果。超越"内卷"既需要个体觉醒,更依赖高等院校乃至全社会的制度变革与文化重塑。

关键词: 内卷; 保研; 竞争; 内卷型人格; 制度变革

中图分类号: G64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6762(2022)02-0075-12

"在大学里,学生因'内卷'而迷茫,教师因找不到潜心治学的学生苦恼……揭开漂亮的指标、体面的成功,中国最聪明的年轻人在极度竞争中,成功压倒成长,同伴彼此 PK,精疲力竭。"[1]

2020年9月,三联生活周刊一篇名为《绩点为王:中国顶尖高校年轻人的囚徒困境》的文章引发广泛的社会关注。"内卷"一词的使用也从农业经济领域不断向外拓展,直到翻过高墙,跃进象牙塔,成为对精英大学普遍存在的过度竞争生态的一种精准描述。

在高等教育日益大众化、文凭贬值加剧的社会情势下,仅仅跨入大学之门已经难以改变寒门学子的命运,也难以维持中产阶层家庭的社会地位。读研,就成为许多本科生从入学伊始便心向往之的选择。相比普通高等院校,顶尖的精英高校的保研率明显高出一截。与竞争激烈的考研相比,保研①显然是更"稳妥"且循序渐进的一条通道,也成了一种不用解释的、"被质疑最少"的选择^[2]。当保研意指的教育获得可以兑换更多的社会资源时,这种教育机会就会显得愈加稀缺。为了取得推免资格,精英高校的大学生们只能将更多的精力和时间投入到这样一场角逐之中。因此,保研也就成为观察精英大学"内卷"生态的重要窗口。

收稿日期: 2021-08-13

基金项目:北京市教育科学"十四五"规划 2021 年度重点课题"北京市大学生抑郁体验的发生机制及其社会支持研究" (BEAA21031)

① 保研、又称推免、即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

本研究意欲探索的问题有以下两个层面。首先,对于身处精英高校的大学生来说,存在"保研内卷"吗?如果存在,"保研内卷"呈现出哪些特征,又是如何弥散于他们的大学生活之中的?其次,"保研内卷"产生了哪些影响?又该如何应对?通过聚焦"保研内卷",本研究试图深描当代中国精英大学"内卷"生态,进而反思与之相关联的研究生推免制度以及大学生的精神风貌。

一、"内卷"与保研"内卷化"

"内卷"一词最早源自美国人类学家戈登威泽(Alexander Goldenweiser)对原始文化的分析。戈登威泽认为毛利人的装饰艺术呈现一种内卷化的状态,即"在所有边缘被固定的情况下,发展表现为内部的精细化"^[3]。美国文化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在研究印尼水稻种植时拓展性地使用了这个概念。在《农业内卷化——印度尼西亚的生态变化过程》(Agricultural Involution: The Processes of Ecological Change in Indonesia)一书^[4]中,格尔茨用"农业内卷化"描述"无数的劳动力集中在有限的水稻生产"中的农业发展形态。格尔茨和戈登威泽对内卷的理解并没有断定这种在外部边界被严格控制、内部"集中"和"精细化"的过程对收益究竟产生了何种影响。

在对中国人多地少的小农经济史进行分析时,黄宗智一定程度上借鉴了格尔茨的分析框架,用"内卷化"来形容农业生产中"单位劳动投入报酬严重递减"^[5]的现象,将"内卷"的讨论引向了"没有发展的增长"^[6]。在邱泽奇和刘世定看来,这种对"内卷"的理解改变了"分析的基本方向"^[4]。而后,"内卷"在杜赞奇的阐发下,被应用于"国家政权内卷化"的讨论^[7]。

在教育领域,杨可通过对教育市场化背景下母职变迁的分析,发现城市家庭中的母职实践突破了私领域内照料子女的传统内涵,教育职责陡增并且呈现出一种"经纪人化"的新特征,且这种趋势有不断"内卷"的倾向。^[8]黄宗智在最近的文章中也指出,"内卷"的机制"也可以见于以应试为主的教育界。面对快速递增的竞争人数和伴之而来递减的机会,一些学校会'逼迫'学生投入越来越多的'劳动'来应试,为的是提高本校的平均考分以及其质量评估水平,促使本来就缺乏创新性的应试教育体系更加内卷化,基本排除了更多关注创新(而非死记)的教育改革。"^[9]

2020年12月,《咬文嚼字》编辑部发布了"2020年十大流语",其中之一即是"内卷"^[10]。"内卷化"有逐渐被泛化使用的趋势,泛指"任何过度竞争的社会现象"^[11],目前已应用于分析社区治理^[12]、教师职称评定^[13],甚至学术界本身也出现了"学术研究当力避内卷化"^[14]的讨论。徐英瑾认为,"内卷"兼有"内耗"与"席卷一切"的语义,切中"中国中产阶级在面对各种激烈的社会竞争时所感受到的急切的焦虑与深深的无力"^[11]。

综合上述文献,"内卷"在当下的意涵已经发生了转变,从不带明显价值判断的"内部不断精细化和复杂化的过程"(格尔茨的本意)转向"无意义的过度投入和竞争",即黄宗智意义上的"内卷化"——"劳动的边际收益递减"或"没有发展的增长"。本研究主要在后者的意义上使用"内卷"一词。在本研究中,"保研内卷"指在保研(推免)制度框架下,大学生为了在保研资格选拔中胜出,在学业以及各项涉及保研的活动中陷入无意义的过度竞争的现象。

二、研究方法与资料收集过程

为了尽可能深入了解大学生的保研历程,在方法论层面,本研究主要采用了质的研究方法。质的

研究方法是"以研究者本人作为研究工具,在自然情境下采用多种资料收集方法对社会现象进行整体性探究,使用归纳法分析资料和整理形成理论,通过与研究对象互动对其行为和意义建构获得解释性理解的一种活动"[15]。

在资料收集方面,本研究主要采用了深度访谈(depth interview)的方法。深度访谈在学界也被称为 半结构式访谈,"涉及的是一种研究者与被访者面对面情况下的我群关系"^[16]。这种方法的优势在于可 以随时调整问题及回应内容、方式,不断地逼近被访者对自己行动的意义理解,帮助研究者解释性理 解社会行动者的意义世界。

本研究以北京市某双一流建设高校 B 大学^①为个案,综合年级、专业和保研情况等因素,采取理论抽样的方式寻找合适的研究对象。保研主要涉及大学三级和大学四年级的本科生,因此首先选择了 6 位正在经历保研或有意保研的本科生进行了深度访谈。为保证研究对象的差异性,6 位被访者之中,有 2 位已保研成功,4 位因保研困难选择考研。之后,研究者还对已通过推免读研的 2 位研一学生进行了深度访谈。每位访谈对象访谈 1—2 小时。8 位被访者的简介及编码如下:

编码	年级	专业类别	性别	保研情况
F-U-1	大四	人文	女	综合成绩排名差一名,未能保研
F-U-2	大三	社科	女	跨专业保研比较困难,准备考研
S-U-3	大四	社科	女	已保研
S-U-4	大四	人文	女	本校竞争激烈,未通过初审,保研外校
F-U-5	大三	理工	男	保研困难,准备出国
F-U-6	大四	社科	女	保研无望,考研失败,准备"二战"或者工作
S-M-1	研一	社科	女	保研成功,现已在读
S-M-2	研一	社科	女	保研成功,现已在读

表 1 访谈对象简介②

研究过程中,我们对 B 大学各院系公示的保研相关制度文件进行了收集和整理。此外,还和 2 位深度参与研究生招生及培养的教师③就保研学生的特点以及推免制度进行了访谈。通过对访谈转录文本以及相关制度文件的分析,本研究试图呈现身处精英高校的大学生在保研历程中的内心体验以及与制度互动的过程。

三、保研内卷生态的特征

在访谈中,我们发现"内卷"或者"卷"已经成为当前大学生活中一种弥散性的话语实践。被访者在谈到自己目前(或曾经)为保研做出的努力时,常常提到"卷"。诸如"我本科真的很卷"(S-M-1)、"在卷的同学一直在卷,也不是大三才开始卷的"(F-U-1)、"今年卷的格外厉害"(S-U-3)。其他的类似表达还有"他太卷了""这也太卷了""我们学院太卷了""不能这么卷",最"卷"的人还会称之为"卷

① B大学是一所历史悠久的综合性大学,双一流建设高校(A类)。

② 访谈学生的编码方式为:学业阶段+保研结果+序号,其中U指本科生,M指硕士研究生,S指保研成功,F指保研失败。

③ 教师的编码方式为: T+序号, 其中 T 指教师。

王"。"卷"不仅是个人对自己所处环境的一种理解,也反映了一种具有普遍性的精英大学生存样态。

(一)"抢好分"

对于有意通过保研获得深造机会的大学生们来说,了解保研的制度设计至关重要。在 B 大学,各个学院的保研制度均由成绩和成绩之外的加分项构成,只是在构成比例上稍有不同。在 X 学院,保研的综合考核成绩测算由专业课程成绩(90%)、外语成绩(1%)、科研创新成绩(7%)、社会服务成绩(2%)四个部分组成①。由于成绩所占比重较大,唯有尽可能地追逐好的成绩,才能为自己累积保研优势。这样,选课、作业和期末考试就成为学生关注的焦点。尽管本科三年级才开始真正涉及保研的一系列流程,但在大一人学伊始的选课阶段,这场保研大战的号角就已经吹响。

你抢课抢的不是好老师,抢的是好分。(S-U-3)

一个师兄和我说,在选给分高和选好老师之间,你一定要选给分高的课。书可以自己读,分不能自己给。(S-M-1)

言下之意,选"给分高"的老师而非真正自己认可的"好老师"是取得高绩点的秘籍。在这种选课文化之下,给分高的"水课"反而可能成为学生趋之若鹜的焦点,给分严格、认真负责的教师却可能被日益边缘化,造成"劣币驱逐良币"的局面。在选课之外,作业是另一个"卷"的焦点。为了取得好的平时成绩,作业常常成为一场字数的"军备竞赛"。

大二的时候老师让写个读书报告,要求 5000 字以上……大家都写了 8000, 你就不好意思写 5000……然后我们都写了个七八千。(S-U-5)

期末考试成绩在一门课程的总成绩中占比常常超过50%,直接影响成绩单上的数字,是最后的决战环节。

你看我本科成绩单上真的最高 100, 98、99, 就这样往下排, 那时候真的在卡着, 每次出成绩就特别紧张, 卡着你要算加权, 哪些是专必(专业必修课), 哪些是专选(专业选修课), 哪些成绩是绝对得高的, 哪些成绩要比平均分高多少, 你才能稳打稳地拿到保研名额。(S-M-1)

在积分制的保研制度下,学生们要求自己在每一门的选课上都需要谋篇布局、精打细算,在成绩上精益求精,追求最高的分数,造就了一个"不断抽打自己的陀螺式的死循环"^[17]。一旦获得高绩点取代了对知识的真正渴求,成了唯一目的,真正的大学精神也就难以觅见。

(二)拼筹码

成绩之外的加分虽然所占比例较小,却不容忽视,因为其在保研中意味着更多的筹码。科研项目、社会实践虽然占比不是很大,但却是不能掉以轻心的"加分项"。即便成绩很好,也可能因为缺乏科研和社会活动加分而落于人后。不放过任何可能加分的机会,尽一切可能把助益于保研的加分项收入囊中,方可确保胜算。一些学业成绩较为落后的学生更需要在这一部分下足功夫,来弥补自己在成绩方面的劣势。

大学没有假期,平常我就不说了,周五周六周日跟平时没区别的。假期是有,但是为了分数,你得去参加暑期社会实践,你得去寒假调研,你得去社会服务,就很多啊。(S-U-3)

我们有10分的额外分。所以当时参加什么数学建模大赛,什么英语竞赛,什么六级刷分,然

① 专业课程成绩指在本校修学并取得学分的部分通识课程、学科基础课及专业模块课程(必修)成绩,成绩优劣直接体现为绩点的高低;外语成绩和四六级、托福、雅思等成绩挂钩;科研创新主要包括各类创新创业项目、学术论文或专利、学科竞赛获奖等;社会服务则包括以上之外的其他获奖、社会工作和社会实践三项。

后包括去做课题。(S-M-1)

为了获得保研资格,及早"拼"一个更加稳妥的未来,大学生们不得不早做准备,精打细算,从成绩到社会活动,连带学生工作、暑期支教、志愿服务,能要的都要,一个都不能少,"习惯追逐"却"缺乏勇气和自由来创造自己的道路"[18]。

(三)竞争性攀比

由于保研名额是既定的,班级同学之间、宿舍同学之间也存在竞争关系。象牙塔里的日常交往也时而蒙上一层敏感的底色。平时的课堂笔记分享、保研的方向等方面都会影响宿舍关系。彼此之间的交往在紧张的竞争氛围下变得小心翼翼,分数、成绩、发表、获奖都成了敏感信息。

大家在涉及到学习的时候就是很敏感。(笔记)肯定是不会分享的,你如果贸然的说你这学期的笔记可以给我看一下吗? 无异于要杀他要抢劫……选方向那几天也挺敏感的,就是问一问你想选什么方向,然后发现大家都不一样,那就放心了。要不然的话,其实两个人都选一个方向,其实挺麻烦的。(S-U-4)

很多人都是觉得他做了我为什么不能做。他怎么就做了,我也要做。真的就是比,从小到大 啥不比,没有尽头的。(S-U-3)

在看似同质的"内卷"过程中,实质有不同的卷入机制,一种是主动型的,一种是被动型的。主动型的学生直接瞄准各项指标进行规划,认为成绩越高越好,同时尽力拿到所有的荣誉和加分,被戏称为"内卷先锋"。被动型学生容易受到同学的影响,在相当程度上"被卷入",唯恐落于人后,暗含着某种从众和攀比心理。在群体层面展现出的"内卷"特征,以其独特的存在样态促成了一种有意识或无意识的焦虑情绪和竞争性攀比。这种生存心态会渗入学校生活的方方面面,影响个体的学习动机和人际交往心态。

四、保研内卷的生成机制

保研内卷生态的形成既有宏观的结构性因素,又受到微观运作机制的影响。"卷"还是"不卷",看似是个人自主的选择,实质上与行动者的现实处境高度相关。理解"保研内卷"何以生成需要看见象牙塔之外更广阔的社会图景。

(一)寻求确定性和安全感

随着高等教育从大众化迈进普及化,读研成为提高"身价"和增加未来职场竞争筹码的优先选择。根据《人民日报》报道的深圳中学公布 2019 年拟招聘的 35 名教师名单显示,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的毕业生就有 20 人,还有 1 人毕业于哈佛大学,且 35 人均是研究生学历,其中 8 人是博士(3 名博士后)^[19]。在社会对学历的要求水涨船高的局面之下,2020 年初新冠疫情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又造成出国读研人数锐减,国内读研成为本科生优先考虑的出路。2021 年,全国研究生报考人数为 377 万,再创历史新高;相比 2017 年,考研人数增加了 176 万。5 年间,考研报名人数翻了近一番。^[20]相比于保研,考研的不确定性更高,而且远不如保研显得"体面"。

一位清华大学教师坦言:"在精英大学中,学生们会认为考研是一件特别可耻的事情,都会选择推免保研,或者直接出国。若是哪个学生考研,其他学生会向他投来异样的眼光,他本人也会觉得尴尬。为了避免这份尴尬,学生们从一进大学开始就会不断为了达到'不考研'的目标努力,完成学业内外的

量化标准。"[21]考研只是一个无奈的选择。在访谈中,不少被访者袒露了自己对于考研的恐惧。

不想再浪费时间去考研,所以他们从一开始准备着保研的这种事情。(F-U-1)

越来越多人不喜欢考研,因为它就像高考一样,不确定性太高了。大家好像对确定性格外的在意……而不是说把自己的命运都寄托在那一场考试……你真能考上吗?我觉得真的挺难的,我看我室友都看累了。(S-U-3)

在考研的竞争程度剧增的形势下,对于不愿意再参加一次"高考"的大学生而言,需要长期投入的保研是一个更加具有确定性和安全感的选择。这样,许多有意读研的大学生都会选择以精打细算的方式度过自己的大学生活,尽可能多地积累筹码,为获得保研资格殚精竭虑。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步步为营、谨小慎微,看似"安全"却也不免让人缩手缩脚,不敢尝试,拒斥意外、风险和不确定性。这就从根本上偏离了创新的应有之义,也压缩了学生探索自我和创造性发展的空间。

(二)褒奖与贬抑效应

在每一个社会组织中,都存在具体的道德边界以及相应的褒奖和贬抑效应。积分式的保研制度促成了带有奖惩性质的地方性道德系统,具有"奖励顺从和击退攻击的能力"[²²]。制度褒奖的,就会被视为道德的、可理解的。反之,不符合制度的行动就经常处于被审视和打量之中,成为需要行动者给予解释甚至被贬抑的。作为一种学术选拔制度,保研规则构成了大学生生活中具有导向性质的行动纲领,它明确地对符合制度规范的行动进行褒奖,对与之相悖的行动进行潜在贬抑。在积分制的保研制度下,大学生们不得不按照量化的筛选标准来打磨自己,功利化地对待学业,甚至违心地承担自己并不喜欢的学生工作、社团活动和一些能够加分的竞赛。

我社恐,并不是一个喜欢做学生工作的人,其实自由而散漫。但综测的难题就是横在我面前,是选择功利还是选择从心……因为这些年我每年的综测几乎都是因为零分的学生工作从一等落入二等,这也可能和未来的保研挂钩。但是它真的重要吗——如果我不能从中得到快乐,而仅仅是负担。(F-U-2)

在被动卷入的情况下,大学生们不仅容易违背自己的兴趣和本心,而且不断陷入"无意义感"的自 我质疑之中。尽管他们可能从中获益,获得制度"褒奖",取得保研资格。但这种"褒奖"背后隐藏着代价。兴趣和热情是学术创新的基本要素,追逐表面化的、功利化的短期利益,可能会严重透支学生长期的学术发展潜力;整个大学的学习、教学与科研风气也会愈加远离大学精神的真正意涵。

而那些不愿意卷入其中的人,那些出于兴趣和本心学习和参与学校活动的大学生,就会被制度"贬抑",无缘通过保研获得继续学术深造的资格。

很多人其实一上大学就跟师姐他们要那种加分的表,然后一项一项去对着做,把分加满,你说这样有啥办法?我室友都反思自己,就说自己的"失败",从大一就是注定的,因为开始的时候就有很多同学跟师兄师姐的关系很好,然后在选课上面他们就选给分高,而不是自己感兴趣的老师的课,他们就只做能加分的项目。(F-U-2)

在保研过程中,学生的内心经常处于矛盾之中,在功利化的选择和自己真正的追求之间犹疑徘徊。 在这样一种规则明确的制度情境中,个体即便有所反思,也很容易陷入螳臂当车的无可奈何和自我怀 疑之中。

(三)看不见的绳索

经济市场中的"信号"是参与者制定计划、做出行动的重要依据。斯彭斯(Michael Spence)在《市场

信号传递:雇佣过程中的信息传递及相关筛选过程》中提出了信号传递模型(Signaling Model)。他指出:"求职者通过改变自己的某些可以观察到的特征,他能够影响并确实影响了他呈现给雇主的这份彩票。假设这些调整是理性决策的产品,则我们可称这些调整活动为信号传递,称这些特征本身为信号"。[23]7-8虽然教育不是市场性的,保研也不是一个市场竞争的过程,但是斯彭斯认为,"招生市场信号传递博弈的逻辑结构与就业市场信号传递博弈的逻辑结构没有本质区别"[23]62。

如果我们将信号传递模型应用于对保研历程的分析,可以将大学生每一项为获得保研资格做出的努力视为学生向"保研市场"传递的"信号"。从学生发出信号,到接收者接收信息,继而进行选择和行动的整个流程,就构成了一个多主体的信号传递博弈。学生作为信号的发送者,在不清楚保研资格获得底线的情况下,努力的目标就成为一条看不见、只能根据历史经验和其他人的努力程度来揣测的"线"。这样,保研就具有了"市场化"特征,"保研资格"就成为可以部分观察、却具有不确定性、也可以发生改变的"信号"[23]8。S-U-3 在访谈中坦言,(有的人)从大一上学期就开始考虑保研的事情,算每一项能加多少分。但这种投入经常伴随着无意义感和无限度的焦虑。

比如说数学建模大赛,当时用了4天3夜,之后那一晚上还热通宵了。一点一点学什么 matlab,就是自己从图书馆拿着这么厚一摞书就开始搞编程,然后做建模,熬了那几天之后拿了三等奖,然后加了2.5分。对于这2.5分来说这四天确实有意义的,很有意义,拿到那个2.5分就是综测直接就上去了,但是对于我来说没有意义。我当时干了啥做了什么题,怎么写的,卷子怎么交的我都不知道。(S-M-1)

"保研内卷"与学生对保研市场上其他人竞争力的判断有着直接的关系。当觉察到竞争人数增多,资格线必然水涨船高,唯有通过投入更多时间来增加自己手中的筹码。为了越过看不见的"线",竞争者唯有投入更多才可能获得优势。不确定的资格线和日趋激烈的竞争使得有意保研的大学生之间形成了一种博弈关系,唯有不间断地进行自我压榨,才能获得更好的成绩和更多的筹码,才能成为最终的优胜者。

五、"内卷"生态的三重后果

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默顿(Robert K. Merton)在《目的性社会行动的非预期结果》一文中提出了"非预期后果"(Unanticipated Consequences)这个概念。默顿使用这个概念是针对"人们(包含行动者本身)无法正确判断行动的目的"的问题,与他所提的相对于显性功能的"隐性功能"高度相关^[24]。保研资格的有限性决定了必定会产生竞争,从入学就开始的精细化积分规则也看起来公平公正。但这一看似公平公正的积分制度,一旦叠加外部社会情势的转变,就会从根本上加剧竞争过度的态势,并给个体、社会和国家带来一系列非预期后果。

(一)反噬自身的代价

尽管被访者在不同程度上表达了对保研过程中的"卷"持厌恶和批判态度,但更多的人选择沉默——要么游离在这套制度边缘;要么从容就范,顺服于既定的保研积分规则。对保研制度的默认和参与,在无形之中为这一制度赋予了潜在的合理性。

你有的时候不得不去做一些你不想做的事情,如果你不这么做的话,你可能没有办法去获得上升的途径,因为是真的很想读研。(F-U-2)

我真是觉得 2017 年到现在, 跑得挺累的, 一直没有休息过。(F-U-1)

在高强度的竞争氛围下,个体很难超脱弥散性的沉重压力,不少学生因此陷入精神焦虑的身心状态。积分式的保研制度造就了不健康的竞争方式和学术倾向,保研大战成为人人参与的平庸之恶,甚至可能反噬自身。

我状态不好那一阵,就保研这个词都快让我 PTSD 了。我前两年心理有问题……我觉得可能所有人很多时候都会面临这种抑郁情绪的困扰,但是环境的作用是看这个环境是让你维持抑郁情绪,还是能让你很快地走出抑郁情绪,那么可能这个社会环境是比较容易让人维持抑郁情绪的。(F-U-5)

根据中国青年报社、中青校媒联合丁香医生共同发布的《2020 中国大学生健康调查报告》显示:随着年级的升高,大学生们对自己的健康评价逐渐降低。大一到大三,年级越高,受健康困扰比例就越高。大四学生中,情绪困扰占比最高。在大学生心理困扰这一项目中,有60%的学生都表示最近一年被学业压力所困扰,学业是最主要的压力来源。[25]在对自我进行压制的过程中,学生很容易迷失自我,"主动"放弃很多对生活、对学业、对未知世界进行探索的勇气和可能性。

如果遵从本性的话,我可能就想大学 4 年踏实地学好我的专业课,然后把我感兴趣的东西都好好地学一学,然后用很多时间去看电影跟看书。但是这个环境就只能让我非常的疲惫,本来我应该又舒适、又充实的过大学 4 年,但是这个制度就让我非常的难受。(F-U-2)

过分量化的绩效主义指标最终"不可避免地导致非理性或者不合理现象的产生"^[26],学生在这样一套制度中被迫同时成为了受害者和加害者。"卷"人其中的大学生和真正热爱学术的大学生相比,整个参与过程多了一份"不得不如此"的疲惫和无奈,对其中的诸多付出也伴随着精力和情感的无反馈消耗,进而衍生为紧张的人际关系和过度的精神压力,危及大学生的身心健康和长远发展。

(二)急功近利的迎合式筛选

在整个保研过程中,不同学生对这一套绩效主义的积分制度有着不同的心态,这其中也有一个复杂的转变历程。大学生与保研制度互动的过程,本身也是一个社会化过程。顺从制度的学生更有可能得到推免资格,异见者或者在抱怨中消磨自己并错过这套体系提供的机会,或者向现实妥协投入这套体系的怀抱,进而融入到制度所褒奖的规则之中。

我有一段时间一直在跟这个制度特别的过不去,我就觉得我要跟他斗争……后来觉得其实挺没有意思的,你斗争也斗争不过,然后觉得在加分表里,我要是有愿意做的事情,那我就做着,不愿意拉倒,算了。(F-U-2)

它有时候是因为这个制度去把学生的真心给磨灭掉,这一点我觉得很不好。(S-U-3)

制度具有教育功能,也对学生进行着教化。当保研成为一场漫长的"军备竞赛",学生们耳濡目染于功利化的成功套路,"掌握规则的学生可以依赖外在评价体系,在短时间里将能力进行包装,符合细则规定,获得加分项,取得高成绩"[^{27]}。

这个制度其实包容性很弱,只要他那种模式化的,你把他做出来都是一样的人。我为什么现在特别讨厌看什么十佳大学生评选,你看他们的简历,那不都是一样的工业产品吗?(F-U-2)

到最后其实老师也理解学生,但是没有办法,这个就不是他们制定的,然后大家就越学越累,越学越累,最后大家只能互相放水,就老师睁一只眼给你考试,考简单点,你就死记硬背就好了。我们下次选课大家还都选你,然后就形成了这种默认的潜规则。(F-U-2)

急功近利的迎合式筛选会对创造性和自主意识产生压制,进而可能筛选不出真正具有学术创新能力的人。而被选中的个体在一天天的被动和服从中可能会日益失去自己的主体性,丧失那个活泼、生动、富有创造性的自我,最终背离学术选拔和高等教育培养的初衷。正如黄宗智指出的,与"内卷化"真正对立的是"创新",需要"更多采纳培养创新人才的教育制度,创建具有中国主体性的研究和学术"^[9]。一项对某研究型大学保研制度的研究证实,该校接近 40%学生的毕业去向为本校保研,但在保研的学生中仅 15%出于学术兴趣而深造。^[28]积分式的保研制度可能会导致劣币驱逐良币,培养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①,也给社会、国家长期的人才选拔和培养种下选才单一化、功利化的苦果。

(三)内卷型文化与人格

作为对生活现实处境的表达,"内卷"相关的话语和行动源于个体对所处制度情境的自然回应,在一定程度上是自我导向的结果。S-M-2 在刚上大学时并没有很强的竞争心态,直到大三才发生转变。

大一的时候,因为我高数还好,但是计算机那种偏理科一点的成绩好像都不是特别好看。然后我记得当时有一门必修课80多分,当时没有跟别人比的概念,也不想跟别人比。直到后来突然不知道什么时候,发现我身边的人这门课全都是90多分,然后就开始想,天,这是要算到保研里面的课,我完蛋了,我别的要补多少分回来,才能赶得过别人。其实当时也没有说刻意把成绩搞进去。对保研这种东西是到大三的时候才有改变了,但是大三已经快来不及了。(S-M-2)

高密度的时间管理和高强度的自我剥削是获得好成绩和各项加分的不二法门,知识和学术探索本身的魅力常常被忽略,唯有在保研大军中脱颖而出才是"成功"。这是一场规则明晰的漫长竞赛,大学也不再是一个拥有闲暇、可以自由探索的象牙塔。整个学校生活环境都会这种紧张的气息渗入,"卷"经常成为一种不得已的选择。

我觉得大学和高中最大的区别是,很多人都是不愿意浪费时间,我记得我高中经常会花半个小时去发呆,但是大学好像就不会。因为高中只有那一件事情,大学真的是做不完。你今天学习完了,社团要开会了,学生会要布置工作了,那个什么你要准备入党材料了,你要笔试了,你要面试了,你要参加这个那个讲座,上个培训班了,你要去跑报销了。(S-U-3)

在那个时候我宿舍楼道就可以说是一个"阴间",是因为外面全都在聊学习成绩、竞争这一类的话题,压力特别大。整个都不像一个大学的宿舍,全都是这一类的话题,躺在那听着进耳朵就感觉自己好像又少干了什么,被别人超过去了。(F-U-5)

被动卷入过程也是一个社会化过程。长此以往,身处其中的人很容易被动地陷入压抑的竞争性氛围之中,共同参与和塑造这样一种以"卷"为核心的生活和学习方式。当非理性的自我剥削和无止境的时间投入成为一种习惯和"应当",一种特定的性情倾向与人格类型也渐渐浮出水面。他们很容易成为"停不下来的人",不仅与他人竞争,也不断与自己较劲。

越来越在乎那 0. 1、0. 2(的加分),没办法快乐啊,就是竞争在这,你说是拥有一个研究生重要,还是说快不快乐的重要?在你有一定物质基础的前提下才能谈快乐呀……自己也卷自己啊,自己不停地逼自己,突破了叫进步,突破不了就叫抑郁了。(S-U-3)

① "精致的利己主义"的说法来自北大中文系钱理群教授的一段话:"我们的一些大学,包括北京大学,正在培养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高智商、世俗、老到、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这种人一旦掌握权力,比一般的贪官污吏危害更大。"参见:钱理群.大学里绝对精致的利己主义者[EB/OL].[2015-05-20].http://edu.qq.com/a/20150520/041737.htm.

对成功的渴望和对失败的恐惧的双重交叠让大学生深陷这样一种紧张状态中,无法挣脱。他们一直被不成功的风险套上枷锁。哪怕是短暂的失败,都会影响到他们对自身价值的认定。^[19]就像一位大四学生在谈到自己保研夏令营申请被拒绝时的绝望心境:

我就不知道后面两年意义在哪里,反正我就觉得我输了,反正在那场竞争里面我就输得干干净净。我觉得所有人都是只看你最终的结果,没有人会因为你自己犯的错误而体谅。(S-U-3)

教师 T-1 也指出,保研"最终渗透的还是精致个人主义的,精致的利己主义的思想"。看似公平公正的保研制度,却可能将学生引向"空心病"①,越来越找不到自我,铸造一种"内卷型人格",危及学生身心健康和长远发展。"内卷"可以被视为一种个体陷入高度竞争和极度自我增压的动力机制,也形成了一种被内化的感觉结构,反映了象牙塔乃至整个当代社会生活正陷入一场功利化的危机之中。

六、超越保研内卷: 反思与突围

经济学领域有一个著名的论及"指标体系异化"的坎贝尔定律(Campbell's law),即任何定量社会指标,在社会决策中使用得越频繁,就越有可能暴露在腐化的压力之下,越容易被扭曲,越有可能败坏希望用它来监视的社会进程。^[29]保研制度用一套客观化、理性化的标准来框定"标准"的大学生活,不仅限制了大学生们的创造性,也束缚了他们对于可能的大学生活的想象。但事实上,一旦学习的过程缺失意义感,无限度投入所伴随的自我消耗让许多大学生不仅产生了"卷"的无奈和自省,也会不断去反思"卷入其中"所要付出的代价。"卷"还是"不卷",如何"卷",如何才可能"不卷"就成为个人行动和选择必须直面的难题。

有被访者认为只要自己想读研,"内卷"是无可逃避的。S-M-1 在访谈中说:"我觉得没有人能摆脱"卷",没有一个人可能会跟你特别坦荡地说自己没有'卷',我觉得大家无非是从一个'卷'跳到另一个'卷'。"也有被访者开始反思这样一种极度竞争背后的逻辑,以及自己可以做出怎样的选择。精英高校的大学生在茫然中有反思和无奈,也有独特的行动和认知的转变。

我们好像太注重量化的机制了,学生工作也好,志愿服务也好。学习成绩也好,一切都是分数至上,也没有什么质性的评价,一个纯粹量化的体系,就习惯于去排名,包括就像一些服务社团当中习惯性去评一些优秀。但荣誉是有限的,蛋糕是有限的,想要的人又太多……我们渴望把大学营造成一个民主的竞争环境,但是我们的学生其实没有民主的能力,只有竞争意识,没有意识去利用自己的权利选择,既然这条路上要有,我就全摘了。(S-U-3)

在 F-U-2 所在的学院, 推免制度规定只有担任校内八大社团相应职务才可以加分, 其他社团都不可以。在访谈中, F-U-2 已经开始反思保研内卷的制度框架, 尤其是对不同类型社团加分的限定:

如果一开始给出这么一份榜单,从大一选择可以加分的社团,让内卷卷得更加激烈一些,人人逼迫人人,为什么要考虑内心,快乐这些事情。社团最初的目的是什么?如果皆是此功利的目

① "空心病"是前北京大学副教授徐凯文老师在第九届新东方家庭教育高峰论坛主题演讲《时代空心病与焦虑经济学》中提出的。徐凯文老师认为,"空心病"是指进入名牌大学的孩子内心却没有积极的价值观做支撑,他们没有理想和信仰,不知道自己是谁,不知道生命有什么意义和价值,没有办法完成自我认同,甚至自我厌恶到抑郁自杀的程度,这就是"空心病"。参见:徐凯文."房间里的大象"——直面青少年抑郁问题[J].中华家教,2021(12):66-69.

的,那些冷门社团的未来出路、生存境地又何在呢?那些真正喜欢这些社团的同学会不会望而却步呢?一方面说是关注学生的心理健康,一方面用狭隘的思路为学生设置重重屏障,让他们走"正确"的路,真的不矛盾吗?

在高强度的自我剥削、无止境的时间投入以及同辈群体的竞争压力下,许多学生感觉到很难认真思考自己真正的需要和追求,"只是被动地去做那些周围所有人都认为理所当然的事"^[18],被所处环境中的焦虑情绪裹挟。F-U-2 在班级的三好学生评比中决心不再提及自己的成绩,而是结合自己的经历做了一次别出心裁的演讲:

在这样一个评选三好学生的场合和大家分享这些非常私人化的感受,是想与大家分享一种接纳和面对自己的勇气。至于什么是三好,什么是优秀,每个人的理解可能都不同,但我想,有一种优秀,源于探索和坚持自我的勇气。每当在我失落想要放弃自己的坚持时,我都会去看我最喜欢的动漫,陪伴了我十五年的《数码宝贝》,那些孩子徽章的意义、勇气、友情、爱心、诚实、纯真、知识、希望和光明,正是让他们闪闪发光不同于他人的魅力之处。长大后我才明白,为什么总是勇气徽章最先发光,希望徽章最后发光,因为人生即是如此,万事之开端就差一股勇气,有勇气就有希望之光,就如同我今天勇敢地站在这里与你分享这些感受和经历。最后,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不拘泥于既定的壳子,重新发现和拥抱真实的自我,温柔而坚定的面对这个世界,创造属于自己的独特人生。

这里的演讲并没有谈及成绩、绩点抑或各种荣誉,而是谈及勇气、诚实和坚定。保研内卷反映的是充满不确定性的宏观社会背景下精英高校大学生普遍的焦虑感和不安全感。其背后的动力机制是一个强调绩效主义而非多元、包容、鼓励人创造性发展的制度情境。用绩效主义的积分制来拣选"出乎其类,拔乎其萃"的学生存在巨大隐患^[30]。依照一种流水线式的人才模板来引导学生,让他们去过"标准"的大学生活,在极度竞争和自我剥削中"卷"走自我和创造性,这已经与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初心南辕北辙。最终,无论是个体,还是社会和整个国家都会在这个过程中受损,也就真正导向了黄宗智意义上的"内卷化"——"没有发展的增长"。

保研制度的制定者希望通过各种指标来精细地量化学生的学术能力,探测其发展潜力,创造了看似公平的起跑线和向所有人敞开的制度环境。但在这种制度环境之中,唯有顺应精细化的积分制度的学生才可以通过保研获得继续深造的机会。真正有热情、有潜力且适合做研究的人,却可能被排斥在这样一套"明码标价"的竞争规则之外。绩效主义的量化积分规则框定了学术能力的意涵,"把教育的价值用短期的回报率或实用性的狭隘目光来衡量"[18]。就像有研究者指出的,催生当下社会所面临的种种过度竞争现象的根源在于:评价者对于竞争参与者的品质的数字化表征的重视,已经压倒了对于这些品质的质性规定的重视,由此导致了"量"与"质"之间关系的全面颠倒。[11]

在保研竞争愈加激烈的当下,如何有效避免保研过程中无意义的内卷化,真正选拔出有学术热情和创新潜力的本科生,促进大学回归健康的学习生态?本研究仅仅基于个案对精英高校的保研生态做了一些探索性的描述、分析和回应,不同层次和类型高校的保研生态可能是有差异性的。"教育制度是最重要的教育资源"^[31],在"破五唯"的背景下,需要摒弃量化的积分思路,摆脱单一的人才选拔和评价机制,探索既公平公正、又"不拘一格降人才"的保研制度。从"内卷"中突围既需要个体觉醒,也最终依赖高等院校乃至全社会的制度变革与文化重塑。

参考文献:

- [1] 徐菁菁. 绩点为王: 中国顶尖高校年轻人的囚徒困境[EB/OL]. [2020-09-19]. https://mp. weixin. qq. com/s/ilNVG-fabWHU34De5NPGSA.
- [2] 蒋方舟, 严飞. "内卷"到底在卷什么[EB/OL]. [2021-02-24]. https://mp. weixin. qq. com/s/UYg9lx-qd3-D7H65HbQ_ aw.
- [3] 刘世定, 邱泽奇. "内卷化"概念辨析[J]. 社会学研究, 2004(5): 96-110.
- [4] Clifford Geertz. Agricultural Involution [M].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6: 1-103.
- [5] 黄宗智. 小农经济理论与"内卷化"及"去内卷化"[J]. 开放时代, 2020(04): 126-139.
- [6] 黄宗智. 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0: 427.
- [7] 杜赞奇. 文化、权力与国家: 1900-1942 年的华北农村[M]. 王福明译.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4: 66-68.
- [8] 杨可. 母职的经纪人化——教育市场化背景下的母职变迁[J]. 妇女研究论丛, 2018(02): 79-90.
- [9] 黄宗智. 再论内卷化、兼论去内卷化[J]. 开放时代, 2021(01): 157-169.
- [10]《咬文嚼字》编辑部. "2020 十大流行语" [EB/OL]. [2020-12-04]. https://mp. weixin. qq. com/s/Qyq2vOi0oXOtquWq0UfjZw.
- [11] 徐英瑾. 数字拜物教: "内卷化"的本质[J]. 探索与争鸣, 2021(03): 65.
- [12] 韩志明. 小心翼翼的行动者: 社区治理的内卷化叙事——以S市Y区"睦邻门"案例为例[J]. 中国行政管理, 2020(12): 69-75.
- [13] 徐清秀. 目标替代、惯习区隔与教师职称评定的内卷化——基于 T 乡镇中学的考察[J]. 北京社会科学, 2021(4): 116-128.
- [14] 编辑部. 学术研究当力避内卷化[J]. 社会科学, 2021(2): 2.
- [15] 陈向明. 质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M].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0: 12.
- [16] 杨善华, 孙飞宇. 作为意义探究的深度访谈[J]. 社会学研究, 2005(5): 53-66+244.
- [17] 芊霓(来自豆瓣). 人类学家项飙谈内卷: 一种不允许失败和退出的竞争[EB/OL]. [2020-10-22]. https://www.douban.com/note/781577426/.
- [18] [美] 威廉·德雷谢维奇. 优秀的绵羊[M]. 林杰, 译. 北京: 九州出版社, 2016: 14-21.
- [19] 南方都市报. 20 位新教师 19 位是清北硕博,深圳一中学火了,简历全曝光 [EB/OL]. https://mp. weixin. qq. com/s/iRz3ao-qxWwlmOPbj-Jrag.
- [20] 彭怡. 2021 考研风向标[N]. 光明日报, 2020-12-26(11).
- [21] 张笑晨, 严飞. 社会结构让人不得不"内卷化"[EB/OL]. [2020-12-02]. https://www. huxiu. com/article/397631. html.
- [22] 玛丽·道格拉斯.洁净与危险——对污染和禁忌观念的分析[M]. 商务印书馆, 2018: 124+147.
- [23] 迈克尔·斯彭斯. 市场信号传递: 雇佣过程中的信息传递及相关筛选过程[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9: 7-8+62.
- [24] Robert K. Merton. The Unanticipated Consequences of Purposive Social Action [J].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36, 1(6): 894-904.
- [25] 中国青年报. 中国大学生健康状况究竟如何? [EB/OL]. [2020-01-07]. https://mp. weixin. qq. com/s/lt1q70CyApM7FCWdPjLcTg.
- [26] 杨善华, 谢立中. 西方社会学理论[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8: 191.
- [27] 吕雨欣. 乘着制度滑行: 推免生和推免制度的互动[D].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2016: 18.
- [28] 牛新春,杨菲,杨滢.保研制度筛选了怎样的学生——基于一所研究型大学的实证案例研究[J].教育发展研究, 2019(9): 1-10.
- [29] Michael Poku. Campbell's Law: implications for health care [J]. Journal of Health Service Research&Policy, 2016, 21(2): 137-139.
- [30] 孟子. 孟子[M]. 颜兴林译注, 南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014: 48.
- [32] 康永久. 教育制度: 最重要的教育资源[J]. 教育与经济, 2011(3): 18-21.

(责任编辑 于小艳)

现代教育论丛

JOURNAL OF MODERN EDUCATION

No. 2, 2022 General. No. 244

高等教育财政投入及高校竞争力: 空间特征与驱动力识别

刘晓凤1 李 研2

- (1. 湖北经济学院财政与公共管理学院, 湖北 武汉 430205;
 - 2. 暨南大学力学与建筑工程学院, 广东 广州 510632)

摘 要:高等教育财政投入是提升高校竞争力的重要一环,为高校竞争力提供了经济基础与助推器。本研究在构建高等教育财政投入与高校竞争力指标基础上,综合运用 CDA 耦合协调度模型、ESDA 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与 GeoDetector 地理探测器模型,探究中国大陆 31 个省份高等教育财政投入与高校竞争力协调度空间特征及驱动力。结果显示:中国各省高等教育财政投入与高校竞争力协调度水平较低且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特征,显现出整体非均衡、局部聚集的空间结构特征。此外,高等教育财政投入与高校竞争力协调度呈现出正向空间关联性,两者的协调度主要以胡焕庸线为界,其东南侧多为热点聚集区,西北侧多为冷点聚集区。国家层面,政府调控对高等教育财政投入与高校竞争力协调度有着重要的引导功效。地区层面,东部地区协调度影响因素呈现多元化、层级性特征,创新驱动、师资驱动、投资拉动、城市化带动和地区禀赋对东部地区的协调度发挥着重要作用;人才培养结构、社会服务、创新驱动和师资驱动对中部地区起着主要作用;西部地区高等教育财政投入与高校竞争力协调性空间差异多体现为政策驱动型,人才培养结构、投资拉动发挥着重要作用;政府调控、创新驱动、人才培养结构、师资驱动对东北地区的协调度起重要作用。

关键词: 热点聚集区; 胡焕庸线; 高校竞争力; 驱动力识别

中图分类号: G64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6762(2022)02-0087-14

高等教育财政投入是促进高校竞争力提升的重要驱动,是高校发展的经济支撑。2019 年,我国高等教育财政投入为 13 464 亿元,比 2018 年增加 11. 99%,高校生均教育经费为 38 681 元,比 2019 年增长 6. 60%^[1]。2020—2021 年 QS 世界大学排名中(即 QS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是由教育组织Quacquareli Symonds 所发布的年度世界大学排名),中国高校排名整体上升,中国共有 83 所高校上榜,比 2019—2020 年增加了 17 所。清华大学排名由 2020 年的第 16 位升至第 15 位,北京大学、复旦大学、

收稿日期: 2021-06-24

基金项目:湖北省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省社科基金前期资助项目)"湖北省高等教育对劳动力供给及产业竞争力的影响研究"(21ZD091)、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地方大学改革发展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研究"专项课题"地方"双一流"高校科技创新能力的识别、影响因素及提升机制研究"(21DFD02)

上海交通大学的排名分别为第 23、34、47 位。高校竞争力是高校教学、科研、师生、活动、设施、资源、社会声望的集中体现,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与"双一流"建设的重要依托。随着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的到来,高等教育财政投入与高校竞争力的交互作用越发凸显。

国外关于高等教育财政投入与高校竞争力关系的研究较早,卡罗拉夫科(Kholiavko)、扎瓦热纳科(Zhavoronok)等认为高校竞争力的提升有赖于高校的宣传推广、教育现代化、科研国际化、学生设施的改进等。^[2]博位姆(Blum)和特里克(Treeck)指出,高等教育财政投入与经济、政治、高校竞争力相关。^[3]侯赛因(Hussain),罗素(Russell)和哈迪德(Haddad)引入管理竞争力概念,并深入探讨了欧洲高校竞争力与高等教育财政投入的关系。^[4]扎卡洛娃(Zakharova)认为高校竞争力与学术声望、论文引用率密切相关,需要向国际会议网络、研究数据公开、国际会议信息、专业成果和认证、校友就业投入更多资源。^[5]

国外研究为国内研究的开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借鉴。国内研究主要关注高等教育财政投入与高校竞争力的作用关系。陈慧敏、陈海汉从投入一产出一环境视角,探讨高等教育财政投入与高校竞争力的相关性,发现东部、中部和西部高等教育财政投入和高校竞争力都存在差距,但在国家财政支持下,高校竞争力差距正在缩小。[6] 廖鹏、乔冠华、金鑫、王志锋、贾金忠发现随着高等教育财政投入增加,高校竞争力出现分化,存在排名固化的问题。[7] 尹敏捷、刘宏生、刘鹏祥认为高等教育财政投入增加,高校竞争力出现分化,存在排名固化的问题。[8] 王建华认为今天高校竞争力的核心在于创新,只有增强创新投入,加强创新治理,才能切实提升高校竞争力。[9] 随着研究的深入推进,基于高等教育财政投入与高校竞争力的内涵和性质特征对两者交互关系展开实证研究的文献不断涌现。已有成果为本研究夯实了基础,从研究区域尺度看,已有研究对象多集中于高等教育发达地区,中观尺度的省域对比研究略显单薄,不利于从整体上把握高等教育财政投入和高校竞争力协同效应的空间格局;就研究视域看,现有研究多集中于高等教育财政投入与高校竞争力关系研究,较少考量高等教育财政投入与高校竞争力、社会进步间的互动关系,且较少基于空间经济学视角识别高等教育财政投入与高校竞争力协调度空间差异的驱动力。

2017 年国务院颁布的《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指明了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思路与模式,意味着在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背景下高等教育财政投入渐趋成为促进高校竞争力提升的重要力量。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颁布的《关于高等学校加快"双一流"建设的指导意见》明确指出,高等教育财政投入是保持高校持续健康发展的强大引擎与促进高等教育全面进步的必须要件。高等教育财政投入推动高校从师资队伍、教学水平、科研水平、学科声誉、社会服务等多维度加快建设进程,为高校竞争力的增强提供了必要条件。然而,我国高等教育财政投入与高校竞争力协调性空间差异特征如何?协调性是否存在空间关联?驱动高等教育财政投入与高校竞争力协调发展的动力因素有哪些?基于这些疑问,本研究在建构两者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综合运用 CDA 耦合协调度模型、ESDA 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与 GeoDetector 地理探测器模型,探究中国大陆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等教育财政投入与高校竞争力协调度的空间差异、空间关联特征及驱动因素,以期为中国高等教育财政投入与高校竞争力可持续发展提供借鉴。

一、指标体系构建和研究方法

本研究基于"双一流"建设、构建了包含5个高校竞争力一级指标、19项二级指标的区域高等教育

财政投入与高校竞争力指标体系,并采用综合评价模型、CDA 协调度评价模型、ESDA 探索性空间数据 分析法、GeoDetector 地理探测器模型等对上述指标进行探讨。

(一)基于"双一流"建设的指标体系构建

性系数

伴随高等教育普及, 我国更加强调高等教育财政投入应与高校竞争力、区域社会经济协调共生, 更关注其行业关联效应的发挥。在高等教育财政投入规模不断扩大的背景下,高等教育财政投入的行 业效应将得到极大释放,高等教育财政投入将成为高校竞争力建设的重要支撑。因此,高等教育财政 投入综合评价指标构建应涉及投入规模和高校竞争力的相关指标。这样不仅可以体现出高等教育普及 化背景下高等教育财政投入优化配置与高校竞争力发展的共生性,还可全面、客观地测度两者间的协 调效应。从系统论角度考量,高等教育财政投入并非孤立的经济活动,其本身有很强的行业关联性和 联动性,即高等教育财政投入系统各要素通过高校的活动与行业产生交互,其愿景为实现高等教育财 政投入与效益的关联效应。高等教育财政投入规模、区位布局、效益、效应等维度能够较大程度上反 映区域高校竞争力水平。在已有研究的导引下,本研究构建了高等教育财政投入系统综合评价指标体 系。其中, 高等教育财政投入效益表征区域高等教育运作绩效情况, 影响高等教育财政投入的资金数 额和高校竞争力发展: 高等教育财政投入地位衡量高等教育财政投入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及对区 域创新的拉动力:高等教育财政投入规模表现要素为供给规模对高等教育活动运行的支撑强度:高等 教育财政投入效应衡量区域高等教育财政投入活动产生的社会效应及吸引人才的规模强度。依照以上 4 个高等教育财政投入系统一级指标确定 13 项二级指标。

高校竞争力测度方法涵盖单一指标法与复合指标法,单一指标主要指高校的社会声望,不能体现 出高校真实的发展实力。如今多使用复合指标法测度高校竞争力。参照《关于高等学校加快"双一流"建 设的指导意见》与相关文献、遵循系统、科学和可操作的原则、本研究认为高校竞争力是多层次复合系 统集成综合性指标的表征,主要涵盖人才培养、师资队伍、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国际合作交流等5 个维度。[10] 其中,人才培养是高校培养的人才对区域的劳动力结构优化与智力支持效应,师资队伍是高 校教学质量与学术水平的重要保证,科学研究体现高校的创新能力,社会服务体现高校与社会的关系 密切度,国际交流合作体现了高校对外开放的程度。根据这5个高校竞争力一级指标,本研究确定了 17 项二级指标(见表 1)。

		表1 区域高等教育财政	[投入与高校	竞争力指	标体系
项目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权重	类型	指标涵义
高等教育财	影响因素	人均工资	0. 0360	+	所有教师的平均工资水平
政投入系统		教职工数量	0. 0218	+	高校专任教师、行政人员、教辅人
					员、科研机构人员的数量
		生均教育经费	0. 0423	+	高校本专科、研究生平均教育经费
		在校生数量	0. 0280	+	各地在校本专科、研究生规模
		城市化水平	0. 0354	+	城镇人口/总人口
		地区禀赋	0. 0366	+	人均 GDP
	努力程度	高等教育经费/教育经费	0. 0465	+	高校教育经费占各类教育经费的比重
		高等教育经费/GDP	0. 0261	+	高校教育经费占 GDP 的比重
		高等教育经费/财政支出	0. 0274	+	高等教育经费占财政支出的比重
	变动程度	高等教育经费对财政收入的弹	0. 0161	+	高等教育经费增长率/财政收入增长率

		生均高等教育经费对财政收入 的弹性系数	0.	0161	+	生均高等教育经费增长率/财政收入增长率
	配置合理性	仪器设备投入	0.	0677	+	研发经费中固定资产购置费用
		R&D 经费投入	0.	0373	+	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经费
高校竞争力	人才培养	每十万人中的在校生数	0.	0256	+	100 000×在校生数/人口数
系统		在校研究生数/在校生数	0.	0372	+	在校研究生数占所有在校本专科、研 究生数的比例
	师资队伍	生师比	0.	0224	+	在校生与专任教师的数量比
		教授数/专任教师总数	0.	0264	+	副教授及正教授占专任教师的比例
		专任教师数/教职工总数	0.	0114	+	专任教师占教职工总数的比例
	科学研究	研发人员全时当量	0.	0513	+	实际参加研发活动人员折合的全时当量
		纵向科研经费占比	0.	0182	+	政府科研拨款占总科研经费的比重
		重点学科数量	0.	0391	+	国家一流学科数量
		重点实验室数量	0.	0427	+	国家级重点实验室数量
		科研成果获奖数量	0.	0425	+	省部级以上科研成果获奖数量
		论文数量	0.	0228	+	国内外公开发表论文数量
		专著出版数量	0.	0347	+	国内外出版专著数量
		国家级教学成果奖数量	0.	0333	+	教育部国家级教育成果奖获奖数量
		国家级精品课程	0.	0336	+	本专科国家精品课程
		专利申请授权数	0.	0331	+	得到授权的专利数
	社会服务	技术转让实际收入	0.	0593	+	技术转让当年带来的实际收入
		政策采纳率	0.	0294	+	提交的政策数/采纳的政策数

注:高等教育财政投入系统指标和高校竞争力系统指标采用《中国统计年鉴》《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高等学校科技统计资料汇编》《教育部直属高校基本情况统计资料汇编》等各省省级层面的数据。其中"+"指正向指标,各指标权重基于2018年数据使用熵权法获得。

(二)模型构建

1. 综合评价模型

考量到高等教育财政投入和高校竞争力是相互作用的两个系统,本研究采用熵权法获得各指标权重,使用线性加权法对高等教育财政投入与高校竞争力展开综合评估。其公式为:

$$U_{i=T,N} = \sum_{i=1}^{m} \boldsymbol{\omega}_{ijX_{ij}} \tag{1}$$

其中, U_T , U_N 分别为高等教育财政投入与高校竞争力综合评价函数, ω_{ij} 是各指标的权重, $\sum_{j=1}^{m}\omega_{ij}=1$, X_{ii} 是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后的数值。

2. CDA 耦合协调度模型

耦合度是对高等教育财政投入与高校竞争力系统间交互效果的测度,体现交互效果达到一定临界值时的发展趋势。其公式为:

$$C = \frac{U_T \times U_N}{\left(\alpha \ U_T + \beta \ U_N\right)^{\theta}} \tag{2}$$

其中, C 指耦合度, C 值越大, 说明耦合度越高, $C \in [0, 1]$, $\alpha \setminus \beta$ 为特定权重系数, 赋值 $\alpha = \beta = 0.5$, θ 是调节系数, 取 $\theta = 2$ 。

因耦合度不反映高等教育财政投入与高校竞争力的协同效应,因此引入耦合协调度模型,公式如下:

$$D = (C \times T)^{1/2} \tag{3}$$

其中,D 是耦合协调度,T 是高等教育财政投入和高校竞争力综合指数,T=a U_T+b U_N ,a,b 是待定系数,a+b=1。高等教育财政投入有利于高校竞争力的提升,高校竞争力的提升又能吸引更多的高等教育财政投入,二者是交互作用的系统体系,取 a=b=0.5。

3. ESDA 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法

全局空间自相关(Global Moran'I)可以识别观测值在区域上的空间关联关系,值越大,表明观测值的集中度愈高;反之,则表明观测值的集中度越低。局部空间自相关(Getis-Ord Gi*)可测算观测值在热点区、冷点区的分布。本研究使用 ESDA 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法通过全局和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来探讨中国高等教育财政投入与高校竞争力协调度空间关联模式,并辨析两者协调度局部冷热点的聚集属性,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GMI = \frac{\sum_{i=1}^{n} \sum_{j=1}^{n} w_{ij} (X_i - X) (X_j - X)}{S^2 \sum_{i=1}^{n} \sum_{j=1}^{n} w_{ij}}$$
(4)

$$G_i^*(d)^2 = \sum_{j=1}^n W_{ij}(d) X_j / \sum_{j=1}^n X_j$$
 (5)

其中, $S^2 = \frac{1}{n} \sum_{i=1}^n (X_i - X^2)$, $\overline{X} = \frac{1}{n} \sum_{i=1}^n X_i$, $Z(G_i)^2 = G_i - E(G_i) / \sqrt{Var(G_i)}$, n 为省份单元数量, X_i 和 X_j 分别为 X 在空间单元 i 与 j 上的观测值, W_{ij} 是使用临近标准建构的空间权重矩阵,其空间关系采用 逆向距离法(Inverse Distance),距离方法选择欧式距离(Euclidean Distance)。GMI 反映既定显著性水平下甄别观测值的集聚和扩散境况, $Z(G_i)$ 的显著性水平则体现各省份冷点和热点的空间分布情况。运用 ArcGIS 的自然间断点(Nature Break)分类法,把 $Z(G_i)$ 的结果分为热点、次热点、过渡、次冷点与冷点区域。

4. GeoDetector 地理探测器模型

GeoDetector 地理探测器模型主要用于分析空间差异性,若因变量受到某一自变量的显著驱动,则因变量与自变量应有相似的空间分布。本研究使用 GeoDector 地理探测器方法探讨中国高等教育财政投入和高校竞争力协调度空间差异的动力因子,公式如下:

$$P = 1 - \frac{1}{\sigma^2} \sum_{k=1}^{L} N_k \sigma_k^2$$
 (6)

其中,L是自变量 X、因变量 Y 的层级数量,k=1, 2, 3, \cdots , σ^2 是全国高等教育财政投入与高校竞争力协调度的方差, O_k^2 是各省高等教育财政投入与高校竞争力协调度的方差, O_k^2 是各省高等教育财政投入、高校竞争力协调度的方差, O_k^2 是影响因子对高等教育财政投入、高校竞争力的解释力, O_k^2 P 取值区间为 O_k^2 P 取值区间差异的影响力越大,当 O_k^2 P 取值区探测因子与高等教育财政投入和高校竞争力协调度空间差异没有关联关系。

探测交互作用的目的在于甄别影响因子共同发挥作用时,P 对高等教育财政投入与高校竞争力协调度空间差异的解释力变强、变弱、还是保持中性。评估方法经由比较单因子 P 值及双因子 P 值的大小、

辨别两因子间交互作用的方向和强度。

5. 研究对象和数据来源

本研究主要对中国大陆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等教育财政投入和高校竞争力协调度及驱动力展开测算,采用综合评价模型计算各省高等教育财政投入和高校竞争力协调度的综合得分,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出各省高等教育财政投入与高校竞争力耦合度 C 与耦合协调度 D,采用均匀分布函数法对协调度等级进行划分,各项指标分值见表 2 和表 3。

	衣 2 合自局等教育则以投入与局权克尹刀协调度合坝指标分组								
省份	$\mathbf{U}_{\mathtt{T}}$	U_{N}	С	D	省份	U_{T}	U_{N}	С	D
北京	0. 113	0. 196	0. 9278	0. 7830	湖北	0. 019	0. 165	0. 3704	0. 5544
天津	0.009	0.004	0. 8521	0. 2301	湖南	0. 119	0. 118	1.0000	0. 5319
河北	0. 193	0. 135	0. 9687	0.6696	广东	0.044	0.007	0. 4737	0.6032
山西	0.081	0.007	0. 2929	0.0788	广西	0.073	0.07	0. 9996	0. 3182
内蒙古	0.05	0.08	0. 9467	0. 3245	海南	0. 035	0.018	0.8971	0.0981
辽宁	0.079	0.03	0. 7979	0. 1818	重庆	0.029	0.048	0. 9391	0. 1935
吉林	0.031	0.062	0.8889	0. 2417	四川	0. 112	0.092	0. 9904	0. 4361
黑龙江	0. 102	0. 15	0. 9637	0. 6188	贵州	0.057	0. 127	0. 8553	0. 4865
上海	0. 128	0. 22	0. 9301	0.8807	云南	0.086	0. 15	0. 9265	0. 5985
江苏	0.094	0.096	0. 9999	0. 4298	西藏	0.026	0.048	0. 9116	0. 1895
浙江	0.03	0.055	0. 9135	0. 2174	陕西	0.022	0.007	0. 7325	0. 4551
安徽	0.042	0. 209	0. 5573	0. 7290	甘肃	0. 031	0.065	0.8746	0. 2516
福建	0.067	0.015	0. 5979	0. 1116	青海	0.049	0.058	0. 9929	0. 2507
江西	0.076	0.072	0. 9993	0. 3285	宁夏	0.075	0.02	0.6648	0. 1386
山东	0. 186	0. 167	0. 9971	0. 7727	新疆	0.004	0.024	0. 4898	0. 0824
河南	0. 198	0. 035	0. 5106	0. 2876					

表 2 各省高等教育财政投入与高校竞争力协调度各项指标分值

表3	批油	应笙	细知	4

协调度	0-0.1	0.1—0.2	0. 2—0. 3	0.3—0.4	0.4—0.5	0.5—0.6	0.6—0.7	0.7—0.8	0.8-0.9	0.9—1
等级	极度失调	严重失调	中度失调	轻度失调	濒临失调	勉强协调	低度协调	中度协调	良好协调	优质协调
省份	海南、新	重庆、西	河南、甘	江西、内	贵州、陕	云南、湖	河北、黑	北京、山	上海	无
	疆、山西	藏、辽宁、	肃、青海、	蒙古、广	西、四川、	北、湖南	龙江、广	东、安徽		
		宁夏、福	吉林、天	西	江苏		东			
		建	津、浙江							

二、实证研究

实证分析发现,各地区高等教育财政投入与高校竞争力协调度存在空间差异的同时,也存在一定的空间关联。

(一)高等教育财政投入与高校竞争力协调度空间差异特征

根据耦合协调度等级划分结果和高等教育财政投入与高校竞争力各项指数评分可知、中国各省高

等教育财政投入与高校竞争力协调度空间差异性显著且呈现高低对等属性,即耦合协调度较高的地区, 其高等教育财政投入与高校竞争力水平也较高,如上海市、北京市、山东省;耦合协调度较低的地区, 其高等教育财政投入与高校竞争力指数也较低,如海南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山西省。具体来看, 各地的空间差异特征如下。

1. 良好协调型地区仅有上海市,在空间上呈现离散分布状态

在"双一流"建设背景下,上海依靠自身发达的经济、雄厚的高等教育基础、高效的科研教学产出水平和社会服务能力,特别是上海对人才的巨大吸引力,区位优势与本地高等教育虹吸效应明显,高等教育财政投入与高校竞争力发展过程中易产生规模经济与外部性,使上海成为长三角地区高校竞争力发展的重要依托。加之高等教育资源禀赋充裕,上海作为直辖市拥有 64 所高校,高等教育发展的带动效应明显,促使高等教育财政投入与高校竞争力互动效应呈现良好的协调度。

2. 中度协调型地区包括北京市、山东省和安徽省、在东部地区呈散点分布状态

这些省份(直辖市)的高等教育财政投入、高校竞争力发展基础与高等教育资源丰富,尤其是北京,高校众多,在"双一流"建设中拨得头筹,加之其作为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高等教育实力雄厚,源源不断地吸引着高层次人才集聚,生产要素在人才集聚中产生涓滴效应,高等教育财政投入与高校竞争力协同效应较好。山东省与安徽省、浙江省依托国家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政策调控和"双一流"建设的政策保障,正逐渐形成高等教育财政投入加速推进高校竞争力质量建设的正向效应模式,同时高校竞争力的增强为高等教育财政投入扩容、提质、增效提供了内生驱动力。

3. 低度协调型地区有河北省、黑龙江省和广东省,在空间上呈现 C 型分布

这些省份高等教育财政投入与高校竞争力发展同步性不高,高等教育财政投入或高校竞争力的滞后延缓了两者间的协同效应。比如,河北省高等教育财政投入综合得分高于高校竞争力综合得分,而 黑龙江省的高校竞争力发展滞后延缓了其高等教育财政投入规模和效率的增长。

4. 勉强协调型地区有云南省、湖北省与湖南省,在空间上呈现反向 L 型分布

这些省份高等教育财政投入或高校竞争力的落后造成两者协同效应不佳。比如,云南省和湖北省 高校竞争力综合得分高于高校竞争力综合得分,但湖南省高校竞争力发展滞后影响其高等教育财政投 入规模与效率的提高。

5. 濒临失调型地区有贵州省、陕西省、四川省、江苏省,空间上呈现倒 U 型分布

这些省份除江苏省之外都地处内陆,高等教育区位相对欠佳,高等教育资源丰度较为薄弱,高等教育发展链的横向拓展与纵向延伸不足,加之高等教育发展基础不够稳固,大量高等教育资源、人才和技术被协调度优势区所吸纳,对其产生的引流效应显著。

6. 其余省份属于高等教育财政投入与高校竞争力轻度、中度、严重或极度失调型

这些省份基本上位于中国西部和东北地区,受制于经济非均衡发展、高等教育投入的不均衡、高等教育基础落后、人才发展潜力不足、学科建设亟需加强、政策红利不明显、交通不畅等因素的影响,高等教育财政投入资源联动效应和经济驱动力、政策保障力、集聚效应和扩散效应释放受限。尤其是海南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青海省、宁夏回族自治区与西藏自治区高等教育发展滞缓,高等教育的集聚性和协同较差:一方面,高等教育财政投入规模小,待遇不高,人才短缺、人才流失严重,国家级重点学科、重点实验室少;另一方面,高等教育投入的成本较高,回报周期漫长,高等教育财政投入的效益有限,加上经济发展滞后对高校竞争力驱动不足,致使其高等教育财政投入与高校竞争力发

展不对等,两者相互牵制,难以共同前行。

中国高等教育财政投入与高校竞争力协调度水平不高且存在明显的省际异质性,展现整体不均衡、局部聚集的空间分布结构。协调度高的地区主要集中在高等教育发达的东部,协调度低的地区主要集聚在高等教育欠发达、基础欠佳、资源不丰富、学科建设亟待加强的中西部地区。这与区域自身的高等教育基础、社会经济状况和区域非均衡发展战略密切相关:东部地区经济发达、资源丰富、自然条件优越,有利于高等教育活动的开展,而西部地区自然条件恶劣、资源稀缺、经济有待发展,高等教育发展受限。

(二)高等教育财政投入与高校竞争力协调度空间关联特征

使用 ArcGIS 空间分析模块对中国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等教育财政投入与高校竞争力协调度全局 Moran's I 指数测算显示,两者协调度全局 Moran's I 指数为 0. 1089,其关联度大于 0,且 Z 值大于 5%置信水平的临界值 2. 143,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反映出中国各省高等教育财政投入与高校竞争力协调度存在显著的空间聚集性。

热点区	次热点区	次冷点区	冷点区
上海、北京、	湖北、湖南、安徽、四川、吉	河南、海南、辽宁、福建、浙	贵州、甘肃、宁夏、新疆、山
广东、江苏、	林、天津、山东、重庆、黑龙	江、江西、云南、吉林、辽	西、青海、内蒙古
陕西	江	宁、广西	

表 4 中国高等教育财政投入与高校竞争力协调度冷热点空间分布

采用 ArcGIS 软件空间分析模块计算出各省高等教育财政投入与高校竞争力协调度的冷热点统计量,并使用自然断点法把各省份分为热点区、次热点区、次冷点区与冷点区(见表 4),并对协调度的高分区和低分区特征进行分析。中国高等教育财政投入与高校竞争力协调度呈现半包围的分布特征,东部热点区是核心层,向西依次过渡为热点区-次热点区、次冷点区-冷点区的层次特点,高等教育财政投入与高校竞争力协调指数的冷热点分布,对应于中国的社会经济格局,冷热点的分布以胡焕庸线为界,胡焕庸线右侧高等教育发达且高校竞争力强,多为热点区;胡焕庸线左侧高等教育薄弱且高校竞争力弱,多为冷点区,为集中连片趋同分布。原因在于:一是经济发达地区通常财力雄厚,借助于国家倾斜政策与本地高等教育资源的丰度优势,在高等教育发展中处于先发优势地位,对资源与人才有着极强的虹吸效应,易形成高校竞争力的积聚性。二是高等教育财政投入是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经济基础,高校通过人、财、物的投入,在科研、教学、人才培养、社会服务中不断进步,形成良性的马太效应,有助于区域高校竞争力的提升。因此,高等教育财政投入与高校竞争力协调度一定程度上受到社会经济发达程度、政策倾斜和资源丰度的影响。

三、中国高等教育财政投入与高校竞争力协调度空间差异驱动力分析

运用 GeoDetector 地理探测器模型识别中国高等教育财政投入与高校竞争力协调度空间差异的驱动力。依据客观性、有效性、典型性与数据可获得性原则,经由文献分析法与专家咨询法共选取以下 8 项指标作为 GeoDetector 地理探测器分析的影响因子。

(1)地区禀赋(X_1): 经济增长对高等教育财政投入与高校竞争力协调度的驱动主要体现在供求两个方面。从供给侧看,经济发达地区发展潜力大,对周边地区生产要素流易产生虹吸效应,高等教育发

展集聚效应显著,为区域高等教育财政投入与高校竞争力协同发展提供了内生驱动力;从需求侧看, 经济增长带来社会消费产品总量增长,有效刺激社会对高等教育的需求。该指标用人均 GDP 表示。 (2)城市化带动(X₂):新经济地理学认为高校更倾向于为市场规模大的区域提供高等教育服务,城市化 水平越高,本地高等教育消费市场规模的扩大就越能够吸引资金流、物质流和人才流集聚,促使区域 高等教育消费的发挥本地市场效应潜能得到发挥。该指标用城镇人口占比表示。(3)政府调控(X、):政 府对区域高等教育财政投入与高校竞争力建设的作用,一方面表现在政府对区域高等教育投入政策的 调整、创新及在基础设施建设、规划制定等领域的作用,另一方面表现在政府对区域高等教育投入结 构优化及空间规划方面的引导。该指标用生均高等教育经费表示。(4)投资拉动(X4):高等教育科研投 资深化不仅可以优化科研经费的结构,还有利于科技创新、技术进步,推动高等教育财政投入与高校 竞争力提质增效。该指标用仪器设备投入/研发人员全时当量表示。(5)人才培养结构(X,):从人才培 养的特征与属性来看,研究生具有创新能力强、科研水平高、专业素养高的特点,研究生培养越多表 明高校竞争力越强,人才培养结构红利越显著。该指标用在校研究生规模占在校学生规模的比例表示。 (6)师资驱动(X。):师资队伍作为人才培养、科技创新、社会服务的主体,优秀的教师队伍能够增强高 校竞争力,为高校带来更多资源。该指标用教授、副教授数量占专任教师数量的比例表示。(7)创新驱 动(X,): 创新驱动是影响区域高校竞争力发展梯度层次的决定性因素。该指标用研发人员人均专利申 请授权量表示。(8)社会服务(X。):即高校为社会提供先进技术与政策建议,推动社会技术进步和政策 改进。该指标用研发人员人均技术转让收入表示。

为剔除异方差的影响,本研究在将变量引入模型之前,对各变量展开对数化处理以确保数据的稳定性,然后以高等教育财政投入与高校竞争力协调度为因变量,以上述 8 个因素为自变量,运用GeoDetector 地理探测器模型分别识别全国及东中西东北地区高等教育财政投入与高校竞争力协调度空间差异的主导驱动因子:即运用AreGIS 软件的渔网创建功能,把格栅数据提取到点,采用自然断点法把自变量数据分为 5 个层级,把自变量从数值量转成类型量——由于中国高等教育财政投入与高校竞争力协调度具有东部到西部地区逐级下滑的显著差异性,本研究分别对全国层面和分区域尺度的高等教育财政投入与高校竞争力协调度空间差异的影响因子展开识别;运用AreGIS 把高等教育财政投入与高校竞争力协调度和各影响因子进行空间匹配,经由测算得到全国及四大区域尺度高等教育财政投入与高校竞争力协调度的因子影响力系数(见表 5)。

中部地区 全国 东部地区 西部地区 东北地区 P_{DU} 显著性 P P_{DU} 显著性 P P_{DU} 显著性 P P_{DU} 显著性 P P_{DU} 显著性 P 地区禀赋(X₁) 0.3326 0.0000 0.4326 0.000 0.0357 0.4034 0.2436 0.0000 0.2436 0.0000 城市化带动(X₂) 0.4013 0.0000 0.4395 0.000 0.0213 0.2279 0.249 0.0000 0.2493 0.0000 政府调控(X3) 0.6768 0.0000 0.2264 0.7412 0.2367 0.0038 0.8462 0.00000.8462 0.0000 投资拉动(X₄) 0.1834 0.0000 0.5568 0.0000 0.0367 0.1592 0.6493 0.0000 0.6493 0.0000 人才培养结构(X₅) 0.1947 0.0000 0.3062 0.3843 0.8692 0.0000 0.6725 0.0000 0.6725 0.0000 师资驱动(X。) 0.4342 0.0000 0.6842 0.000 0.5216 0.0232 0.1721 0.0000 0.1721 0.0000 创新驱动(X₇) 0.4682 0.0000 0.6921 0.0000 0.8136 0.0000 0.2467 0.0000 0.2467 0.0000 社会服务(X₈) 0.4963 0.0000 0.2618 0.0000 0.8574 0.0000 0.3652 0.0000 0.3652 0.0000

表 5 全国及四大地区高等教育财政投入与高校竞争力协调度空间差异的影响力

注: Pnu 为影响因素对高等教育财政投入与高校竞争力协调度空间差异的影响力探测指标。

(一)全国层面高等教育财政投入与高校竞争力协调度空间差异影响因子识别

从全国层面来看,所有探测因子都通过了显著性 P 值检验,政府调控因子之外的探测因子的驱动力差异不显著,政府调控因子的解释力高于其他探测因子。这说明政府调控力(0.6768)在促进高等教育财政投入与高校竞争力两大系统协同发展中发挥着重要引导作用,高等教育财政投入与高校竞争力发展具有政策导向性,政府财政支持力度会影响高等教育资源要素空间配置,进而影响高等教育财政投入与高校竞争力的协同效应。社会服务因子(0.4963)和创新驱动因子(0.4682)对高等教育财政投入与高校竞争力协调度的解释力也较强,表明社会服务能力与科技创新水平对协调度也非常重要。

(二)区域层面高等教育财政投入与高校竞争力协调度空间差异影响因子识别

东部地区高等教育财政投入与高校竞争力协调度影响因素呈现多元化的特点。除政府调控因子与人才培养结构因子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外,其他探测因子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且对协调度的解释力表现出层级化的特质。创新驱动因子(0.6921)与师资驱动因子(0.6842)是扰动东部地区高等教育财政投入与高校竞争力协调度空间差异的关键因子,这两个探测因子明显不同于其他探测因子。受益于"双一流"建设的区域高等教育非均衡发展战略、区域自身高等教育资源及区位优势的影响,东部地区在高等教育发展中更容易得到国家的政策性扶持,对周边地区人才和资源产生虹吸效应,高校科技创新产出效率高。东部地区能够为教师提供更优厚的待遇和良好的发展环境,不仅鼓励教师在科技创新上发挥作用,而且推动着人才培养、社会服务的发展,使得创新与师资等因子对高等教育财政投入与高校竞争力协调度的解释力更强,发挥着比中西部及东北地区更大的作用。投资拉动因子(0.5568)、城市化带动因子(0.4395)和地区禀赋因子(0.4326)对协调度空间差异也有较强的解释力,形成了第二层级的影响力;人才培养结构因子(0.3062)、社会服务因子(0.2618)和政府调控因子(0.2264)的解释力相对较弱。

中部地区高等教育财政投入与高校竞争力协调度影响因素体现出明显差异,除地区禀赋、城市化带动与投资拉动三个探测因子没有通过显著性 P 值检验外,其他探测因子都通过了 P 值检验。其中,人才培养结构因子(0.8692)、社会服务因子(0.8574)和创新驱动因子(0.8136)对中部地区高等教育财政投入与高校竞争力协调度发挥着重要影响,表明"双一流"建设促使中部地区高等教育学科优化程度显著提升,社会服务水平增强,高校竞争力提升效果明显。师资驱动因子(0.5216)对协调度空间差异有较强的解释力。中部地区的郑州、武汉、长沙、合肥等省会城市均为高等教育大市,日渐形成老中青结合的师资队伍结构,能够有效促进高等教育要素与高校竞争力要素的空间流动和传导配置,这也证实协调度与师资优势度空间布局的交错重叠结论。中部地区其他探测因子对协调度的解释力较弱。

西部地区高等教育财政投入与高校竞争力影响因子的解释力有着明显的差别。全部探测因子都通过了显著性 P 值检验。政府调控因子(0.8462)对西部地区高等教育财政投入与高校竞争力协调度的解释力最高,表明西部地区高等教育财政投入与高校竞争力协调度差异主要体现为政策驱动;人才培养结构因子(0.6725)及投资拉动因子(0.6493)对西部地区高等教育财政投入与高校竞争力协调度也有较强的解释力,都在 60%以上。随着中央加大对西部高等教育的扶持力度,西部地区人才培养结构不断升级,资源配置效率逐步提升,高校竞争力也随之提升。其他探测因子的解释力较弱。此外,探测因

子交互作用的分析显示,各探测因子交互作用后的解释力高于各探测因子单独作用的解释力,比如城市化带动因子单独作用的解释力只有 0. 2493,当其与人才培养结构、投资拉动、政府调控、创新驱动、社会服务等因子交互作用时,其交互作用的解释力达到 90%以上。因此,西部地区高等教育财政投入与高校竞争力协调性的差异在政策驱动的影响之下,还受多种探测因子的共同作用,应重视西部地区城市化带动因子与人才培养结构、投资拉动、政府调控、创新驱动、社会服务等交互作用时的强化效应。

东北地区高等教育财政投入与高校竞争力协调度影响因素呈现显著的差距,各探测因子都通过了显著性 P 值检验。其中,政府调控因子(0.8329)和创新驱动因子(0.8038)对东北地区高等教育财政投入与高校竞争力协调度起着重要作用,表明"双万"计划、"双一流"建设对东北地区高等教育学科发展起到明显作用,推动了高校竞争力提升;人才培养结构(0.5138)和师资驱动因子(0.5019)对东北地区高等教育财政投入与学校竞争力协调度空间差异有较强的解释力,东北地区的长春、吉林、沈阳、大连等城市高等教育发展基础不错,若在研究生培养、师资队伍建设上夯实力量,将有效推动高等教育要素与高校竞争力要素的优化配置。其他探测因子对协调度的解释力相对较弱。

四、结论和政策启示

在对高等教育财政投入与学校竞争力协调度的空间特征及驱动力分析之后,可以得到如下结论及相应的启示。

(一)结论

- 1. 在协调度等级上,高等教育财政投入与高校竞争力协调度等级划分为极度失调、严重失调、中度失调、轻度失调、濒临失调、勉强协调、低度协调、中度协调、良好协调等9个等级,没有省份属于优质协调型,表明整体上中国高等教育财政投入与高校竞争力协调度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 2. 在协调度空间差异上,高协调度省份主要集中于东部高等教育发达的沿海地区,低协调度省份主要位于高等教育欠发达、城镇化水平较低、高等教育资源相对贫乏、基础设施不完备、学科建设有待提升的西部地区。这与区域的经济社会条件、高等教育基础和高等教育发展政策密切关联。
- 3. 中国高等教育财政投入与高校竞争力协调度空间关联性存在显著的空间集聚性;协调度冷热点集聚基本以胡焕庸线为界,空间上表现为以东部的热点区为核心区,热点区→次热点区→次冷点区→冷点区向西逐渐过渡的半包围空间结构。这种格局的形成受到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政策倾向和高等教育资源马太效应的影响。
- 4. 国家层面,政府调控对高等教育财政投入与高校竞争力协调度发展发挥着重要引导作用。区域层面,东部地区高等教育财政投入与高校竞争力协调度的影响因素多元,呈现层级样态;人才培养结构、社会服务和创新因素对中部地区的协调度发挥着重要作用;西部地区高等教育财政投入与高校竞争力协调度差异主要缘于政策驱动,以及人才培养结构、投资、创新、社会服务等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在东北地区,政府调控、创新驱动、人才培养结构、师资驱动对高等教育财政投入与高校竞争力协调度作用比较显著。

5. 比对各省高等教育财政投入与高校竞争力的综合评价值发现, 高等教育财政投入综合评价指数 较高的省份,高校竞争力综合评价指数不是很高,意味着中国高校竞争力普遍落后于高等教育财政投 人。从东中西和东北地区来看,四大区域的高等教育财政投入综合评价指数相对都高于其竞争力综合 评价指数,意味着高校竞争力不强,延缓了高等教育财政投入资源配置优化的客观需要。其主要原因 在于,虽然我国高等教育投入规模在稳步扩大,但结构仍有待改进,加上高等教育财政投入产出的滞 后性,造成我国高校竞争力总体上不强,且存在非均衡现象。东部地区高校存在盲目追求综合化、扩 张学科类别、增加专业种类、购进大型教学科研设备等问题,导致内涵式发展不充分、设备使用效率 低下,虽对西部地区人才进行了"掠夺式"引进,但缘于现有体制、内部治理结构、绩效考评方式、成 果转化平台等因素无法为聚集的人才、资源提供相匹配的平台与发展环境,造成人才、资源的低效使 用,不利于高校竞争力的提升。西部地区高等教育基础薄弱、经济社会环境有待改善,高等教育规模 相对较小、高校竞争力相对落后,因而高校教师待遇不高,人才流失严重,导致高等教育资源储备不 足,加上地理位置的制约,对外交流少,高校竞争力难以实现跨越式发展。西部地区的西安、成都、 重庆高校竞争力相对较高, 为高等教育财政投入资源的优化配置、规模扩张、学科建设提供了助力, 而西部其他地区则急需通过扩大高等教育财政投入规模和改善结构来推动高校竞争力的提升。近年来, 中部地区高等教育规模逐步扩大,与东部地区的差距正在缩小。但规模扩大主要缘于国家的高校扩招 政策所带来的招生规模扩张,高等教育财政投入并没有显著提高,存在供求矛盾,不利于中部地区高 校的健康发展。缘于投入、体制、环境等因素,中部地区高校在人才引进上比不过东部高校,人才流 失问题严重,与东部地区的高校竞争力存在明显差距,再加上中部与东部高等教育财政投入的巨大差 距,中部与东部高校竞争力有进一步拉大的态势。东北地区的高等教育财政投入不容乐观,除少数重 点高校外,低于国家平均水平。此外,东北高校原本实力强劲的工科遭遇发展瓶颈,招生质量下降, 师资、培养的人才大量远走东部发达地区就业。东北地区高校数量不少,但在全国的竞争力较弱,学 科建设有待加强,难以满足地区经济建设需要,教学科研实力亟需增强,且国际交流合作较少,与国 际一流高校有较大差距。

(二)政策启示

在我国高等教育普及化背景下,高等教育财政投入是高校竞争力提升的重要经济基石。本研究基于全国及四大地区高等教育财政投入与高校竞争力协调度空间差异特征及影响因子的分析,提出如下建议。

就全国来看,一要强化顶层设计、全面统筹,即坚持高等教育财政投入规划与高校竞争力建设规划相统一的方针,不仅要发挥高等教育财政投入对高校竞争力的推动作用,积极调整高等教育财政投入的资源配置结构,优化学科建设,还要增强高校竞争力对高等教育财政投入的反推作用。二要实施统筹协调、融合发展,即经由区域高等教育财政投入资源共享、框架内体制机制创新与构建全国高等教育财政投入联动体系来实现区域间高校的强强联合、优势互补,不断放大协调度优势区的空间外溢效应;通过高等教育融合发展模式,如强强联合,强弱联合,实现"1+1>2";通过学科体系建设,把高等教育财政投入资源切实转化为高校竞争力,推动高等教育财政投入与高校竞争力走上良性协调发展路径。三是鼓励高校特色化、差异化发展。特色化、差异化发展都是把高等教育财政投入与高校竞

争力融合起来,是学科建设在高等教育财政投入优化配置、高校竞争力建设中的创新。学科是高校的基础,只有建设若干个一流学科,高校才能发展为一流高校。特色化发展和差异化发展有利于高等教育财政投入与高校竞争力的深度融合和协调共生。

就东、中、西和东北四大地区来看,东部地区为高等教育财政投入与高校竞争力耦合协调度较高 的区域、高等教育发达、人才培养、科技创新和社会服务的水平较高、区内经济发达、生活设施便利、 科技创新能力强、城镇化水平高。为提升高等教育财政投入与高校竞争力的协调度、需要走创新性可 持续发展的道路,倡导效率化运营、资源共享、学科集聚、发展特色学科,发挥高等教育财政投入结 构创新对高校竞争力的驱动效应,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学科结构和制度环境,缓解高等教育发展对 体制机制带来的多重压力,实现区域高等教育财政投入与高校竞争力提升方式向创新型和集约型发展。 中部地区、高等教育财政投入与高校竞争力耦合协调度中低型省份居多、具有联通东西的区位优势、 应以缩小省际高等教育财政投入与高校竞争力非协调作为重要调控目标。因此,要主动引进东部优势 专业与人才,经由优化学科结构与发挥本地体制机制创新潜能,增进高等教育的内生驱动力,提升高 校竞争力;同时,中部地区高等教育网络作为承东启西、链接南北的枢纽,应借助高等教育网络立体 化发展的要素传导与资源配置优化作用,实现区域内高等教育资源的效益转化,提升区域高等教育财 政投入的优化配置水平与高校竞争力的积聚和扩散能效,力争提升高等教育要素配置效率。西部地区, 高等教育财政投入与高校竞争力耦合协调度较低的省份居多,且高等教育财政投入与高校竞争力发展 受政策影响显著。因此,不仅要继续加大对西部地区高等教育人才保障、学科发展的财政金融与体制 机制创新等政策的支持力度,经由全方位对外开放、制度环境优化、人才引用育留、学科结构调整和 教育扶贫等政策性帮扶,提高其对人才和高等教育要素流的吸纳消化能力,促使其高等教育财政投入 与高校竞争力协调发展模式由外源式输血向内生式造血转化;还要经由优化高校分布的空间结构与增 加高等教育基础设施供给来提升其对高等教育资源、人才的合理承载容量,有序推进这些省份高等教 育财政投入与高校竞争力的协调共生。但同时也应注意,西部地区地域广阔,可充分利用现代教育技 术,通过发展社区远程开放大学,为西部地区培养下得去、留得住、用得好的应用型人才,并根据当 地的人文特点发展民族、农业相关学科,把握好学科建设与资源合理利用的关系,真正满足西部地区 高等教育发展需要。东北地区高等教育财政投入与高校竞争力耦合协调度不高。伴随国家财政投入与 战略重心的下移, 东北高校要通过设置分校或增设校区的方式逐步向小城市和民族地区扩展, 为中小 城市和民族地区发展补充人力资源。同时,在国家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战略支持下,东北地区高校 应注重应用型人才培养,在服务地方的过程中,不断提升高校的特色竞争力。

参考文献:

- [1] 教育部: 2019 年全国教育经费执行情况统计快报[EB/OL]. http://www.moe.gov.cn/jyb_xwfb/gzdt_gzdt/s5987/202006/t20200612_465295. html.
- [2] Nataliia Kholiavko, Artur Zhavoronok, Maksym Marych, Anastasia Viknianska, Serhii Kozlovskyi and Kostiantyn Herasymiuk. Countries Disposition in the Global Scientific and Educational Area: Management and Clustering[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nagement, 2020, 11 (5): 400-415.
- [3] Silvia Blum and Till van Treeck. Ordoliberalism: The Next Generation. What Do Prospective Social Science Teachers in Germany Think About

- the Euro Crisis? [J]. 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 2019, 57(4): 787-804.
- [4] Mostaq M. Hussain, John Russell and Ayman E. Haddad. Managing Competency in Non-Profit Organization: Experience with a European University[J]. Issues in 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Accounting, 2014, 8(4): 209-224.
- [5] Inna V. Zakharova. Competitiveness of the University as a Hybrid Structure in the Regional Educational Space[J]. Russian Journal of Regional Studies, 2020, 28(2); 377-399.
- [6] 陈慧敏, 陈海汉. "双一流"下我国高校科研国际化竞争力评价与提升对策[J]. 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 2021(3): 104-112.
- [7] 廖鹏,乔冠华,金鑫,王志锋,贾金忠."双一流"高校医学学科科研竞争力分析[J]. 科技管理研究,2020(10): 145-150.
- [8] 尹敏捷,刘宏生,刘鹏祥.辽宁省地方高校知识产权竞争力分析[J].中国高校科技,2020(1):61-64.
- [9] 王建华. 为创新而治理: 大学治理变革的方向[J].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 2020(1): 12-17.
- [10] 张红霞, 施悦琪. 聚焦"科教融合": "双一流"大学本科教育评估的应有之策[J]. 江苏高教, 2021(6): 15-24.
- [11] George S. Spais. A Fundamental Formula for Leadership Efficiency-Weighting the Contribution of 'Marketing Paideia' [J]. Journal of Strategic Marketing, 2005, 13(1); 61-77.
- [12] Maja Grdinić. Higher Education as a Means of Achieving Economic Growth and Development-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Selected EU and Former Soviet Union Countries [J]. International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2014, 12(4): 93-114.
- [13] Mariana Nicolae and Roxana Marinescu. University Marketing-Innovative Communication for Effective Inter/National Survival[J]. Journal for Communication Studies, 2010, 3(5): 117-138.
- [14] Hanif Mauludin and Darti Djuharni. The Potential of Higher Education Competitiveness in Perspective Good Corporate Governance in Indonesia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nagement and Administrative Sciences, 2015, 2(6): 1-9.
- [15] Samantha Rullan Rosanis and Lourdes Casanova. A Review of the Mexican 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usiness and Economic Sciences Applied Research, 2016, 8(3): 59-68.
- [16] Merita Bernik, Mery Sondari and Deru R. Indika. Model of Quality Management System to Maintain Quality Consistency in Higher Education [J]. Review of Integrative Business and Economics Research, 2017, 6(4): 235-242.
- [17] Urmas Varblane. EU Structural Funds in the Baltic Countries-Useful or Harmful? [J]. Estonian Discussions on Economic Policy, 2016, 24
 (2): 120-136.
- [18] Joshua M. Pearce. Catalyzing Mass Production of Solar Photovoltaic Cells Using University Driven Green Purchasing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ustainability in Higher Education, 2016, 7(4): 425-436.
- [19] Jaime Rivera Camino and María D. De-Juan-Vigaray. A Model of Quality Education in Economics and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J]. ESIC Market Economic and Business Journal, 2011, 139(5): 137-164.
- [20] Mark Anthony Camilleri and Adriana Camilleri. Education and Social Cohesion for Economic Growth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eadership in Education, 2016, 19(5): 617-631.
- [21] 苏启敏. 教育现代化进程中教育质量概念的历史、逻辑与结构[J]. 教育研究, 2020(7): 39-49.
- [22] 吴娴,刘莉,刘念才. 中国高校科技发展指数体系的构建研究[J].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 2020(1): 18-25.

(责任编辑 于小艳)

现代教育论丛

JOURNAL OF MODERN EDUCATION

No. 2, 2022 General. No. 244

近代教育史家陈青之的生平与志业

——兼论教育出版上的"陈青之现象"

张礼永

(华东师范大学 教育学部,上海 200062)

摘 要: 陈青之"十年磨一剑"写就的《中国教育史》,几乎费去了他壮年时的光阴和精力,自出版后就好评如潮,被列入"大学丛书"系列,作为部定教材来使用。其后因社会形势的变化,这部作品沉寂了四十年之久,后作为唯一一部中国教育通史性质的著作入选"民国丛书",然而学界还没有能够给他及他的作品以应有的地位。直到新世纪以来,才完全改换过来,他的著作获得了青睐,多家出版社予以再版,以至于形成教育出版上罕见的"陈青之现象"。这种现象的背后,既有经济的考虑,更有学术的肯定,历史在这里展现了它自身的辩证法。居于今日,透过现象,分析其人、其书,对于后学不无启发意义。

关键词: 陈青之;《中国教育史》; 教育出版

中图分类号: G40-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6762(2022)02-0101-09

今日的学术界,教育著作的出版,究竟是容易还是不易,作者、读者、编者或许会有不同的体验;而教育史著作出版的不易,没有分歧,只有共识。在这不易的氛围之中,却有一部教育史的著作能够异军突起,得到多家出版机构的青睐,十年来多次出版,因其作者为近代学者湖北沔阳人陈青之(1891-1943),故将这种现象概称为"陈青之现象"。

一、"陈青之现象"之所指

为了明确这种现象之所指,及打消部分专业人士的怀疑,将以年表的形式呈现 80 年来陈青之的《中国教育史》出版情况。

收稿日期: 2021-02-01

出版年月	 出版社		 册数	 定价
1936年4月		大学丛书	单、双	_
1939年7月	(东京)生活社	日译为《近代支那教育史》	单册	_
1963 年	台湾商务印书馆	大学丛书	单册	_
1989 年	上海书店	民国丛书	单册	_
2008年1月	东方出版社	民国学术经典・中国史系列丛书	单册	78
2009年1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民国学术经典丛书	单册	70
2009年10月	福建教育出版社	二十世纪中国教育学术名著丛编	三册	65
2010年12月	岳麓书社	民国学术文化名著	双册	66
2012年7月	东方出版社	民国大学丛书	双册	87
2013年3月	吉林人民出版社	中国学术文化名著文库	双册	88
2013年6月	上海书店出版社	新原典	单册	60
2014年3月	上海三联书店	民国沪上初版书・复制版	双册	255
2015年4月	北京联合出版社公司	民国大师文库(第六辑)	双册	107
2016年1月	中国文史出版社	民国名家史学典藏文库	双册	95
2016年2月	中国书籍出版社	中国近现代文化思想学术文丛	双册	100
2016年9月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学术名著丛书	双册	98
2018年12月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荆楚文库	双册	195
2019年3月	安徽人民出版社	兰台学术文库	双册	110

表 1 八十多年来陈青之《中国教育史》的出版年表(1936-2019)

上海商务印书馆于1936年4月出版了陈青之的《中国教育史》,被列入"大学丛书",出版不久,即被学者称颂:"规模宏大、内容充实、而且有系统",读到此书犹如"在沙漠里发现水草一般的兴奋。"[1]是年10月即再版,1940年在长沙又再次印刷,版式既有平装本,又有精装本;册数方面既有单册本,也有双册本。期间,还被日本学者译为日文,在日本学界传播,足见其流传较广、影响极大。

从 1949 年到 1988 年,《中国教育史》在大陆从未再版过,20 世纪 60 年代在台湾出过一版。如其女婿刘春华从同事柏年处得知其家藏有陈著《中国教育史》,这才晓得他的老丈人"还是一位有成就的学者。"[2]连至亲的女婿都不晓得,更遑论其他后学了。

1989年,上海书店影印出版"民国丛书",丛书涵盖多个学科,分为五编。第一编中教育学科共有3本书入选①,均为教育史著作,陈青之的《中国教育史》排序为第一。丛书共出版了5编,一共有14本教育史著作入选②,西洋教育史只有2本,明显侧重于中国教育史。后者之中,有7本为近现代教育史的论著和资料,其余5本著作,周予同、郭秉文的著作侧重教育制度,盛朗西的著作侧重书院,任时先的则侧重于教育思想,只有陈青之的著作,既述制度,又述思想,既言古代,又言近代,是一部

① 民国丛书第一编第 48 册为陈青之的《中国教育史》,第 49 册为周予同的《中国现代教育史》和舒新城的《近代中国留学史》合编本。

② 除了上言的3部之外,还有商务印书馆《最近三十五年之中国教育》、丁致聘《中国近七十年来教育纪事》、舒新城的《近代中国教育史料》、雷通群《西洋教育通史》、姜琦《现代西洋教育史》、郭秉文《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盛朗西《中国书院制度》、姜书阁《中国近代教育制度》、周予同《中国学校制度》、舒新城《近代中国教育思想史》、任时先《中国教育思想史》。

的体系分明、结构完整的通史著作。同在 30 年代,从形式上达到上述要求、并冠名为《中国教育史》的 著作不下 7 本①,惟有此书能够入选,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对其学术水准的认可。

"民国丛书"的全书印量有限,除了大型图书馆和科研单位予以收藏外,学者个人很难配置全套,但这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陈青之和他的《中国教育史》不仅开始为人知晓了,且找寻起来也较容易。只是教育学界还没有能够充分认识他,也没有给他相应的地位,以至于有学者在新世纪之初不禁发出感慨:"铺天盖地而来的《名人录》《名人辞典》,对陈青之或语焉不详,或只字不提,人们把他忘了,这是很不公正的。"[3]然而数年之后,形势完全变了。从前表可知,自 2008 年东方出版社出版横排简体字本以来,到 2016 年,近 10 年的时间,是书已经出版了 12 版,除了上海三联书店是原版影印之外,其余 11 版均是横排简体字重新排版,既有单册本,又有双册本,还有三册本,在教育史著作出版如此困难的今日,此书却获得如此之多的机会,将其称为"陈青之现象",似并不为过。

这种现象完全是由出版机构造成的,其背后,无疑是有经济的因素,如版税的问题,又如定价问题,14版中除了三联影印本定价较高之外,其余13版定价60至195不等,均价近94元,并不低廉。但经济并不是唯一的因素,因为民国时期,特别是20世纪30年代,是中国教育史研究的黄金时期,冠以《中国教育史》一名的书为数不少,为何此本独独获得如此之青睐呢?想来还是跟本书的质量有关。

二、陈青之撰写《中国教育史》的动机

陈青之出于什么样的目的来编撰《中国教育史》著作的呢?简言之,完成他的一个心愿。他从 1924年 10 月开始收集中国教育史的资料,至 1926年 10 月完成《中国教育史》(上卷)的编辑,同时交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室印行。上卷分为 5 篇 20 章,概述了上古至五代时的教育。作者本有写作下卷的计划,拟分为 4 篇,材料方面已经收集了十分之六,原说"不多久也要编辑出来了"[4],可是随着作者身份的改变及生活的困难,计划也受到了冲击,研究及写作一再延误,直到 1934年方才完成。从 1924年秋立志撰写,到 1934年夏完成全稿,整整 10 年光阴;从 1926年冬出版上卷,到 1936年春出版全书,亦是整整 10 年;"十年磨一剑",诚不虚言。

陈青之为何要投身至中国教育史的研究呢?他自述有三个动机[5]:

第一个动机是为了帮助他那些在师范学校担任教育课程的朋友们, 部章规定师范生需要学习中国教育史的知识, 可是"没有中国教育史相当的材料, 往往受学生底责备", 朋友们"苦于无法应付, 只得自己引为缺憾罢!"从 20 世纪之初开始, 出版的教育史著作大都是中外混合的, 如晚清末年韦以黼的《(师范用)教育史》(中国图书公司 1907 年)、戴克顿的《教育史讲义》(《师范讲义》1910-1911 年连载, 商务印书馆 1915 年合订本)、民初日本中岛半次郎的《中外教育史》(周焕文、韩定生译述, 蒋维乔校对, 商务 1914 年)、杨游的《(师范学校新教科书)教育史》(商务 1914 年)、李步青的《(师范学校适用)新制教育史》(中华 1915)、余寄的《(受验准备用书)教育史要览》(商务 1917 年)和张华年的《(师范讲习科用)教育史讲义》(商务 1918 年)等,即便是在陈青之投身中国教育史研究的前一年,即 1923 年,

① 20世纪30年代,中国教育通史性质的著作除了陈青之的《中国教育史》之外,还有黄炎培《中国教育史要》,商务印书馆1931年;毛邦伟《中国教育史》,文化学社1932年;余家菊《中国教育史要》,中华书局1934年;徐式圭《中国教育史略》,商务印书馆1934年;高希裴《中国教育史纲》,北平进学社1935年;陈东原《中国教育史》、商务印书馆1936年。

中华书局出版了王炽昌的《新师范教科书教育史》,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范寿康的《现代师范教科书教育史》,亦是中外混合的。这些著作对于"西洋"与"中国"、"古代"与"近世"的关系有明显的侧重,有的以西洋历史的分期来比拟中国,将本国教育历程亦分为上古、中古、近世,如韦以黼、戴克敦;有的则按朝代的演变来叙述,如中岛半次郎、杨游、余寄、张华年、范寿康;有的则将中国教育简单分为二个阶段,如李步青言"我国海禁前之教育"及"清季教育及民国学制",王炽昌的书也说"清季以前之旧教育"及"清季及民国之新教育"。郭秉文的著作已于1916年汉译出版,1922年已经第3次印刷,但侧重于教育制度方面。所以此时学界没有一部完备的中国教育史著作,乃是事实。

第二个动机是缘于他自己的经历,他的朋友们之所以无法担任中国教育史的课程,是因为在受高等教育之时没有系统学习中国教育史,他本身是北京高等师范学校(1923 年升格为北京师范大学)毕业的(1917-1921 在学),当时北高为师范重镇,按理各科都开、师资优良,尤其是教育学科,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早他一年入学的王凤喈就直言北高师"教育科目具备,独缺中国教育史"^[6],王凤喈虽是英语科学生,却由此萌生出"弥补此缺"的愿望。陈青之人的是史地科,刺激更深,他眼见"许多东西洋的硕士博士们,对于西洋教育史讲解烂熟,但没有一个人注意到中国教育史",造成"学者、教者均感难言之苦"。当时西洋教育史记有不少单行本,如商务印书馆于 1921 年出版了姜琦的《西洋教育史大纲》,1922 年又出版了王凤喈的《西洋教育史纲要》,中华书局于 1926 年 5 月印行了杨廉的《西洋教育史》,而单行本的"中国教育史"还是付诸阙如,陈青之想化解教育上的这种苦痛,想编撰一部中国教育史。

第三个动机是就整个民族文化而言,凡是有历史的民族,肯定有自己的教育方式来长养他们的子孙,发展他们的文化。中华民族被认为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几千年来积累了自己的经验,可是"关于西洋教育历史的书籍车载斗量,关于五千年的中国教育历史,竟没有一本有系统的书籍出现,以贡献于人类",陈青之深以为耻,故而立志编撰自己的教育史。

沔阳(今仙桃)家乡的后学又给补充了第四个动机,说 1921 年夏陈青之从北高师毕业,学校组织了一场教育旅行,组团去日本参观教育状况,期间有一日本人以中国教育史将由日本人撰写以相讥。对此陈青之立答:"中国有自己之教育史,吾回国后,当寄汝。"20 世纪 80 年代末出版的《湖北省志人物志稿》^[7]及《沔阳县志》^[8]均持是说,90 年代在湖北出版的《历代教育名人志》也持此说^[9]。此说不知从何而来,似乎是口述材料,但不甚可靠,因为陈青之自述在京读书时,"每览外交失败史,愤恨填膺",于是成为一极端的爱国者,然而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他已变成了一个自由主义者,甚至逝世以后,牌位上题词亦是"思想自由主义者"。他在暮年亲笔写下的《五十自述》中确实说到"高师毕业,旋自沈阳经朝鲜往日本参观教育,月余返于上海"^[10],但未言受日本人之讥一事。由女婿刘春华执笔,儿子陈芳骐、女儿陈幼冰、侄儿陈芳骥、陈芳驹提供材料的《陈青之传》也未言及此事。^[11]亲笔自述及至亲的回忆均未言此故事,但官方的志书中却有是说,惟斯人已逝,无法证实,亦无法证伪,故聊备此说,以供参考。

三、陈青之撰写《中国教育史》的困苦及奋斗

陈青之是如何来编撰是书的呢?他在完成《中国教育史》全稿后,即 1934 年 7 月 30 日用笔题下了这样几句:

本书上卷初稿完成于1926年年底,至1930年8月着手起草中下两卷,并重编上卷,合成全书三卷。以参考书籍缺乏,及无定居生活,迟至今日始告完竣,历时约计十年。[12]

寥寥数语交代了他写作此书的起讫时间及遇见的两大困难,一是缺乏参考书,二是生活不安定。

陈青之生于湖北沔阳的乡间,家族之中似乎没有出过什么达官贵人,6岁人村塾破蒙读书,读了10年古书,到16岁才接受新式学校教育,18岁时因湖北遭遇大洪水,乡间小学并入城市合办,才体验城市生活。尔后读到了梁启超的文章,思想起了变化,开始倡言革命,1910年时已经率先剪辫,被同为视为怪物。1911年,20岁时方才小学毕业,恰逢辛亥革命的爆发,在民军与清军隔江对峙的危险关头,他毅然参加了学生军,却又受不了过分的约束,于是做了"逃兵",浪迹数月才返回故里。1913年,武汉形势稳定,学校纷纷复开,他先入省立工业中学;住了五日,跳入省立第一中学;在一中住了月余,又考入第一师范学校;学习了约一年,因喜听校外的反袁演说,甚至荒废学业,为守旧的校长所不容,学籍被除;又转入第二中学。1917年中学毕业,想进一步深造,考入了北高师史地科,北上求学,是为第一次进京。在学期间,恰逢"五四"运动的爆发,陈青之"以爱国血热,勇往参加",结果被捕入狱,但是他的精神却至为愉快。[13]这一段经历明白地告诉众人,他是起于乡间的知识分子,出身寒微,没有权势可以依傍,所有的困难都要他自己去解决。他的思想又是敏感的,对外界的刺激充满了好奇,青年这一连串变动学校的经历便是明证之一;积极参与"五四"运动,是明证之二。

1921 年,高师毕业后,任教南通女子师范学校,对照他所言的第一个动机,他在南通女师时似没有承担教育课程。到了 1923 年,陈青之自感学力太浅,于是考入北高师教育研究科(1920 年开办)进修,这是第二次进京。在研期间,他受自身的学科知识以及好友的经历教训等启发,开始立志从事中国教育史的研究,并从 1924 年 10 月开始搜集相关材料。1925 年从研究科毕业后,受在京湖北同乡会委托,主持并创办了群化中学。此时的群化可谓相当不完善,"经费、校舍两无着",只是租了几间民房为教室,学生所付学费,也只能对付房租。陈青之"埋头其中两年如一日",群化不仅维持不坠,且有蒸蒸向上之势。为了维持生活,他得师友之助,在中国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兼课,非常辛苦。学校的发展、生活的困难都是压力,他的"精神为之消磨大半"。在这艰苦之中,《中国教育史》上卷于 1926 年冬正式出版,列为"北京师范大学教育丛书之五"。他自述此书赖校长陈宝泉、教授张耀翔的不少指正,同时得到喻谟烈、冯克书、向兴杰、胡世敏诸学友的帮助。这些指正和帮助对他而言是可贵的,所以在"卷头语"中表示了感谢,在书中并没有出现其他寓京名流的题词或序言。须知,当时名为《中国教育史》的著作并不多,黄绍箕草拟、柳诒征完稿的《中国教育史》完稿于 1910 年,大约在 1925 年才在浙江面世,后流传到上海的书市;王凤喈的《中国教育史纲》虽然同完成于 1926 年,但迟至 1928 年 1 月才正式面世;陈青之的《中国教育史》上卷于此空白期中完成,完全可以占有一席之地,但他就是"不愿借重名流,代作颂序,以高声价。"[14]这既是他的书生气,也是他的可贵处。

1927年,国民革命军占领武汉,风气为之一转,昔日同窗纷纷劝陈青之南归,他对这段北漂的生活亦感倦苦,于是将群化托给好友,转道武汉工作。先在汉口公安局做了一段时间的秘书,但这工作并非所长、也非所愿,不久恰好有从事教育工作的机会,于是"辞公安而就学校",这是他书生气的另一面。陈青之在湖北省立第二女子中学任教两年,这段时间工作稳定,故生活至为愉快。但因小事错过了母子最后的相见,抱恨终天,他至为懊恼。有此刺激,加上工作变动,蛰伏心中的念头又再次涌起——原拟"不多久也要编辑出来了"的《中国教育史》已经延误好几年了。1930年夏,他第三次进京,起草《中国教育史》的中下两卷,后因生活所迫及友人邀请,任教于河南淮阳师范学校,一学期终了,

即返京"整理旧著"。1931年,又接受友人邀约,返回武昌执教湖北省立师范,同时兼课于中华大学。1932年,第四次进京,寓居十间房路的沔阳会馆,专意著述,为了生活,同时兼中国大学、民国大学两校课程。当时京师图书馆已被改为北平图书馆,藏书颇丰,为了查阅,陈青之需要步行数里,无课之日,即自带干粮,上午9时到馆,下午9时方出馆,如此辛苦勤奋,不意,数月便血不止,可见过于辛苦了。然而更糟的是北京的形势,1933年3月,热河失守,北平戒严,旅居者纷纷南下。8月,陈青之受湖北省立四中之聘,执教半年。此后的半年,极可能是闭门著书,到1934年7月末终于完成了《中国教育史》全稿,并交给商务印书馆。

商务印书馆方面经审读后同意出版,同时提交大学丛书委员会的审核,经过全国学术界、出版界精英的审定,《中国教育史》一书被列入是项丛书,于1936年4月正式出版。全书同10年前出版的上卷风格一样,没有任何时贤名流的题词或颂序,即便是经过十年的困顿及流浪,陈青之仍不改书生本色。

然而 1936 年,对陈青之而言,颇为痛苦不堪,《中国教育史》完稿之后,他了却了一桩心头事,但是健康方面出了大问题,他本有丹毒之症,寓居武昌期间,偶患感冒,误于庸医,竟恶化成肺结核,两病交侵,痛苦难忍,以至于"讲授无力,撰述全停。"回过头来看,《中国教育史》的撰写一定程度上消耗了他的精力,也损毁了他的健康。

四、陈著《中国教育史》的优点

陈青之以生命写就的著作,在几十年后能够再次获得社会的认可,表明还是有优点及特色的,约 言之,可分如下数则。

第一、前后贯通,大著从原始时代开始讲起,一直讲到他完稿之时,即 1934 年,达到了"通古今之变"。或许有谓,当时写成通史的,并不只有陈青之一人,这能算什么优点及特色呢? 关键在于,对这数千年的教育历程的性质如何界定? 又如何展开叙述? 陈青之在全书中将中国教育分为六个阶段: 1、原始氏族时代,2、封建时代,3、半封建时代前期,4、半封建时代中期,5、半封建时代后期,6、初期资本主义时代。关于原始氏族时代,当时尚无充分的资料以考证,而后列的五个,实际上只有两个——封建时代与资本主义时代,他的意见也是这样,他说:"中国教育史,严格说起来,只有两大期,而以英、法联军之役为分水岭。自英、法联军之役以前,为半封建式的教育;自此役以后,为资本式的教育。"[15]相较于同时期的著作而言,他的分期法是有特色的。

他的学长王凤喈于 1928 年出版的《中国教育史大纲》分中国教育历程为:周代以前及周代、春秋战国、秦汉、魏晋及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代、近代之教育,共分为 8 期。也在北高师研究科进修过的余家菊,他的《中国教育史要》于 1929 年先在沈阳长城书局出版,1934 年又在中华书局再次出版,他亦是按朝代进行,同时又有所综合,故全书分为三编,第一编包括周代以前及周代,第二编涵盖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作者明确称为"中世",第三编为宋代、元代、明代、清代、变化以后,称为"近世",第一编作者虽未明称为"古世",但其认识实际就是如此,这是参照西洋史及西洋教育史的成例来叙述中国教育史。黄炎培在1931 年出版的《中国教育史要》中分为:传说时期(秦以前)、德治时期(两汉)、混战时期(三国至南北朝)、科举时期(隋唐到清)、欧化时期(清末到当时),共5期。同在1936 年出版的陈东原所著《中国教育史》,起于汉代,迄于清末,他自述"只是一部尚未完成的著

作。"^[16]虽有 28 章之多,但其主体亦是按朝代演变进行的,如汉初之教育、魏晋南北朝之学校、隋之教育与科举、五代时之教育、宋初之科举与教育、明代之官学与书院、清代之官学等。这些分期法并没有能够完全揭示教育的性质,陈青之的分法与他们不一样,是依据社会性质的变化,一定程度上吸收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反观 1949 年后,因硬套马克思的"五种社会形态",给历史的分期、包括教育史的分期造成了很大的干扰和混乱,所以今日再看陈氏之作,会让人觉得新奇,这或许是能够不断出版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二、指出主线,陈青之在《中国教育史》(上卷)中就提出一个重要观点,他认为"中国历史的民族的思想,勿论各时代的中间如何变乱,外力如何侵入,而他们总是以儒家思想为中心。"[17] 10 年后,在三卷本的书中仍坚持是说,并且进一步深化,他说:"中国民族思想,几千年以来,受了儒家思想的支配,至今尚未完全去掉。"[18] 或许有疑,魏晋玄学大炽、儒学衰微,隋唐佛老之学再盛、文学又兴起,儒学衰至极点,如何能够构成中心呢?对此陈青之找到了一个极有说服力的证据,他说:"勿论教育制度如何变更,教育学说如何差异",教育实践中"总以儒家思想为中心,以儒家经典为教材",即便玄学盛行之时,学校所授的仍是五经之术,唐朝又把它们分为九经,宋朝添了四书,元朝添了几本宋儒语录,明、清两朝又把五经细分为十三经,所以在教育上是以儒家为中心的。对于古代部分,或许无法质疑,而当时已是30年代,三民主义正显赫一时,怎么仍受儒家思想支配呢?三民主义的信徒们肯定不会同意这观点,对此陈青之指出:三民主义实质上是儒家思想的继续表现,只不过这会儿"不是封建的",而是"世界大同的",所以仍是"以儒家思想为骨髓。"他提醒立志研究中国教育史的学者注意:"研究中国教育史,而忽略了儒家思想支配中国社会数千年的势力,一定要失掉了史的可靠性。"[19]

第三、人物丰富,教育家的活动是教育史上非常重要的要素,只因古往今来的一切教育制度,多 数都是教育家发明创造的,得其人则事举,失其人则事息,所以教育史的编撰离不开他们,陈青之的 《中国教育史》对此颇为留心,自先秦孔子、墨子、孟子、老子、庄子、荀子,一直到晚清的张之洞和 梁启超, 历朝历代的教育家都有介绍。粗点下来, 有近 90 人, 当然各人在教育史上所起的作用不同, 在书中的地位也不尽相同,先秦诸子中除了有一节合传的"孔门弟子"外,其他老子、孔子等均单独介 绍,汉代的贾谊、董仲舒、扬雄、王充亦是单独列节,马融和郑玄、荀悦和徐干则是合并在一节之内。 所选人物又以宋元明三代最多, 北宋就有胡瑗、周敦颐、王安石、张载、程颢、程颐、及程门弟子, 即谢良佐、杨时、游酢、吕大临、尹和靖,这5人合并介绍,南宋又有罗从彦和李侗师徒二人、胡宏、 朱熹、张栻、吕祖谦、陆九渊、朱熹弟子(内有蔡元定、蔡沈、陈淳、黄干)、真德秀,元代有赵复、 许衡、刘因、金履祥与许谦、吴澄,明代分为初中晚三期,初明有曹端、薛瑄、吴与弼、胡居仁 4 人, 中明有陈献章、湛若水、王守仁、罗钦顺与吕柟、王门弟子(其内主要介绍了钱德洪、王畿),晚明有 顾宪成、高攀龙、孙慎行等人为主的东林学派以及最后为明绝食而去的刘宗周,合计44人,占总数的 近一半。正如商务印书馆在推介广告中所言:"对于宋元以来理学家有关于教育思想之研究,颇费匠 心。"[20] 1928 年出版的王凤喈《中国教育史大纲》在宋元明这几朝所收人物,南宋就只有朱熹、陆九渊 和吕祖谦 3 人, 元代就只有许衡 1 人, 明代亦只有吴与弼、薛瑄、王守仁、刘宗周 4 人, 均少于陈青 之,惟北宋人选上二人有出人,王安石、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为共同,司马光、邵雍为王凤喈 所选、陈青之未选,胡瑗为陈青之所选、王凤喈未选,程门弟子中王凤喈只认可谢良佐和杨时,陈青 之则介绍了 5 位,也有所不同。同在 1936 年出版的陈东原的《中国教育史》对于教育家比较爱惜笔墨,

以宋元明三朝为例,出现在节这一级标题内的只有范仲淹、胡瑗、王安石和张居正 4 人而已,至于朱熹、王守仁这种教育史上绕不开的大人物,只是放在正文之中因部分专题,如书院制度,再加以介绍。这主要跟陈东原自己的认识有关,他觉得他所理解的教育思想"都是与教育政策有关,为一代教育形式改变之动力的思想。"[21]然而这样的代表可谓少之又少,这也就难怪他选人偏窄了。陈青之所选人物虽众多,但群落分布与他所指出的教育史主线一样——儒家为主。

第四、明晰传统教育的性质,传统教育既是儒家为主,儒家思想又是以伦理为中心,这样一来传统教育是不是真得如后来者所言"学以为己"呢?陈青之指出,"教育属于意识形态之一种",而且"自统治阶级发生以后,教育与政治即连合为一,且成为政治之一部分。"统治者居于统治地位,可以以政治力量推行教育,所以"教育不过为施行政治之一种手段",也就是"统治国家之一种工具。"这样一来,教育效率的高低与否,全看政治力量的强弱。虽说教育具有一定的反作用力,但教育本身所具有的力量太有限了,所以难以免除傀儡的角色和定位。如此,"教育万能""教育神圣"等观点均不可靠。陈青之亦言:"'教育万能说'纯属欺人之谈,'教育神圣说'更是自欺之语",除非社会真正到达了"真正平等"或"理想的大同时代",教育才会有纯洁意义。所以对于教育学者的教育学说,需要注意其背后的政治及时代,他们的声音有时并没有明显地拥护统治者,但也不会与官方产生直接的冲突,只有到了统治势力快要崩溃的时候,胆大的才敢于唱几句高调,所以他提醒后学"教育随政治为转移,研究教育史者对于这一点也要认识清楚。"[22]

是书优点颇多,但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只能择其荦荦,加以介绍而已。

五、陈著《中国教育史》的缺点

任何学者都会受到时间与空间的限制,其作品纵然充满优点,也会难免有这样或那样的缺点,陈 青之研究中国教育史亦是如此。

比如,当时西方学者有主张中国民族是从西方迁徙而来的,对此学者们有认同、有反对、有狐疑、聚讼不已,而陈青之早期是相信是说的,他在《中国教育史》(上卷)"卷头语"中直言:"中华民族自西亚迁到中原,立国已是五千多年了。"^[23]十年后开始修正自己的观点,提出:"西人谓中国种族来自西亚,但据中国可靠之古籍,无一西来之痕迹。清人王国维始谓中国民族实起源于西方,姑从王说。"^[24]态度上仍是有保留的。然而当时国内史学界很有影响的"古史辨"对他的判断也有直接的影响,认为"中国古籍可靠性太少",以至于对汉代流传的先秦古籍中所载颇多怀疑,甚至认为"在西周时代,后儒所盛称的教育如何发达,学校如何完备",只能够当作"一种傅会,决非信史",所以其章的标题为"汉人臆造之上古教育制度"、"后人傅会之西周教育制度",直接表明他的态度,在 10 年之前的作品态度不是如此,"(民族思想启蒙时期)教育状况"、"西周之教育状况"就比较平实。

是书长于教育思想,在教育制度的论述方面略嫌薄弱,特别是几乎很少谈论私学,对于遍布城乡的三家村塾,陈青之不认可它在教育制度上的地位,觉得这种教育完全是"由民间自由处理,政府毫不过问。"^[25]相反,陈东原的著作对此非常关注、研究得也很深。

再有,是书之中以今度古之处也有一些,如西周有学校系统、且分甲乙两轨,甲轨是贵族的,乙轨是庶民的,故属"双轨制";又如汉代的学校可依性质分为初等教育段、中等教育段、高等教育段; 再如唐代国子监的性质等于现今教育部,"六学"中前三学(即国学、太学、四门学)属于大学性质,后 三学(律学、书学、算学)属于专科性质等等,这种以今日的教育概念来理解古代教育事实的叙述也有不少。

陈青之以生命谱写的《中国教育史》,在沉寂几十年后,再次迎来荣光,虽属偶然事件,但偶然之中也有必然,是书规模宏大、内容充实、有些观点经住了历史的检验,所以 10 年来多加出版社加以出版,此举自然是值得鼓励的,惟这 14 版,整理编校的水平有别,"荆楚文库"前有"编前语",介绍了陈青之编撰此书的概况,对是书也进行了表扬,指出其有三大特点,惜未能评判其不足。至于福建教育出版社的"二十世纪中国教育学术名著丛编"本,因主编瞿葆奎先生的主张,要求有"特约编辑前言",故而有所评介。其他各版没有做这样的工作,容易贻误后学。正因存有这样的担忧,方才做了这篇文章,但学识谫陋,故敬请方家斧正。

另外,陈青之甘于清贫、一心治学的精神,毫无疑问值得后学学习,只是处于现今的考核机制之下,想学也颇不容易,因为莫说十年,即便五年,甚至两年,没有任何产出的话,职位可能就不会太 稳固了,不知历史何时才能再次展现它自己的辩证法?

参考文献:

- [1] 王政. 书评: 中国教育史与中国民族性[J]. 是非公论. 1936(17). 24.
- [2] 刘春华. 陈青之<五十自述>复印后记[A]. 政协湖北省仙桃市委员会学习文史委员会. 仙桃文史资料(第13辑)[C]. 仙桃:编者刊1996. 216.
- [3] 刘作忠. 陈青之和<中国教育史>[N]. 团结报. 2002-5-7(3).
- [4] [5] [14] [17] [23] 陈青之. 中国教育史(上卷) [M].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室 1926. 卷头语. 第 4 则, 第 1-3 则, 第 12 则, 第 8 则, 第 3 则.
- [6] 王凤喈. 中国教育史(修订版)[M]. 台北: 正中书局 1957. 自序 1.
- [7] 湖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湖北省志人物志稿[M]. 北京: 光明日报出版社 1989. 824.
- [8] 仙桃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沔阳县志[M].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9. 659.
- [9] 顾明远. 中国教育大系·历代教育名人志[M]. 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4. 456.
- [10] [13] 陈青之. 五十自述[A]. 政协湖北省仙桃市委员会学习文史委员会. 仙桃文史资料(第13辑)[C]. 仙桃:编者刊1996. 213, 212-213.
- [11] 刘春华. 陈青之传[A]. 政协湖北省仙桃市委员会学习文史委员会. 仙桃文史资料(第13辑)[C]. 仙桃:编者刊1996. 206-211.
- [12] [15] [18] [19] [22] [24] [25] 陈青之. 中国教育史[M].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36. 811, 9, 4, 5, 2-3, 19, 477.
- [16] [21] 陈东原. 中国教育史[M].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36. 2, 自序 5.
- [20] 商务印书馆. 商务印书馆本日初版新书[N]. 申报. 1936-6-18(3).

(责任编辑 王建平)

No. 2, 2022 General, No. 244

ABSTRACT

Educational Behavior and Bounded Rationality: Reflections on the Behavioral Economics Perspective

(DING Gang)

Page 5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ehavioral economics theory, education carries on the understanding and discussion related educational behavior and relationship, through the rational man and society, as well as the analysis of teaching cases, need to emphasize to overcome the premise of rational people, as well as the average, the influence of the standardization system of education and its behavior, and lead to a kind of new education research angle of view, we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bounded rationality of educational actors, reaffirm the respect for individual differences and emphasize the essence of individualized teaching, so that our educational behavior and policy can be more in line with the actual needs and more reasonable.

Key words: educational behavior; Rational economic man; Bounded rationality; Behavioral economics

(Proofreader: YU Hui)

Private Tutoring under the "Double Reduction" Policy: Risks of Disorder and Approaches of Regulation

(YU Hui & HU Jinsong)

Page 29

Abstract: Under the national "Double Reduction" policy, the extracurricular tutoring market is undergoing transformation from institutional training to private tutoring. At present, private tutoring is facing risks of disorder because of its informal nature, examination orientation, and profit—making orientation. Without timely regulation, the development of private tutoring might produce negative effects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Double Reduction" policy, such as: increasing families' financial burdens; increasing students' academic burdens; aggravating educational competitions; and damaging educational equity. The approaches of regulating private tutoring are based on the balance of state power, individual choice, and rule of education. To this end, it is important to follow three essential value principles, including maintaining legitimacy, freedom of choice, and order of educational market.

Key words: "Double Reduction" policy; Academic burden; Extracurricular tutoring; Private tutoring

(Proofreader: YU Hui)

Is There A Neighborhood Effect in Participating in Shadow Education? Evidences from the 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 (XU Dancheng & XUE Haiping)

Page 37

Abstract: Based on the 2010–2018 data of the 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 (CFPS), the binary Logit model is used to explore whether there is a neighborhood effect on students' participation in shadow educa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There is a neighborhood effect for students participating in shadow education. The higher the shadow education participation rate in the same community, the greater the probability of individual students participating in shadow education. The result is still dramatical after including the lag period of the shadow education participation rate of the same community in the regression model. (2) The neighborhood effect of shadow education has gradually weakened, and the coefficient of shadow education participation rate in the same community has shown a downward trend year by year. Therefore, it is recommended that education administrative departments, schools and communities effectively implement the "double reduction" policy, broadening the ways of family—school—community education, and guiding parents to establish a scientific conciousness of parenting; residents and communities should cooperate with relevant departments to increase efforts to regulate the publicity content of off—campus training institutions to ease parents' education anxiety, which can suppress the neighborhood effect of shadow education in order to effectively reduce the burden on students.

Key words: Shadow education; Neighborhood effect; "Double reduction" policy

(Proofreader: YU Hui)

Problems and Optimization Strategies in the Selection of Policy Instruments for After-school Services in China——An Econometric Analysis Based on 27 Provincial Policy Texts (Deng Liang & Zhang Yifan) Page 46

Abstract: A two-dimensional analysis framework of policy tools and work elements was constructed based on content analysis, and an econometric analysis was conducted on the composition of after-school service policy tools of provincial governments in China. It is found that there is internal structural imbalance in the selection of after-school service policy tools, unevenness in policy supply, and mismatch between after-school service policy tools and work content elements, which adversely affect the implementation of after-school service work in China. By optimizing the structure of policy tools, the synergistic effectiveness of after-school service policies should be enhanced; enhancing the balance of policy tools to achieve the long-term goals of after-school service policies; and improving the matching of policy tools to create a favorable environment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after-school service.

Key words: after-school services; policy instruments; econometric analysis

(Proofreader: YU Hui)

Primary School Parents' Homework Participation: Ways, Behavior and Improvement

(KANG Naixin & XU Wenqi & FANG Zheng)

Page 56

Abstract: Can and how can parents participate in students' homework under the "double reduction" policy? This study constructs the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parents' homework participation methods at the theoretical level, adopts the mixed research method, carries out a questionnaire survey on 429 groups of students and parents, and conducts in-depth interviews with parents and teachers to investigate parents' participation methods and behavior in students' homework. The study found that when participating in students' homework in the way of independent support or control, response or intervention, parents' high sense of self—efficacy promoted their high—frequency and high response participation behavior. When participating in students' homework in the way of physical environment construction, parents' misunderstanding of the concept of autonomous learning and the lack of participation conditions and sense of experience lead to strong control and monitoring of their behavior. To improve primary school parents' homework participation, we should update parents' concepts, ensure students' dominant position in homework, promote home school linkage, strengthen communication and guidance of homework participation, activate social resources and help parents release their vitality.

Key words: homework; parental participation; ways of participation; participation behavior

(Proofreader: YU Hui)

Educational Value Of "Three Togethers" Rural Labor Education Curriculum to High School Students (YAO Xunqi & YUAN Haojing & XIAO Zhaoyun)

Page 66

Abstract: Based on the "Three Together" labor education curriculum which has been carried out for more than 30 years in the Affiliated High School of Guangdong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CNU), this study makes use of In-depth interviews with core teachers and conducts word frequency analysis and keyword extraction of student summary and alumni memoirs corpus for 218, 000 word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eachers and students, the educational value of "Three Togethers" labor education courses can be refined into three areas and ten aspects. The three areas are ideal responsibility, labor life and innovation aesthetics; the ten aspects include improving ideal beliefs, enhancing national identity, developing responsibility, setting up labor concepts, building labor spirits, fostering labor ability, forming labor habits and qualities, cultivating question-consciousness, developing inquiring ability and cultivating esthetic sentiment.

Key words: labor education curriculum; rural; three togethers; educational value; word frequency analysis

The Ecology and the Unexpected Consequence in Baoyan Involution: A Study of Students' Experiences of Baoyan in an Elite University (HAI Ziyi & CHENG Meng)

Page 75

Abstract: At present, the term "involution" is used to describe the excessive competition phenomena of elite universities,

and "Baoyan" is an important aspect of this phenomena. Based on the in-depth interviews with eight undergraduate students in a "Double First-Class" university in Beijing, it is found that the excessive competition is embodied in "grabbing good points", bargaining chips and competing comparison. The performance oriented rules of "Baoyan" lead to commendatory and derogatory effects, aggravating the individual's self exploitation, which easily lead the students to "hollow" in the spiritual world, and cast "exquisite egoists" and involution personality. It not only endangers the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of students and damages the spirite of knowledge, but also brings the long-term talent selection and cultivation of society and country the bitter fruit of single talent selection and utilitarianism. As individuals, college students are not only being trapped, but also reflecting on themselves, and trying to break through. Transcending the involution needs individual awakening, as well as ultimately depending on the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cultural remodeling of universities and even the whole society.

Key words: involution; Baoyan; competion; involutional personality; institutional transformation

(Proofreader: YU Hui)

Higher Education Fiscal Spending and Universities Competitiveness: Spatial Features and Driving Forces Recognition (LIU Xiao-feng & LI Yan)

Page 87

Abstract: Fiscal Spending on Higher Education is a key factor in promoting competitiveness of universities, which provides economical foundation and booster. Based on establishing indexes of higher education fiscal spending and competitiveness of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the research comprehensively leverage Coupling Degree Model, Exploratory Spatial Data Analysis and GeoDetector Model to discuss the spatial features and driving forces of coupling degree between higher education fiscal spending and competitiveness of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The result shows that coupling degrees among provinces are low and have obvious differential spatial features, with the spatial structure characteristics of disequilibrium in the whole and local clustering. The coupling degrees show that there is posi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higher education fiscal spending and competitiveness of universities which is divided mostly along the Hu's Line. On the southeast side of Hu's Line most regions are hot spots clustering area while on the northwest of Hu's Line most regions are cold spots clustering area. From the state view, government regulation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guiding the coupling degrees, factors of coupling degree in eastern region are diversified and hierarchical and innovation boosting, faculty promoting, investment pulling, urbanization impelling, regional endowment play primary functions in the coupling degrees. Talent training structure, social serving, innovation boosting, and faculty promoting playing the primary roles in central region. In western region the coupling spatial difference mainly belongs to policy promoting type and talent training structure and investment pulling also have strong explanatory powers. In northeastern region the coupling degrees are mainly affected by government regulation, innovation boosting, talent training structure and faculty promoting.

Key words: hot spots clustering area; Hu's Line; Competitiveness of universities; driving forces recognition

(Proofreader: YU Hui)

Study on the Phenomenon of 'History of Chinese Education' by Chen Qing – zhi in Educational Publishing (ZHANFG Liyong)

Page 101

Abstract: "Ten years of grinding one sword", Chen Qing-zhi's "The History of Chinese Education" has almost cost the time and energy of his prime. Since the publication, it has received rave reviews and was included in the "college-textbook series", using as a textbook prescribed by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Later, due to changes in the social situation, this work was silenced for forty years. After that, as the only book on the general history of Chinese education, it was selected into the "Republic of China Series". However, the academia has not been able to give corresponding status to Chen and Chen's work. It was not until the new century that it was completely changed. His work was favored, and many publishers reprinted it, which led to the rare "Chen Qing-zhi phenomenon" in educational publishing. There are both economic considerations and academic affirmations behind this phenomenon. History shows its own dialectics here. Living today, through the phenomenon, analyzing the person and his books is instructive for later studies.

Key words: Chen Qing-zhi; "The History of Chinese Education"; Educational publishing

(Proofreader: SUN Bi)

(Table of contents proofreader: YU Hui)

《现代教育论丛》投稿指南

《现代教育论丛》创刊于1980年,1996年、2000年两次人选《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为 "2018年度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AMI综合评价"A刊(扩展)。

《现代教育论丛》依法依规办刊;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求解教育理论前沿疑题,正视教育实践具体难题;追求真知,鼓励争鸣;立足本土,以海内外作者和读者为同道,开辟教育研究新地。

一、栏目设置

1.本刊发文,以专题专论为主,不设固定栏目。

2.本刊常设栏目有:

教育理论与教育史,教育领导与管理,教育政策与法律;

成人与终身教育,国际与比较教育,港澳台教育;

教育研究方法, 课程与教学, 教育心理学, 教育技术学, 学校卫生学, 教育文学;

初等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

学前教育,特殊教育,职业教育;

学校体育, 学校德育, 学校美育, (思想)政治教育;

农村教育,民族教育;

学术争鸣与热点笔谈,学术通讯与书刊评论等。

二、来稿须知

1.来稿须含中英文题目、作者姓名、作者简介(包括职称、所获学位、研究方向)、作者工作单位(地址及邮政编码)、联系电话(包括手机号码)、E-mail地址、论文中英文摘要和关键词、正文、参考文献。

2.要求来稿论题新颖、论点明确,论据及相关数据可靠,论证充分、结构合理、逻辑严密,合 乎文法、用词准确、文字精炼。

3.论文题目应准确、简洁,一般不超过20个汉字。

4.摘要(汉语)字数一般为 200-300 字,内容应包括目的、方法及结果等;英文摘要与汉语摘要对应。

5.关键词3-5个。

6.正文一般使用两级或三级标题,如: "一、" "(一)" "1."。

7.注释用带圈数字标注。参考文献符合GB/T 7714—2015《信息与文献 参考文献著录规则》。

8.文稿首页页脚注明论文项目、基金(编号)资助来源,没有的不注明。

9.来稿文责自负,所有署名作者应对稿件内容和署名无异议。本刊实行双向匿名审稿,编辑部可对来稿作技术性和文字性修改。

10.请勿一稿多投。初审时间一般为15个工作日。作者可致电编辑部(电话: 020-85213198), 查询审稿情况。

11.本刊不向投稿人收取任何费用。来稿一经发表,即致薄酬并赠送每位作者样刊三册。

三、投稿方式

1.电子邮箱: xdjylcbjbu@m.scnu.edu.cn。

2. 网络投稿平台: http://xdjy.cbpt.cnki.net。

通讯地址:广州市天河区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现代教育论丛》编辑部,邮政编码:510631。编辑部电话:020-85213198。



现代教育论丛

2022 年第 2 期(总第 244 期) 2022 年 3 月 25 日 1980 年创刊,双月刊

主管单位——华南师范大学

主 办 单 位 —— 广东省教育科学研究所

出版单位——现代教育论丛编辑部(广州石牌510631)

执 行 主 编 —— 王建平

印刷单位——广州—龙印刷有限公司

国内发行——广东省报刊发行局

国内订阅——全国各地邮政局(所)

官 网 —— http://xdjylc.scnu.edu.cn

电 话 ---- 020-85213198

MODERN EDUCATION REVIEW

No. 2, 2022 (Sum. 244) Published on Mar 25th, 2022 Started in 1980, bimonthly

ADMINISTERED BY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PONORED BY** Guangdong Institute for Educational Sciences

PUBULISHED BY Editorial Department of Modern Education Review

EXECUTIVE EDITOR Wang Jianping

PRINTED BY Guangzhou YiLong Printing Co.Ltd.

WEBSITE http://xdjylc.scnu.edu.cn

TEL +86 20 85213198

ISSN2095-6762 连续出版物号: 发行代号: 46-341 定价: 18.00 元 CN44-1361/G4

